

欧洲共产主义

对东西方的影响

新华出版社

“欧洲共产主义” 对东西方的影响

(美) 罗伊·戈德森 著
(英) 斯蒂芬·哈斯勒

星 灿 译

新华出版社

“欧洲共产主义”
对东西方的影响

(美) 罗伊·戈德森 著
(英) 斯蒂芬·哈斯勒

尾 灼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出版社发行
新华社印刷厂排版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03,000 字
1980 年 1 月第 1 版 1980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1203,005 定价: 0.80 元

(内部发行)

原出版者的话

西欧的主要共产党从被赶出政府，居于欧洲政治边缘以后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它们现在又是争夺政权的重要对手了。同时，人们普遍地在重新估价它们。它们变了吗？它们现在愿意在民主制度中发挥作用吗？它们同苏联的联系断绝了吗？总起来看，它们对西方和民主力量是有利还是不利？

这些迫切的问题以及其它问题在这本重要的新作中得到了回答。本书的两位作者一位是英国人，一位是美国人，他们对大西洋两岸的选民和政策制定人所关心的问题作了简要而全面的分析。他们吸取欧洲各国著名专家的研究成果，对日益壮大的西欧主要共产党的力量作了估计，阐述了它们的目标和战略。两位作者得出的结论是：虽然有几个共产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这些党仍置身于民主协议之外——对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保守党人一律怀有敌意。

更为意味深长的是，西欧共产党参加政权将

打乱东西方之间微妙的均势，威胁和平与稳定——也许这并非共产党人本身蓄意所为。作者分析了共产党一系列外交和防务问题的政策，他们的结论是：至少目前状况的“欧洲共产主义”现象对西方是只有害而无利的。

对于想要了解当代最复杂、最紧迫的政治问题之一的读者来说，这是一本难得的著作。

序 言

西欧几大共产党被赶出政府，退出欧洲政治舞台中心已经过了三十年，它们现在成了必须认真对付的争夺政权的对手。它们也是人们普遍重新加以估价的对象。大西洋两岸的学者和政治家对这种有争议的政治现象持截然相反的观点。大致有两种对立的看法。

第一，有些人认为，自有共产国际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以来，情况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西欧几大共产党依然奉行极权主义，它们依然服从苏联的利益，它们依然只不过是苏联国际力量的一个分支而已。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西欧共产党的发展对克里姆林宫来说是绝对的好事。第二，另一种观点认为，西欧共产党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或者现在采取严格的克制态度，因此对西欧民主国家或西方联盟的稳定几乎不构成威胁或根本没有威胁。实际上，它们作为又一种“自由化”的模式，对苏联政治局控制东欧和

苏联倒是一种明显的危险。

本书认为，第一种论点言过其实，而第二种论点则系臆测，因而是错误的。当然，共产党在过去二十年来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进一步演变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此外，克里姆林宫同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现在比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时更复杂，而且在某些方面是莫斯科所不欢迎的。即使如此，各党内部的发展变化以及它们与莫斯科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迄今还没有达到能证明与过去决裂是明智的程度。正如共产党自己指出的那样，它们仍恪守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它们在党组织内部仍坚决实行“非自由化”；甚至它们最近修订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目标还对多元论和代议制民主构成严重的威胁。此外，这些党尽管同莫斯科有意见分歧，但在对外政策问题上仍坚决亲苏——特别是在欧洲以外的问题上。因此，这些党的实力增长使力量对比有利于苏联，并没有因而削弱克里姆林宫对东欧和苏联的控制。

因此，对共产党人作为主要伙伴加入几个西欧国家政府一事处之泰然（或者略微有点担心）是过于掉以轻心了。这种变化将是历史性的巨大

变化，将打乱战后西欧大陆政治上的一致局面。这种变化将起破坏稳定的作用，因为这可能使西欧脱离美国，从而使苏联成为欧洲大陆独一无二的大国。由此产生的力量真空对世界上这个最重要的工业发达的民主地区的和平来说将是一个威胁。

然而，西方对西欧共产主义作出反应时，应当是微妙的。只有西欧各国的人民才能决定他们自己社会的前途。即使如此，大量证据说明，甚至在共产主义很容易推进的国家里，舆论——哪怕是在有时投共产党的票的人中——仍是坚决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国和西欧的民主政党都不必关上同共产党对话和讨论的大门，相反，在思想上、哲学上加强争夺可能对西方有利。

例如，如果我们坚持要欧洲共产党表明它们忠于民主和人权，那就有可能促使它们谴责苏联控制东欧，支持那些国家的自由派分子，甚至于企图使它们的统治思想进一步“自由化”。我们认为不大会出现这种变化，但是，应当鼓励这种变化。如果西欧共产党确实转为比较“自由化”，并同苏联人决裂，那么，这将使忠于苏联和正统思想的好斗分子同“改良主义”色彩较浓的分子

分裂，从而促成这些党的削弱，这种情况则可能鼓励“改良主义派”发展为民主社会主义者。这将促使西欧共产党同苏联的关系进一步紧张，还将鼓舞苏联控制之下的自由派和持不同政见的势力。

西方一面继续不让共产党人染指政权，一面应鼓励西欧共产党内部起变化，以便于它利用这些共产党同莫斯科之间的紧张关系。为达到此目的应当采用什么样的具体策略，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本书没有提出种种详细的政策性建议——只有一点除外，那就是：要求西方重新采取政治主动行动，这种主动行动可以西方一贯的“人权”政策为基础。

本书大部分篇幅集中介绍南欧共产党。这些党规模大，组织严密。它们得到许多选民的支持，支持的人数很可能继续增多。其中的几个党有可能加入政府。此外，它们控制着很大一部分劳工运动，控制着其他重要的非政府部门（包括新闻机构），这使它们在议会以外还可对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其中三个党（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党）的领导集团在对内和对苏联关系方面都带头改革。随着这些发展变化出现了一个常用词：

“欧洲共产主义”。如果西欧确实出现了一种新的共产主义现象，那么它应当在这些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果并没有出现新的共产主义，那么它就不大会在西欧别的比较小又比较弱的党中反映出来。因此，对南欧共产党的研究成果可比较普遍地运用于西欧大陆的其余地区。

除了南欧共产党以外，本书还探讨了一个“北方”国家英国共产党内部的发展变化。正如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欧文指出的，英国共产党仍有影响。^①它虽然得选票不多，但是它对强大的英国工会运动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很难断定，但是英国共产党仍是任何一届英国政府——无论是工党政府还是保守党政府——必须关注的是一支政治和劳工力量。英国共产党最近还提议同工党进一步合作——在工党组织中占优势的左翼看来并不象它的先辈社会民主党人那样拚命反对与英共合作。英国共产党同一些南欧共产党一样近来也多少有些变化——对内政策和对外关系都有变化，这些变化促使党内一些坚决的斯大林主义者退党。英国共产党的发展变化不仅引起研究欧洲政治和大西洋合作的学者的兴趣，而且也说明了北欧其他规模不大的几个“小”共

产党面临的尴尬处境。

本书很少用“欧洲共产主义”一词。这一词显得西欧共产党好象已经发展了一种同苏联和东欧实行的共产主义根本不同的共产主义，它也暗示西方传统培育出一种新的政治现象。然而，虽然在理论上和在对苏联称霸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态度上确实有变化，但是我们认为，不能把这些同正统只有细微差别的变化夸大为产生于西欧、同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共产主义的历史经验毫无联系的一种全新的政治类别。

第二，“欧洲共产主义”是指一个全西欧的运动，西欧各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发展都一样。然而，正如本书所说，各共产党之间仍有重大差别，这种差别不仅存在于南方党和北方党（“大”党与“小”党）之间，而且也存在于拉丁语系民族的共产党之间。当然，西班牙共产党——尤其是其领导人圣地亚哥·卡里略本人——显出一种政治流动性，这种政治流动性可能发展成为“新”型共产主义；然而，卡里略的表面的“自由”并没有特别的感染力，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其余地区没有，在法国没有，甚至在意大利也没有。这个词暗示，色彩千差万别的西欧各国共产党现在

广泛而均衡地出现一种新的共产主义现象，使用这个词是掩盖真相，而不是揭示真相。

本书作者没有以若干美国和欧洲学者写的标准的然而过了时的第二手著作为依据，作者在乔治城大学国际劳工计划和全国战略情报中心^②的协助下使用了一系列著名欧洲学者写的背景材料。不同国家、分属几代、具有不同政治信念的欧洲学者应邀回答一系列有关欧洲各国共产党的发展趋向、它们对国内政治和对东西方的影响等问题。这些背景材料写于一九七七年秋末，资料于一九七八年春季收进本书。本书作者感谢为本书提供材料的欧洲学者。作者还感谢法兰克·巴尼特、法兰克·特拉格、多萝西·尼科洛西、威廉·道格拉斯、斯文·克雷默、鲍勃·许廷杰以及夏洛特·克拉茨等提供了宝贵的帮助。但是对本书的事实、论点和结论则完全由作者负责。

本书分三部分。第一章基本上是实况调查，研究西欧共产主义的实力。这一章试图通过分析共产党成员构成的发展趋势以及它们在选民与产业界中的基础对所选的几大共产党的规模、力量 and 影响作出估计。这一章还试图初步阐明西欧共产主义近来之所以发展的几点原因。

第二章涉及共产党和内部政治。在这章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分析共产党对民主秩序的威胁有多大。这一章首先论述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它们的战略、党内体制（实行“民主集中制”），进而分析共产党对其他政党和力量采取的“联盟”政策，接着分析共产党人提出的各种主张：维护自由和民主多元论、公有制以及在共产党统治下工会与国家的关系等等。逐一介绍各党公开宣布的立场，并把这些立场同共产党的实践与理论加以对照。这一章还试图对下述问题作一判断，即：如果共产党人上台执政，共产党政府是否会完全破坏西欧战后在政治上民主与亲西方这样一致的局面。

第三章探讨西欧共产主义力量增长对东西方国际力量对比的影响。这一章研究苏联同西欧共产党合作与冲突的方面，以及共产党对欧洲统一与北约的看法的含义。第三章结尾谈共产党政府或受共产党影响的政府会对国际力量对比产生什么影响，并就西方对欧洲共产党力量增长应作何反应提出一些初步的建议。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西欧共产党的实力·····	(1)
	概况·····	(1)
	共产党员·····	(8)
	共产党人参加竞选·····	(21)
	共产党和工会·····	(34)
	共产党拥有实力的原因·····	(51)
第二章	共产党和内部政治·····	(63)
	作为政党的共产党·····	(68)
	共产党及其联盟·····	(96)
	政策、思想体系和民主协议·····	(116)
	“欧洲共产主义”已经变成	
	“社会民主主义”了吗?·····	(131)
第三章	共产党和国际力量对比·····	(140)

共产党和苏联.....	(141)
共产党和欧洲.....	(147)
共产党和西方防务.....	(158)
苏联的反应.....	(170)
苏联影响的来源.....	(177)
国际有利条件对比.....	(182)
注 解.....	(190)

第一章 西欧共产党的实力

概 况

人们不论用哪一种方法（统计选票、党员数字或党控制的非政府机构）来衡量共产党在西欧的实力和影响，都不可避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主义仍只是在少数人中的一种现象。总的说，西欧人仍然是不信仰共产主义——甚至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人民。

从选举中所获的选票看——这仍是反映民意的最好标志，西欧共产党所得的支持既远不如中右政党（天民党人、戴高乐党人、保守党人），也远不如中左政党（英国工党、西德社会民主党、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社会党以及社会党国际所属的一些党）。西欧各国共产党基本上都是同那些规模较小的自由主义政党^① 争夺西欧大陆第三大选举力量的地位，它们的选票占西欧总选票的

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

共产党在拟议中的欧洲议会直接选举中所得的议席最多不会超过百分之十五。据估计，^②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在四百一十个议席中，共产党的议席将不超过四十九席。如果西班牙和葡萄牙获准加入欧洲共同体，那么共产党在四百八十三席（估计）的议会^③中将得五十七席（估计）。

即使在共产党选票集中的四个南欧国家（法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共产党人在最近的议会选举的总选票中也只得了平均百分之二十左右的选票。^④甚至在意大利和法国，也应正确看待共产党的选举成就。在意大利最近举行的几次选举中，百分之六十五点六的选民不投意共的票。在法国一九七八年第一轮选举中，不投法国共产党的票的人占全体选民的百分之七十九点四。

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是可观的，鉴于党组织的纪律严明，其党员人数便尤其给人以深刻印象。然而，党员“更迭的比例”越来越高——特别是法共——必定使人对他们未来的内部团结产生怀疑。此外，有证据表明，拉丁语系国家的共产党对青年人没有特别大的政治吸引力，

对妇女的吸引力则更小。

共产党人在若干重要的非政府社会、经济和文化部门中影响很大，并谋求在他们各自国家的关键性部门扩大影响。共产党人似乎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的地方是工会运动，但是在西欧各国，仍有一些强大的工会中心抵制各个共产党。除葡萄牙以外，西欧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说共产党已经完全控制了大部分重要的工会力量中心。此外，全西欧的大多数工会会员不是共产党员，甚至不同情共产党。即便是在法国和意大利，一个共产党控制的工会的会员也不一定都支持共产党。

只是在人们注视西欧政局发展动向的时候，共产党力量的增长才变得比较明显。共产党是重要的政治角色，大有可能登上舞台中心扮演主角或重要的配角，意大利和法国的情况是这样的，葡萄牙是否如此还可争论，西班牙也有出现这种情况的潜在可能性。在意大利，意共得的选票虽刚超过三分之一，但是得票的比例现在已经比它四十年代末的得票比例提高了几乎一倍——达到了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得到它的支持意大利政府才能稳住的地步。事实上，正如共同市场创始人之一阿尔蒂埃罗·斯皮内利(意大利人)所说：“意

大利共产党……是我国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它在生理上是意大利现实的一个很大的组成部分。”^⑤这种无可奈何的现实态度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是不时兴的。

在法国，法共所得的选票虽然停留在百分之二十上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它的得票比例比这高），它现在却是法国政治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法兰西共和国中力量大体相等的四大政党之一。它自第四共和国期间被赶出政府以后逐渐重整旗鼓，对它来说，在它黯然失色的时期正是戴高乐主义统治的沉沉长夜。也许最为意味深长的是，以社会党人为主的对“左翼团结”（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七〇年间一个固有的特点）的抵制看来已经化为乌有。

此外，共产主义今天遍及欧洲的整个拉丁语系地区，包括伊比利亚半岛。伊比利亚的两个共产党虽然在选举中的得票数大大少于两国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但是它们在工会中的影响却大于它们的非共产党对手。在西班牙，西班牙共产党内部思想和组织上的变化，加上它极为灵活的联盟政策，使它成了必须认真对待的争夺政治影

响——如果不是政权的话——的对手。观察家们也不认为规模虽小却很有力量的葡萄牙共产党会永远甘当反对派。它掌握着大批选民，而且在工会中的基础更加雄厚。

共产党在北欧主要国家中拥有的选民不多，在西德实际上完全没有。然而在英国，力量仍然很小的共产党近年来在强大的工会运动中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而且变得日益能被工党左翼所接受。英国共产党对英国工会生活的关键性部门的影响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大。

“欧洲共产主义”的问世所显示出来的发展感，如果不是必然性的话，充实了上述西欧共产党力量增长的例子。而新闻机构广泛报道拉丁语系共产党的消息更加强了这种发展感，因为新闻机构常常集中宣扬各共产党领导人的“名人”身份。看来意大利和西班牙共产党特别吸引西方的知识分子。而且共产党越来越能被欧洲的民主左翼所接受，而五十和六十年代的共产党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国际政治气氛的变化又进一步突出了共产党发展的感觉。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那个时期是争夺政权的强大对手。

四十年代末期，西欧和美国在文化、政治、思想和军事上都是反对共产党人的，但是在当前，是不大可能重演这段历史的。总之，由于共产党人采取比较谨慎的策略，也由于西方目前反共主义趋于没落，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现在发展壮大可能性甚至比一九四五——四八年时期还要大。

即使如此，也要联系仍很有影响而常常被低估的战后欧洲的民主、政治传统来看待下文提供的西欧共产主义发展的事实和数字。对西欧民主力量能否重新发挥活力并持之以恒尽可表示怀疑，却不应估计过低。即使共产党分享了政府大权或者靠它们自己的力量掌握了政权（这种前景看来显然是黯淡的），它们在把西欧各国“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国家时也将遇到巨大的困难。在两个最容易直接突破的国家意大利和法国，存在着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同样也存在着数百万工人阶级对共产党员的强烈的反感。历史和社会对自由民主和西方自由的回忆是不会被轻易勾销的；如果共产党人改造社会的步子太快，他们将遭到一些强有力的中心——多数中心——的抵制。此外，西欧国家（包括法国和意大利）的经济虽然有困难，但是至少在目前还没有脆弱

到社会秩序分崩离析以至可能引起革命性的政治变革的地步。而且美国在欧洲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加上西德继续保持强大，将必然在某种程度上遏制共产主义在南欧的发展。

欧洲共产党在彻底改造社会时面临难以克服的障碍。在短期内，尽管它们参加了政府，它们的力量继续受到它们想“改造”的国家的强有力的民主传统、制度、政党、习惯和文化的限制。如果它们行动过猛，引起的反应可能是再一次把它们抛开。如果它们行动过于缓慢，它们可能由于党内反对它们的让步和胆怯而分裂。

总之，西欧的共产主义仍是少数人中的现象，但却是一种有可能进一步发展的现象。它还得走一段漫长的路程，但是从它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它已经掌握的力量来衡量，它有理由满怀希望地走这段路程。

共产党人不是只从选举的角度来衡量他们自己在社会上的政治力量。共产党在一条广阔的战线上开展活动。除了企图在民主国家的机构（政府、议会）中取得进展以外，它们还打算使政治文化发生比较全面的变化。这包括提高“阶级觉

悟”，办法是通过罢工行动，诸如影响工会运动，并视情况或是煽动罢工破坏生产，或者采用另一种办法：限制工人的要求，扮演“负责的”政党的角色。共产党还急切地想通过控制新闻和教育机构中的关键性部门来改变知识界的气氛，即通常所谓“建立思想上多数”的策略。

在如此广泛的战线上改造社会的先决条件仍是需要全体党员忠诚、守纪律。

共产党员

党员人数的原始数字不一定很说明一个共产党在总的政治体系中的实际力量，虽然党员人数可观不大会是党的力量无足轻重。总的说，西欧共产党可以分为两类：“大”党与“小”党（有时称为“战士党”或“先锋党”）。⑥意大利共产党是典型的“大”党，在议会中拥有许多议席，而英国共产党是一个在工业部门影响很大的小党。但是，只看党员总数就想来估计这两个党中任何一个党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政治力量，就会歪曲真相。意共的党员人数在二十五年中下降了一百万，⑦但是它的政治力量在这段时期却稳步增长。英共的党员几年来一直在三万人左右，但

是它在关键性的有组织的劳工部门的影响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增长了。因此，党员人数的增减同政治力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即使如此，党员多的党也是最接近政权的党，这是实情。显然，党员越多（只要他们遵守纪律、忠心耿耿），共产党渗入社会、捞取选票以及使自己全面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的可能就越大。想准确地证实共产党的确切人数（其他政党也一样）是一种冒险的做法。学者和其他有关的观察家最终还得依靠共产党本身向他们提供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西欧最大的共产党是意共。它在一九七六年自称有一百七十九万四千零八个党员（占总人口百分之三以上）。而且意共在一九七七年夏季宣布，它在一九七七年的党员人数已经达到一九七六年（九月）的党员人数。意共党员人数自一九七二年以来一直在稳步上升，^⑧扭转了近几十年来下降的趋势。实际上，据估计，在一九七一至一九七六年期间，意共党员增长的速度比意大利总人口数的增长速度高百分之十八。

法国共产党的人数随提供数字的来源不同而各异，但是，看来一般都认为人数在六十万左右

右。从六十年代初以来，法共党员实际上增加了一倍，去年似乎还继续保持上升的趋势。^⑨ 西欧只有另外两个共产党接近“大”党的地位——这一点还可以讨论，就是葡萄牙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伊比利亚半岛的这两个党的确切党员人数甚至比意共和法共的更成问题，因为这两个党刚脱离秘密活动时期。估计葡萄牙共产党有十多万党员；鲁伊·马歇特说，葡共最近开展了发展党员的运动，党员人数因此增加了。对西共党员人数的估计从五万到十万不等^⑩（后一数字是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二）。西欧其他共产党的党员人数都微不足道。^⑪

那么，从全西欧的角度来看，同非共产党（保守党、自由党、天主教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等一起）比较，共产党的这些党员数目表明，欧洲共产主义仍然是一种多么小的现象。除法国和意大利以外，这些党同它们的“资产阶级”对手相比显得无足轻重。然而，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部分在于党员的遵守纪律和忠诚不二——全党的行动一致。支持共产主义力量的这一特点大概保证了有些小党比它们的统计数字表明的重要，而就拉丁语系国家的“大”党而言，意共和

法共(可以说还有葡共)肯定是它们各自国家中组织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但是,无法估计“大”党的大体党员人数同基层“干部”或“积极分子”人数的比例。共产党员并不是个个都积极,因为许多人(特别在意大利)入党只是为了保障未来。

“大”党随着党员增加,党员中“积极分子”的比例显然在下降。然而,令人感兴趣的是,这并没有使宗派活动有明显的增加,也没有造成严重的纪律问题。一些小党所具有的分裂与公开争论的特点(特别是希腊和英国共产党)在“大”党里一般是没有的。新党员的心理偏爱和执行纪律的机构即使不能保证“非积极”党员积极参加党的活动,也保证了他们俯首贴耳。

“大”党在发展的同时,党员更迭(即离开党的党员被新党员取而代之)的比例有上升之势。一九七四年,法共决定吸收有志于献身“民主改革”的人入党,这项决定促使新党员迅速增加。但是即使在此以前,法共党员更迭的比例一直是很高的。一位研究西欧共产主义的学者估计,在七十年代头几年,法共“党员更迭”高达百分之五十。^⑫一九七四年以后,“党员更迭”的比例可能还要高。麦金尼斯说,党员如此更迭说明

“一个政党异常不稳定”。^⑬ 党员中的骨干力量保持不变，但是即使如此，法共在党员人数时增时减的环境下保持团结与纪律到这种程度仍是现代欧洲共产党生活中一个饶有趣味的特点。意共党员更迭的比例也很高，虽然比法共低得多。在一九七二——七六年间，此数平均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四点五。

“大”党党员这样变动对它们的阶级、年龄、性别、地区和宗教组成产生什么影响？这些变化对未来具有什么意义？

阶级：意共和法共仍是工人阶级占优势的党。一九七三年，意共中无产阶级成份的党员（即工农业部门中的雇佣体力劳动者）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七十七点三六。这一比例同一九七一年的比例无多大变化。据最近统计，法共的这一比例是百分之六十点一。^⑭

在意大利，这类无产阶级不包括农民和中产阶级；而意共在这两个阶级中有了值得注意的发展。在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三年间，意共的农民党员减少了百分之二点五以上，而中产阶级党员在党员总数中增加了百分之二点五以上。阿雷教授注

意到另一个有趣的格式。他指出，中产阶级加入意共的人有越来越多之势，中产阶级加入意共的人越多，意共就同意大利比较繁荣的工业和欧洲地区越是疏远，同经济和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比较贫困的地区就越是靠拢。意共中产阶级成份的党员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三年间在意大利北部地区增加了百分之一·三，而在中部地区差不多增加了百分之二，在南部增加了可观的百分之六·六，在几个岛屿为百分之六。在北方，这个过程在发展中，但是速度不那么快。当然，中产阶级中也有一些人——不管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安全如何——是希望站在胜利者一边的。有些零星的证据证明，自一九七四年以来，意共中产阶级成份的党员中这类人增加得很快。

关于中产阶级源源加入法共的证据还难以到手。可以肯定，法共是企图吸引心怀不满的白领人员加入其队伍的。正如克里格尔所指出，塞纳大区在一九二四至一九六六年，申请加入共产党的人员构成发生很大的变化，即从工人转到了教员。^⑮麦金尼斯指出：“从那时以来，情况一直是这样，而且全国都一样。”^⑯

中产阶级加入仍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对

未来预示着什么，这一点还可以讨论。这种变化现在还比较小；但是如果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就可能使意共和法共组织更合法、更明确，哪怕它们继续自称是工人政党的说法显得越来越陈腐也罢。^{①⑦}心怀不满的中产阶级党员还可能加强愤懑情绪的力量。这种情况是两次大战间的那段时期中欧洲革命力量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年龄：这些共产党给外界的印象一般是这样的：它们是以阶级为基础的老年男子的党，它们念念不忘往昔发生于两次大战间那段时期的冲突，特别是西班牙内战，它们由于受理论和列宁主义框框的束缚而思想狭隘，它们对青年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毫无兴趣。当然，在五十和六十年代，甚至在大党里，共产党员这样古板同现实也是相适应的。共产党老化了。法共和意共都企图改变这种状况，特别是从一九六八年学生闹事和青年极左翼运动发展以后。两个党中，看来法共取得了很大成功，党员的平均年龄下降了。^{①⑧}另一方面，意共的年龄结构看来近年来没有什么变化。意共一方面要显得自己是一个年青人的党，一方面又要掩饰党员中的年龄分布情况。说明吸引

青年人入党依然成问题的一个迹象是它属下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人数在下降（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七年间减少了百分之十五）。据统计，意共党员中年龄“不满二十五岁”的只占百分之十一。

“大”党的党员肯定得到了充分的补充，虽然不象它们自己宣称的那么多。没有证据表明，共产党吸收青年党员的工作毫无成绩以至党员人数有迅速减少之势。对共产党来说，目前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是：如何诱导有政治觉悟的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活动分子脱离极左翼。（毫无疑问，如果“大”党继续向它的党员提供在社会中发迹的机会，这些青年活动分子在他们成长的时候就会有许多人在成长过程中以选择“欧洲共产主义”为满足，六十年代美国大学的激进分子中有大批人就是这样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是美国生活的中流砥柱了。）“大”党的另一个潜在问题是，它们是否有能力引导下一代青年人参加纪律严明的党组织。意共最近在青年联盟遇到的问题预示着将来可能有较大的困难。

性别：同解决青年问题一样，共产党也企图改变它们是以男子为主体的党的形象。英共想把

“妇女解放”与“建设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并从“克制个人关系”^{①⑨}的角度来看待妇女问题。

意共更保守，认为妇女“在工作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水平很差。^{②⑩}意共在妇女问题上还得走钢索。它曾开展争取女权的运动，动员力量支持妇女极为关切的一些问题——如一九七四年关于离婚问题的公民投票以及一九七六年争取解除对堕胎法的限制。同时，它又小心翼翼地不脱离它称之为“天主教徒群众”中流行的观点，特别是家庭生活神圣不可侵犯的观点。例如，贝林格攻击“自由意志论”是“使……一切真正的家庭关系……化为乌有的……毒品”。^{②⑪}

但是，几乎没有有什么证据表明加入“大”党的党员中女党员的人数有显著的增加（在这方面，“小”党也一样）。意共中女党员的比例在过去五年里比较稳定，约占百分之二十三。克里格尔说，法共女党员的比例在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二年间上升了（从百分之二十五点五提高到百分之三十）。^{②⑫}共产党内占压倒多数的仍然是男党员，欧洲其他左翼政党大多数也是这样。拥有大批女活动分子尤其是英国保守党的一个特色，没有一个共产党可与它媲美。

地区：西欧各国共产党员的地区、省份和区域的分布情况千差万别，无法提出任何明确的说法，只能作最笼统的概括。在欧洲北部的两个主要国家英国和西德，共产党员大量集中于工会力量最强大的工业地区。德共的绝大多数党员是在鲁尔工矿区吸收的。英共党员也大量集中于日趋没落的老工业区：苏格兰、伦敦东区、南威尔士和兰开夏。^{②③}在欧洲北部的农村地区实际上没有共产党员，因为那里的农业高度机械化，效率高，没有农民。例如，在东英吉利——它是一个有着激进自由主义历史的大农村地区（在议会中有几名工党议员），英共只有二百五十名党员。

学者们指出，在拉丁语系欧洲，支持共产党的思想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工业界、城市里的无产阶级，产生于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阶级传统；另一种是农村的农民共产主义，常常不是出于思想和阶级觉悟，而是源出于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和反教权主义。当然，在整个拉丁语系欧洲，前一种的力量比后一种大，但是两种力量显然都是存在的。虽然葡共主要是一个工人的政党，大部分党员集中于里斯本工业区（其次是

波尔多），但在阿连特如、里斯本以南和以东地区的农业劳动者中也拥有雄厚的力量。^{②④} 西班牙农民支持西共的人不那么多，真正的农民、即有少量土地（或小庄园）的人，几乎都不支持它，大庄园的农村无产者支持共产党的也不见得更多。从地区看，西共党员主要集中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等省和阿斯图里亚斯矿区以及安达卢西亚的部分地区。从党员分布的地区和部门来看，法共和意共的基础广泛得多。法共的力量虽然主要在法国北部的工业区为中心的周围地区，但是它在中部山脉、特别在罗纳大区的农民中的力量还是很大的。^{②⑤} 意大利各大区之间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仍有差别，虽然差别在缩小，但是意共党员在大区和部门中的分布却比这些差别所表明的均衡。

阿雷教授为本书分析了意共党员在意大利各大区居民中所占的比例，他关于意共党员地理分布的结论表明，这个欧洲最重要的共产党已经渗透到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在意大利中部的艾米利亚—罗马尼阿、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的“红色地带”，党员与居民的比例分别为一比九、一比十四和一比十八（全国的平均比例为一比三十

三)。在西北部的皮埃蒙特、利古里亚和伦巴底等大区，这一比例分别为一比五十一、一比二十四和一比四十四。在天主教徒聚居的东北部和威尼托、特兰提诺—阿尔托—阿迪杰和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等“白人大区”，比例分别为一比五十三、一比一百七十五和一比五十。在意大利中部的马尔凯大区是一比二十五，在拉齐奥大区（包括罗马）是一比五十一，在包括意大利南部的几个地域辽阔的大区中，党员与居民的比例是一比五十四。

党员与居民的比例为全面衡量意共在社会里的力量提供了一把重要的尺码，值得注意的是自一九七〇年以来，它在各大区的力量又有了增长，虽然各大区之间很不平衡，但是看来差距在缩小。同意共得选票的情况一样，党员与居民的比例在全国已经比较平衡。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样，农民成份的党员的比例在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三年间下降了，但意共依然能在象罗马尼阿和翁布里亚这样一些大区（包括一些面积不小的农村地区）使党员在居民中占这么高的比例，而且在南方实际上从头开始发展了党员，这一事实表明，意共得到的社会支持依然是很广泛的。对

意共的支持日益“遍及各地”，这是意共有别于所有西欧其他共产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宗教：共产党员与天主教会的关系如何、信奉天主教与参加共产党的关系是否有变化、教会权力削弱是否对共产党发展党员发生了影响、一九六四年第二届梵蒂冈教会公共事务理事会会议的结果是否有任何政治影响、社会和左翼天主教的发展对共产党发展党员和争取支持有无影响，南欧各国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很不够。各拉丁语系国家的共产党都在争取工人阶级中天主教徒的选票，并谋求同教会缓和关系。早在一九五六年，尚处于地下的西共便开始鼓励共产党员与天主教徒接触，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宣布西共可吸收神甫入党。^{②⑥} 卡里略也强调，如果西共要取胜，就必须把教会争取过来。^{②⑦}

在法国，罗歇·加罗迪——他在一九六九年被开除出党以前是党内哲学家——向天主教左翼献媚。麦金尼斯指出，法共组织很愿意同无党派的天主教领导人打交道——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选票。^{②⑧} 在意大利，意共在社会政策和道德立场上避免冒犯教会（实际上，贝林格夫人望弥撒，

常常事后加以宣扬)；它对梵蒂冈领导层中希望同意共达成契约式解决办法(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的那些人予以鼓励；它企图使共产党人同天主教徒在出现的一些特殊问题上携手合作(举行公众集会和抗议)。

共产党通过这些建议得到些什么收获现在还不清楚。看来它们的主要目的在于改善共产党的总的政治处境和吸引选票。共产党(可能西共除外)不大想吸收虔诚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加入它们有组织的基层队伍。接受天主教徒的选票是一回事，欢迎天主教神职人员加入党组织显然是另一回事。

共产党人参加竞选

调查共产党的选举实力应当包括与之有关的两个条件。第一，选民的支持是衡量共产党在一个社会中力量的重要的——虽不是最终的——标志。英国就是对人很有启发的一个例子。英共建党五十七年来在议会中只得了两个议席，从一九五〇年以来，下院没有共产党的议员。英共在一九七四年十月大选中只得了区区一万七千零八票——比它自己说的党员人数还少，^⑳也比极右翼的新

法西斯主义小党民族阵线得的票数少。在一九七四年十月的大选中，原预料英共将在苏格兰丹巴顿郡的中央区的成绩最佳。这一克莱德湾地区有共产党人领导工人斗争的历史，不象英国其他地区那样对共产党怀有根深蒂固的疑虑和敌意。它是“红色克莱德”地区的中心。选举结果很说明问题：工党得票百分之四十点二；苏格兰民族党百分之二十九点一；保守党百分之十七点二；共产党百分之八点七；自由党百分之四点八。^⑩

第二，不能因为共产党在选举中得票不多——实际上是微不足道——而低估它，同样，也不能把选举成绩好误以为是授权于共产党。投共产党票的选民并非个个是共产党员；有的甚至连共产党的同情者都不是。共产党候选人的得票数既可以衡量赞同或支持共产主义的程度，也同样可以衡量反对现政府的程度。在共产党候选人在某些选区得票占第二位的国家（法国第一轮选举以后投票结果常常是这样）中，或者在共产党在全国得票占第二位的国家（意大利就是如此）中，投共产党的票可能是反对、限制或只是吓唬多数党的最有效的办法。

此外，除了一贯是共产党选民的中坚力量以

外，有证据表明，有许多人之所以投票选共产党人是以此作为“手段”。他们同别人一样把共产党看作是达到某些目的（通常是经济目的）的一种“手段”。据信，如果共产党不能实现这些目的，将来就可能撤回这种支持。换言之，许多选民（特别在拉丁语系的欧洲）把共产党视为性质同民主政党相似的党，视为随环境不同而予以支持或反对的为我所用的政治工具。某些政治学家争辩说，利用选举作“手段”的人在增多，^⑩特别在富裕的工人中间。如果这是实情的话，那么，因为选举中有可能出现这种倾向而排斥共产党，那也是蛮横的。

即使如此，在无记名投票中选举共产党人不需要选民长期赞同共产主义事业，但是这确实表明了某种程度的欢迎，表明选民方面没有传统的疑虑或恐惧。因此，在西欧，共产党选票的多少不一定向我们说明赞同共产党的人的多寡（共产党员人数是更好的标志）；然而，这确实可以告诉我们，共产党赢得了多大程度的欢迎，它克服了多少传统的敌意，它未来的潜力有多大。

如果我们把西欧（大体）分为南北两部分，那么就可以发现欢迎共产党人的态度有惊人的差

别。在欧洲北部最近举行的大选中，共产党平均只得每个国家百分之五点零一的选票。当然，这些数字由于小国（如象挪威、冰岛和卢森堡）多而变相地提高了，因为在这些小国中，共产党选票所占的比例比较大。^{③②}在四个拉丁语系的欧洲南部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每个国家的平均数约为百分之二十。把这四个拉丁语系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共产党在最近举行的几次全国选举中所得的选票达二千零三十万，^{③③}而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得票一千七百二十万。^{③④}如果看一下欧洲南部的情况，那么显而易见，共产党人已经在全体选民中确立了为首的左翼政党的地位。当然，各个国家共产党的得票情况大不相同：在西班牙远远落后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在葡萄牙则远不如社会党，但是在法国只比社会党少得有限，在意大利则比最接近的左翼党遥遥领先（众议院选举中领先九百多万票）。

意大利 意大利是共产党的选举政策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国家。意共在一九七六年大选中得一千二百六十二万五百零二票，占总数百分之三十四点四四。此外，大概除一九四八年以外，意

共在第二次大战以后的历次大选中的选票一直是增加的：⑤

年 份	意共票数	占总数的百分比
1946年6月	4,356,686	19
1953年6月	6,120,809	22.6
1958年5月	6,704,454	22.7
1963年4月	7,763,854	25.3
1968年5月	8,557,404	26.9
1972年5月	9,085,927	27.2
1976年6月	12,620,502	34.4

这说明意共的选票是稳步而持续地增长的，七十年代有了重大突破（一九七二到一九七六年间，他们的选票猛增百分之三十九点一五）。

意共在选举中的进展可从一个有趣的侧面得到证明：它的选票上升大体同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选票下降成反比（意大利社会党的选票比例一九四六年是百分之二十一，一九七六年下降到百分之九点六六）。意共在“左翼”选票中所占的比例一九四六年是百分之四十七点七，一九七六年猛增到百分之七十三点八。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意共党员人数一九七一到一九七六年间也增加很多（增加了百分之十

八点七七)，但是，看来党员人数曲线上升不如意共选票曲线上升得那么突出。这可能给意共带来问题，因为它的选票的增加第一次同它的骨干力量、党员积极分子的人数不成比例。意共对这一差距所作的反应是：重新号召忠于它数十年的领路人和领袖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所倡导的“群众党”的传统。它还需要更多的党员和争取发展。

它企图用这种方法保证在它的选票总数增多的同时也加强党员的骨干力量。

一九七六年意共选民的社会构成很难断定。即使如此，连续三次的典型调查（一九六八年、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五年）显示了某些令人感兴趣的趋势。例如，在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五年间，意共的体力劳动者选民的百分比大大下降；^{③⑥}这趋向于证明，意共选民的社会基础变得更广泛了（意共党员中也有类似的趋势）。实际上，意共选民（社会成分）开始同意大利全体选民相象，虽然意共多少保持主要代表体力劳动者的倾向。意大利现代选举政治中出现了一个惊人的情况：目前，天民党人和意共都能自称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而过去只有天民党才有这样说的资格。^{③⑦}

从地区上看，意共的选民也使意共越来越有

代表性。在一九七六年，意共在全国各地所得的选票比它历史上任何时候所得的选票都均衡。意共虽然在各个大区的选票都增加了，但是“红色”地区增加的百分比低于许多传统上支持天民党的地区或边远地区增加的百分比，在“红色的”罗马尼阿、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意共选票（在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六年间）增加了百分之五点零一；而在传统上支持天民党的南部地区和一些岛屿，则增加了百分之七点七，甚至在天民党的心脏地带（威尼托、特兰提诺—阿尔托—阿迪杰、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也增加了百分之六点二。^③意共现在各个重要的大区不是第一、便是第二大党。地理上的广泛突破意味着，意共现在可以比较轻而易举地从用作“手段”的投票中捞好处。如果不满现状的无党派选民想把现任地方政府或全国政府赶下台，他们必然投意共的票。

意共在意大利各大区的力量可以同英国自由党在地区的力量作对比，以说明地区基础对一个反对党的重要性。英国自由党人在一九七四年二月的英国大选中得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选票，然而他们在议会中只能得十三个议席。他们没有得到大事宣扬的突破，因为他们没能在全国确立第二

大党的地位，实际上连在一个地区都不是第二大党。英国自由党人同意共不一样，他们没有地区基础。

按年龄、性别和宗教来分析意共的选票比按地区分析更难。意味深长的是，继续投票选天民党人的妇女（在南方多得惊人）比选意共的妇女多，虽然差距可能在缩小。简直无法断定选意共的天主教徒有多少。阿雷指出，当今意大利社会各阶级中，信教的人少了；但是还没有人来研究这种情况同政治行为之间的联系。但是，不需要绞尽脑汁就能得出下述结论：随着信教的人减少，或换一种情况，一旦（天主教教义同共产主义之间）在哲理上接近或政治上和解，那么，意共很可能更受欢迎。意共一九七六年赢得了百分之三十七点五的青年人（十八至二十五岁）的选票。这一比例比它吸引全体意大利选民的比例高，值得注意的是，意共吸引青年选民的能力比它吸引意大利青年入党（和继续留在党内）的能力更突出。

法国 从其在选举中得到的社会和地区的支持的面来看，意共现在很可以声称它是一个具有

代表性的全国大党，丝毫不比天民党逊色。在这方面，意共在国内拥有的政治合法性是法共在法国所没有的。战后的历次大选中，法共获得的选票从来没有超过百分之二十八点六，并且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这个高点起，下降到一九七八年三月第一轮投票中的百分之二十点六。法共在战后的平均得票数相当于总选票的百分之二十三点四，在任何一次选举中，法共所获选票占的百分比都不高于或低于这个百分比的百分之四点九五。实际上，在一九六二年以来的五次国民议会选举中，它所获选票的增减幅度只有百分之二点五。与意共不同，法共所获选票的曲线的波动幅度很小很小。因此，为了议会选举，法共需要结成大的联盟。

法共有广泛的地理基础，因为共产党的选票不限于北部工业区（农村也有支持它的，特别是在法共党员多的地方——法国中部〔贝里和阿热内〕及南部）。^{③⑨}但是法共在地理上不象意共那样无处不在。从社会分类来说，法共所得选票约有百分之五十来自工人阶级，农民选票不足百分之十；^{④⑩}但是法共候选人只得到工人阶级总票数中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实际上，社会党和

“多数党”在其号召力方面可以说同工人阶级是相差无几的。④

法共选民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法共对公营部分领工资者的吸引力在明显增大。一九七三年法共正是在这类人中获得了比其他任何一个党都多的选票。这可能有助于说明法共为什么对进一步国有化特别感兴趣。一九七三年，法共在公营部分的领工资者中拥有百分之三十三的选票，在私营部分拥有百分之二十七的选票。看来有理由认为，法共把扩大公共部门视为摆脱它目前在选举方面的困境的一条出路。

总而言之，法国共产主义在选票方面处于停滞不前状态，缺乏意共那种长进和富于变化的特色。虽然乍一盘算，法共可以指望获得它通常获得的五分之一的选票，但是其余五分之四反对它，这一点看来却是一个永久的事实。如果法共想继续走议会道路，看来它只有两个选择。第一是，它可以谋求重建它一九七二年与社会党结成的那种联盟。这种策略假设社会党既是统一的，又是愿意再度恢复共同纲领的，即令有一九七七年秋天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分裂创伤也罢。另一种选择是，法共可以希望从社会党的虚弱无

力、支离破碎以及经济危机中得到好处，而经济危机可以把那些踌躇不决的选民驱向激进的经济解决办法。但是从短期来说，看来法共在使自己成为一支有吸引力的政治力量方面是没有什么作为的。它将继续需要联盟。

伊比利亚半岛 伊比利亚半岛各国人民经过长时间政治上的休止期以后，对民主选举的经验是不熟悉的。因此，推翻了卡埃塔诺和佛朗哥去世以后确立的选举格局可能不会告诉我们许多关于未来的事。西班牙共产党在佛朗哥之后的第一次舆论考验中的情况并不象许多观察家预料的那样好。在一九七七年六月议会选举中，西共只获得了百分之九点四的选票，因此在众议院（三百五十个席位中）只获得了二十个议席。它的选票主要集中在加泰罗尼亚、安达卢西亚和马德里。在西班牙的其他地方，西共的选票是微不足道的。在加利西亚、莱昂、埃斯特雷马杜拉、穆尔西亚、老卡斯蒂利亚、纳瓦拉、阿拉贡以及出人意料的还有巴斯克地区，西共都没有获得议席。在阿斯图里亚斯矿区，西共只获得了一个议席。^④

相对来说，西共得票较少，原因何在，学者

和观察家们看不大清楚。当然，西班牙的新选举制度过分代表了西班牙较保守的农村地区，这有助于说明西共获得的选票与西共在议会的代表之间的差异。另一种说法是，西共在其合法化以后没有多少时间准备选举；即令如此，它的有高度组织性的机构本应能够克服这一特殊障碍的。答案大概部分在于西共的主要左派竞争对手社会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在选举中很得势，他们获得了百分之二十八点五的选票。即使如此，西共由于获得了一百七十万选票，已成为国内选票占第三位的一支力量，顺便说一句，比它上次在佛朗哥以前的共和国时期（为了选举而并入人民阵线以前）作为一个单独的党参加竞选时的得票情况要好得多。西班牙的政局仍然动荡不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易于分裂，在哲学上采取折衷主义，其领导人没有经受过考验；卡里略为人精明、能顺应时势，也很机敏；因此不能排除西共成为一支强大的竞选力量的可能性；但是西共需要联盟。

虽然葡萄牙共产党的形象（和现实）是一副顽固守旧的斯大林主义的形象，但是葡共在选举中得到的支持却大大超过了西共，并接近于法共

得到的支持。在一九七五年四月制宪议会的选举中，葡共（与它的政治阵线组织葡萄牙民主运动结成联盟）获得了百分之十七点六五的选票。虽然葡共在一九七六年六月的总统选举中受到了挫折（因为有左派候选人奥特洛·卡瓦略的竞争），但是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的市议会选举中，葡共与葡萄牙民主运动结成选举联盟获得了百分之十七点七的选票。即令如此，看来葡共目前停留在这个水平上，这和法共的情况很相似。

从拉丁语系欧洲的选举情况对共产主义所作的分析来看，有两点很突出。第一，共产主义仍然是一支持续的少数政治运动；在其极盛期（一九七六年在意大利），百分之六十五点五的选民反对共产主义。第二，看来共产党在选举方面取得足够大的突破以致可望通过选举获得政权的只有意大利。然而，即便在七十年代在选举方面进展迅速的意大利，意共的前景看来仍需把搞数年的联盟和分享权力作为其最乐观的目标。意共要在意大利议会获得全面多数，这在今后若干年看来是一个达不到的目标。除了西班牙共产党外，其他拉丁语系国家的党在选举中获得的支持看来已处于平稳状态无法再增长了。在这种仍然主要

是敌对的选举环境中，南欧各共产党将要继续在这方面下功夫，即除了通过选举外还要用其他手段谋取社会和政治权力。

共产党和工会

在衡量共产主义这种现象的深度时，必须把考虑的面不仅仅放在共产党的选举实力和党员的多寡上。的确，共产党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它强调利用其他组织来增强它的力量。在这方面，共产党是很出色的。民主党派偶尔也设法控制和利用其他机构，但是它们并未——而且大概也不可能——系统地谋求控制和动员起社会大多数重要部门。它们既没有建立一个“国中之国”并利用这样一个“机器”来巩固它们对整个社会的控制的意向，也没有这样做所需要的训练有素的干部。

当然共产党的这种策略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但是在欧洲各党贯彻这一策略的方式中却显然有一些重大的新因素。

共产党谋求施加影响的有三个基本的舞台。第一个是，他们一心要在重要的非政府组织、即共产党所说的“群众组织”中取得重大影响。在美国和大不列颠，这些组织常常被称为“阵线组

织”。^{④③} 这都是些自愿组织，有大批人参加，在现代社会中有影响。共产党不能期望把这些组织的所有成员都并入党内。的确，即使他们能够这样做，他们大概也不愿这样做，因为，如果把他们并入党内，就会削弱党的纪律和冲淡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由于这些组织无论从目标或成员来说都不是正式的共产党，因此它们以表面上不是共产党或者“阵线”的身份便可以发挥有益的作用——当然，要共产党人牵头才行。

共产党发号施令的局面是通过共产党训练下的共产党富于战斗性的分子谨慎地渗入这些重要的非共组织实现的。在欧洲，这种类型的渗透常常被称为“打进去当核心”。以这种方式活动的共产党组织被称为“核心”。^{④④}

共产党活动的第二个舞台是国家机关。列宁教导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以后立即摧毁国家机器（政府、警察、军队），并用“无产阶级专政下”控制的新机构来取而代之。然而，这种策略最近已被一种不同的作法所代替，特别是南欧诸党。

这些党现在不是在使资产阶级国家不起作用之前等待革命，而是设法渗透到资产阶级国家的机构中，以确保在共产党成为政府的一部分之前

和之后这些机构不被用来削弱共产党。然后，当共产党获得了完全的革命政权时，国家机构将不必摧毁，而是只把不顺从的人清除出去。英国共产党已贴切地详尽概述了如何进行这种清洗：

“凡是不愿执行政府政策的人，或者没有能力执行政府政策的人，就让其退休或者找其他工作，凡是想方设法破坏贯彻社会主义立法的人，将依法处置。”^④ 没有提供关于“破坏”究竟是什么意思的确切解释。

共产党人显然感到，他们可以让他们富于战斗性的分子为国家工作，而不必冒这些人被同化或染上资产阶级的习气的危险。党的干部仍然受到严格的党纪的约束。共产党从经验中发现，它们能够控制它们的议员和当选的市政官员以及他们在阵线组织中工作的干部，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许多非选举产生的国家机构里，这是一种可行的策略。

共产党活动的第三个舞台是马克思所称为的社会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地方。这一点在意大利共产党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一八九一——一九三七）的著作中有详细论述，意共和西共进行了实践，在一九六八年五月的事件以后法

国对这一点也进行了许多讨论。这些党渐渐地强调以“文化”手段赢得政权。这些党认为，通过在学校、一部分教士、工会、宣传机构以及重要的文化工具中获得影响的办法，它们就能够建立一种意识形态的多数，这个多数甚至比议会多数还重要，它们认为，这是因为要获得政权就要具备文化方面的先决条件。只要报纸、电视、布道和教科书反映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现状，反映各阶级之间在财富和权力方面的巨大差别，人们就会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如果人们在学校、宣传机构和教堂接受的信息是，现状有缺陷，可望进行变革，公众就不再会被动地接受资本主义秩序。葛兰西说，如果要革命的政治行动产生重大效果，就必须使公众的态度发生这样的变化。因此，欧洲各党现在比以前更强调做知识分子和宣传机构的工作，以求扩大共产党的实力。^{④6}

关于这些党在阵线组织、政府机构（如警察、军事机构和民事机构）以及文化舞台的影响的情报很难得到。当然，很容易夸大共产党在这些舞台的影响，从而说明共产党构成了一个大威胁。但是也很容易缩小共产党控制的规模，说什么这些党不仅没有控制重要的机构，而且事实上已被

这些机构同化。不幸的是，对这些问题几乎没有进行什么具有真知灼见的系统研究，即使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研究也没有。^{④7}

工会 但是从最重要的一种非政府组织——工会，是有可能估计共产党的实力的。在南欧大部分地区以及在英国（但是北欧大部分地区不在此列），共产党控制着劳工运动的大部分。虽然南欧受共产党控制的工会中的许多工人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投共产党的票，因而不能指望他们自动执行共产党的政策（除非他们认为这种政策符合他们的利益），但是共产党在有组织的劳工中的实力给共产党在欧洲的力量增添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它使共产党可以有力地利用一些问题来获得影响，这种影响只通过党员是达不到的。

从对工会领导的政治倾向、内外政策和已知的它们的财政支持来源所作的检查来看，看来共产党已经控制了很多阵线组织。^{④8}

在法国、意大利和葡萄牙，一半以上的工会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在西班牙，大约百分之四十的工会是共产党领导的。在法国和意大利，有三个全国中心，但是在这两个国家，主要中心——

法国总工会和意大利总工会——的领导人 是共产党。例如，在法国，总工会高级决策机构的十二个成员中有九个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两个是法共政治局委员，还有几个是法共中央委员）；在意大利，总工会领导班子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其中几个地位很高。在西班牙，在四十多年来举行的第一次重大的工会选举（一九七八年春）中，当选的代表中约有百分之四十是共产党的联合会（工人委员会工会联合会）的候选人。工人委员会的高级决策机构——总联盟的二十七名成员中有二十四名是西共党员。在这些人中，两名是西共执行委员会委员，将近一半是西共中央委员。在葡萄牙，三百六十个工会（百分之九十一的工人加入了工会）中，大约二百八十七个属于葡共操纵的总工会，或者与总工会密切合作。

共产党领导的这些工会的对内对外政策立场也与它们各自的共产党的立场几乎是一致的。虽然偶尔也有不同——通常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有分歧，但是多年来共产党得以使工会的官僚接受它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

在其总的对外政策立场方面，工会与它们各自的共产党是完全一致的。虽然外交并不是工会

及其报纸主要关心的问题，但是法国总工会、意大利总工会、（葡萄牙）总工会以及总的说来还有西班牙的工人委员会都支持它们各自的共产党的对外政策目的。在通常情况下，凡是它们的党和莫斯科在一定时间里所鼓吹的问题（例如，反中子弹、支持埃塞俄比亚、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运动），它们都是支持的。它们几乎总是颂扬苏联集团中的生活和工人的状况，而谴责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其他“帝国主义”势力的活动。

在国际工会一级，它们奉行的是它们的共产党采纳的总方针，而且一般地是与世界工会联合会这样一些苏联控制的国际劳工机构进行合作的。同样地，当出于国内的策略原因，这些党想要疏远莫斯科和试图随欧洲政治的大流时，工会也照办。例如，为了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国际姿态保持一致，意大利总工会在七十年代中期放弃了它从属世界工联的地位，而成为一个联系成员，它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使它能够加入非共产党的欧洲工会联合会（代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工会的泛欧劳工组织）。同样地，西班牙的工人委员会和葡萄牙的总工会没有参加世界工联，这样它们也就会有加入非共产党的国际劳工机构的灵活性。这

种姿态与莫斯科长期以来为了使国际劳工运动在它的赞助下统一起来所作的努力是一致的。这些工会组织当然仍然频繁地参与苏联劳工集团的活动。它们与苏联集团的劳工官员和世界工联保持亲善并多次互派代表团，它们彼此之间也是这样。

人们对这些党和它们的工会之间的财政关系所知道的一点情况表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在法国，总工会多年来一直接受法共和苏联集团提供的大量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当时的内政部长社会党领导人朱尔·莫克用确凿证据证明了这一点。在那以后，让·蒙塔尔多在公布的关于一个党的财政情况的一项最全面的研究里指出，包括总工会在内的主要阵线组织的经费是存在苏联拥有的一家银行里，法共也把它的钱存在那里。^④法国《东西方》半月刊和《社会和工会研究》也分析了法国总工会和法共的财政结构，得出的结论是：法国总工会从内部得到的资金虽然可观，但要支付它的所有活动经费却是不够的。几乎可以肯定法国总工会是从外部接受经费，或从法共或苏联人那里接受，或者这两方面兼而有之。

对于意大利和西班牙工会的财政关系情况知

道的要少一些。过去人们普遍认为，俄国人和意共是接济意大利总工会的。但是，自从建立了一种查核制度以来，并且由于其他原因，意大利的工会在财政方面已变得独立得多了。的确，对意共财政情况所作的不多的分析之一表明，意大利总工会“现在是意共财源的一个主要捐助者”，^{⑤①}如果这个情况属实，那就表明它们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

多年来，西班牙共产党及其地下工会组织无疑是接受苏联支持的。最近，据信工人委员会接受世界工联、东欧一些工会以及西欧的一些持同情态度的工会如法国总工会和意大利总工会的支持。^{⑤②}

但是，在葡萄牙，显而易见，葡共的工会接受来自葡共自己以及苏联集团的相当大的财政支持。^{⑤③}而且，（英国）前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和（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分别对苏联向葡共提供的资金作了公开的估计，估计这笔钱为五千万到一亿美元。^{⑤④}

除了财政支持外，领导班子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政策问题上，工会显然是言听计从，根据这些情况，看来南欧各党控制着它们各自国

家大约一半的工会运动。当然，有些人会说，这方面的效用是有限的。他们会指出，这些国家的全体工人中只有大约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是有组织的，南欧的劳工运动并不强大，是工会影响共产党，而不是共产党影响工会。^{⑤4}

虽然关于欧洲的大多数工人不是工会会员的说法是正确的，但大多数工业国也是如此。确实，除了斯堪的纳维亚外，南欧的这种格局并非不寻常。例如，在美国，工会会员在工人中甚至连四分之一还不到；但是，几乎没有人否认这一点：劳联—产联是美国最重要的势力中心之一。除了工会的政治机构外，工会会员有家属，这些家属参加投票，工会会员自己也倾向于投票和在政治上表现得比非工会会员活跃。

当然，南欧的大多数工会在工作场所和谈判过程中倾向于此——比方说美国的工会要软弱和容易分裂。然而，在政治活动方面，欧洲人却常常是足智多谋、有组织技术，也有办法，在这方面，他们超过了美国工会的政治能力，虽然，与美国的劳工运动不同，他们不能轻易独立于他们所依附的政党来使用这种办法。

最后，虽然非共产党工人的要求有可能回转

给共产党的领导人，并且共产党的工会干部为了保持他们工会的地位，可能渐渐代表他们的会员向共产党提出要求，但是看来这不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工会哪怕是对一项政策进行一下辩论、作出决定并确保这项决定得到共产党的通过，这种事也是少有的。情况几乎总是相反。当然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共产党的工会干部象共产党的其他官员一样，也是凭他们从党的机构中得到的支持来保住自己的地位。如果共产党的领导，包括政治局或者执行委员会的工会领导人决定撤换某位共产党工会干部或调他干别的工作，这是很容易办到的。个人首先是要为党效劳，其次才是为他们的组织效劳。

这并不是说共产党会忽视它的工会领导人和工会事务专家的意见。的确，法国总工会领导人乔治·塞居伊或者意大利总工会领导人卢恰诺·拉马的意见大概是共产党在决策过程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但是一旦最高领导决定了什么是对党最有益的，工会官僚就照办。

但是共产党对广大工会会员有多大的控制能力，这一点并不很清楚。很多事情取决于牵涉到的具体问题，以及非共产党工会是否组织得好和能

否有效地抵制共产党。还取决于共产党工会中从上层到中层以至基层一级的干部是否全是党员。如果他们是党员——例如法国和意大利的许多大工厂里就是这种情况，他们就能够影响工会会员。如果他们不是，共产党要把它的命令变为行动就比较困难。

即使百分之九十的基层干部是党员，共产党要控制工会基层队伍也并不总是容易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人曾反对法共和意共以及法国总工会和意大利总工会的“斯达汉诺夫政策”，^⑤也反对它们在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企图破坏马歇尔计划。最近，许多意大利工人对意共和意大利总工会在工资要求方面的温和态度感到不安。但是共产党的工会领导人通常深知，一方面是工会会员的经济需要和要求、另一方面是要把工会权力用于政治目的，这两者之间是有着潜在的真正矛盾的。有时，这种矛盾可能给共产党造成政治和工业管理上的严重问题。

然而，对工会机构的控制（通过成千上万工人代表和劳工报纸）使共产党可以每天接触到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在南欧，大约是五百万工会会

员和数百万不交纳会费但是富于同情心的工人)。而且，共产党必须并且继续利用工会机构动员工人举行示威和从事竞选活动。这使它们能够组织大规模示威、短期政治罢工和能够影响非共产党选民和政界人士的其他活动。这使共产党得到了一种支持，这种支持与工人队伍中的共产党人的数目很不相称。

在发生政治危机的时候（例如为了帮助或防止一场政变），共产党能够利用它的工会力量和机构的程度是难以估计的。但是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中，不乏用工会作为尝试夺权或制造不稳定的手段这种策略的重要性的例子。^{⑤⑥}

在英国，工会运动如果说不是更重要的话，至少也是同样重要的——但是在几个不同的方面。在主要工业国中，英国是工会化程度最高的。占劳动大军将近一半的一千多万人属于工会。此外，大多数工会直接与主要政党之一挂钩，并且是英国政府必须重视的最重要的唯一利益集团。虽然从竞选角度来说，英国共产党是完全无力的，但是至少在最近，通过它在工会运动中的实力，英共已在工业方面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在政治舞台上也有了相当大的影

响。

英共在工会方面的策略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政治策略，目的在于影响工党的方针。在上次统计时，与工党直接挂钩的有六十二个工会（包括几乎每个重要工会）。这些工会控制着工党年会上所投的票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并（直接或间接）选举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两届年会之间工党的执行机构）二十八名委员中的十八名。年会和全国执行委员会决定党的全盘政策，并与地方选区的工党组织一起挑选出工党在议会的候选人。

第二是英共的工业策略，目的在于影响工会在工业中所起的作用。英国历届政府在把范围广泛的一系列政策提交议会之前都要先同职工大会的领导人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磋商。英国的工会权力在希思政府于一九七三到七四年间被矿工击败以后得到了公开的加强，这种权力通过工党政府和职工大会之间的一系列“社会契约”被明文规定下来，在写本书的时候仍在搞这种“社会契约”。因此，对工会运动的控制或者从内部对工会运动施加影响可能导致对英国社会具有政治发言权，而不管这种发言权在竞选中有多大的力量。

在英国国内的政治辩论中，现在甚至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届新政府如果不同意工会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迫切需要，这个新政府能否有效地治理英国。保守党领袖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在一九七七年保守党年会上发言时说：“人们一再向我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工会是否允许保守党政府执政？……’。”^{⑤7}

英国的工会运动在它诞生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受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控制。战后一些年里肯定是这种情况，而且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中期。工会领导人是休·盖茨克尔（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三年工党热情洋溢的社会民主领导人）的主要支持者。但是，随着六十年代的进展，主要工会的政治面貌开始有了变化。在许多工会里，社会民主领导班子被左派社会主义者所代替。工党前副领袖兼外交大臣乔治·布朗勋爵一九七二年四月描述了这种趋势：“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领导工会的人是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现在，我认为今天情况不同了。主要工会有了不同的领导班子，观点也不一样了。”^{⑤8}

这种“不同的领导班子”大多是左派社会主义者——即民主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社会民主主

义者。与欧洲大陆不同，英国左派社会主义的传统直到最近还建立在乌托邦、基督教和合作社的思想基础上。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总书记弗兰克·卡曾斯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一直恪守这种传统。但是，更近些时候，工党和工会的左派表现出了更明显的马克思主义色彩。

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英共一直在全力渗入某些关键性的工会，它的努力没有白费。在三百五十名最重要的工会干部中，约有四十名是共产党员。英国的大工会——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是被渗透得最深的工会之一。虽然该工会的执行委员会的作用不象其他大多数工会那样大，但是在它的三十九名委员里至少四分之一是英共的公开党员。第二大工会——混合机械工人工会——是决定忠于英共还是忠于温和力量的一场战斗的角逐场。控制权反复改变，但是共产党肯定在该工会的各理事会有强大影响。混合机械工人工会最近举行了选举，选举的高潮是坚决反共的特里·达菲获得了胜利，当了主席（取代休·斯坎伦），这是共产党遭到的重大挫折。这一点加上共产党的莱斯·狄克逊在争夺混合机械工人工会的职位时遭到的失败，可能是将

来要发生的事情的一种预兆。

另一方面，强大的矿工工会的中央领导班子中仍然有英共的许多人。该工会的副主席、苏格兰矿工工会主席是米克·麦加希，此人就是英共主席。除了电工工会（该工会仍然禁止共产党人担任职务）和市政工人工会外，大多数其他重要工会都有共产党人担任各种要职。

没有一个工会是完全由英共控制的，^{⑤9}但是总的趋势是，英国的工会向左摆，这意味着共产党可以经常与其他“左派”力量结成联盟，这种联盟会对温和力量有很大影响。看来英国现代“左派”工会的许多干部已经丧失了他们的前任与共产主义势不两立的情绪。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总书记杰克·琼斯、混合机械工人工会主席休·斯坎伦以及其他许多工会领导人都为英共的日报《晨星报》撰文。职工大会总理事会率先与莫斯科控制的世界工会联合会举行谈判，并邀请以谢列平（当时苏共的政治局委员）为团长的苏联“工会”代表团作为它的正式客人访问英国。^{⑥0}一九七七年，职工大会总理事会不肯对苏联虐待持不同政见者进行谴责，即便电工工会特别提出要求这样做也罢。在战后大部分时期，职工大会总理事

会的二十五名理事里没有英共的人，一九七七年该总理事会里有两名共产党员。第三位是雷吉·伯奇，此人是毛主义者。

这一切对英共的政治权力说明了什么？对此的解释是大相径庭的。混合机械工人工会最近举行选举以后，事态的发展可能对他们不利。当然，这表明在英国的政治中，英共的力量比英共党员人数不多、选民也很少这一点所表明的要强大。无论如何，研究一下共产党对有组织的劳工的策略是饶有兴味的——尤其是在一个有组织的劳工在国内发挥强大政治作用的国家里进行这种研究，他们既对政府直接采取行动又在工党机构中处于控制地位。

共产党拥有实力的原因

在带有自由民主传统色彩的社会内部，共产主义力量的壮大是马歇尔计划以后的时代的新事物。目前，这种壮大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势必仍属猜测。另外，壮大的原因可能随着国家的不同而各异，可能不会形成全欧洲的一种普遍的格局。即令如此，在整个南欧，共产主义**普遍**壮大了，并且可能有现存的——虽然只是依稀可见的——

关于它之所以能够壮大的**普遍**原因。同样地，共产党人在整个西欧受到的欢迎肯定也**普遍**增加了，这可能也是有**普遍**原因的。姑且不贸然阐述其确切的原因和效果，在现阶段，只指出伴随西欧共产主义壮大（和越来越受欢迎）的（国际、政治、意识形态、经济以及社会）条件，也许更有好处。它们之间可能不一定有联系。另一方面，这样一种理性过程可能确实有助于我们对共产党为什么会获得进展作出某些初步解释。

为此目的，让我们用五十年代（当时共产党受到了有效的遏制、它们的前景暗淡无光、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少数知识分子追求的东西）和七十年代中期作为我们的两个参考点。正是在这一时期的后半期，人们看到西欧共产党作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进入了兴旺期。到一九七四年，当共产党支持的共和国总统候选人在法国获得了百分之四十九点三的选票时，法共便信心倍增，并且看来从戴高乐执政以及戴高乐以后的岁月里的那种意气消沉中振作起来了。共同纲领、联合左翼看来都奏效了。这时，“历史性妥协”在意大利已经提出，意共一九七五年在地方选举中得票很多，从而使它达到极盛期的可能性更大了。到七

十年代中期，无论是法国的联合左翼政府还是意大利的“历史性妥协”都具有实实在在的现实可能性了。二十年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这种变化既是结构性的又是固有的。在这二十年中，西欧共产主义曾经必须活动的政治结构有了些改变。最初，即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是东西方之间（美苏之间）关系相当紧张的时期，是最高人士发出滔滔不绝的反共言论的时期——通常是回敬克里姆林宫类似的滔滔不绝的反对资本主义的言论。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和肯尼迪年代——即所谓“冷战”时期——充满了东西方之间的直接对抗（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在这些对抗中，美国在国际上采取的姿态不仅是反苏的，也是反共的。肯尼迪总统在一九六一年发表的一次公开演说中所说的一些话就是这种姿态的典型例证，要是今天说这种话，许多人就会认为是极端的：

因为我们在全世界面对的是一个铁板一块和无情的阴谋，这种阴谋主要靠隐蔽手段扩大它的势力范围……它是这样一种制度：把大量人力和物力投到建设一台结构十分严

密并且极为有效的机器方面，这台机器把军事、外交、情报、经济、科学和政治活动结合在一起。⑥①

肯尼迪同他那一代人中的许多人一样，把国际政治看作是世界斗争的一部分，既是其他方面的斗争，也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

“我们不能不看到这种新的更深入的斗争的阴险本质。我们不能不掌握对付这种斗争所需要的新概念、新工具、新的紧迫感——不管是在古巴还是在南越。我们不能不认识到，这种斗争天天都在全世界千千万万个村庄和市场——日日夜夜地——以及课堂里进行着，虽然并不大肆张扬。”⑥②

这样一番话今天要是出自一位美国总统之口，就会显得很不协调，这说明了西方官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高姿态比过去减弱了。

对世界政治采取的这种态度——即从反共角度来看待世界政治——在肯尼迪任总统以前和以后的几年里在整个西方是很普遍的。在西欧，带有

各种政治色彩的政治家和领导人也有这种看法，社会民主党肯定也有这种看法。英国的盖茨克尔、西德的舒马赫和勃兰特、法国的摩勒和德费尔、意大利的萨拉盖特——对这种态度和语言都会是了若指掌的。在这种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气氛下，全球性的斗争既被看作是“共产主义”与“民主”的斗争，也被看作是国与国之间的斗争。在这种气氛下，西欧共产党即使公开与苏联分离，要取得长足进展，本来也会是极为困难的。东西方冲突的意识形态领域（它的反共领域）如此突出，因此现代“欧洲共产主义”的微妙差别本会是既不为人们所注意，也不会为人们所相信。西欧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孤立的。

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孤立外，还有政治上的孤立。法国社会党（在社会党总理拉马迪埃一九四七年把共产党人逐出政府以后）对共产党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一直到密特朗时为止。一九四七年一月，意大利的非共左翼在与意共的关系问题上分裂成了两派：社会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者派。过了一段时间，两派都准备参加为数众多的没有共产党参加的中左政府。战后，英国工党公布了共产党阵线组织的名单，加入这些组织的人不能

加入工党。一九七三年废除了这条规定。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社会党国际拒绝同共产党发生任何联系，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也是这样。基督教的和社会主义的民主工会运动也拒绝同共产党发生任何联系。随着反共运动的衰落，共产党的孤立局面结束了。

与西方反共言论衰减的同时东西方之间在欧洲的国际紧张局势也出现了令人满意的松弛，缓和局面到来了。缓和对西欧共产党受欢迎的程度产生什么影响是难以估计的。西方把缓和解释为缓和意识形态冲突的基础达到了什么程度，也就是欧洲共产党比较容易在理智上受人尊敬达到了什么程度，这些党喜爱把新发现的有关民主的美丽词藻与共产主义揉在一起。

另一个结构变化是美苏在欧洲的新的力量对比。苏联现在是欧洲大陆的主要军事强国。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就不是这种情况。由于西欧国家未能使共同市场演进到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联盟的程度，未能增加它们各自的军事力量，因此，苏联占优势这一点仍然是欧洲生活中的一个事实。

伴随欧洲政治中的这个新因素的，是人们看

到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吃了败仗之后，决心小了。美国保卫西欧的决心实际上可能象以往一样坚定。的确，美国在频繁地修改它在军事上承担的义务，既向高处修改，也向低处修改；仅仅几年前，国会一些议员还坚持提出从欧洲撤军的建议，现在看来这种建议少了。即使如此，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欧洲大多数政治家——夏尔·戴高乐除外——对美国的决心所持的那种不加怀疑的设想现在不再是完美无缺的了。

由于苏联的军事力量和在欧洲占优势，由于人们对美国的决心产生了怀疑，这就导致一些著名学者谈论起欧洲各国中有一种“芬兰化”的过程在起作用。^⑥即使这种推论是过分的，不断改变着的欧洲关于苏联力量在增长和美国的决心在减小或者模棱两可的看法也不能鼓励形成一种积极敌视欧洲共产党的环境。由于这些不断变化的力量对比，西欧领导人可能被迫不对西欧共产主义的一些重要方面进行攻击。例如，如果他们怀疑西欧共产党对民主制度的忠诚，暗示西欧共产党是不可信赖的，暗示它们是苏联人的盟友，他们就会冒在西欧各国人民中纷纷引起强烈和不利的反苏反应的风险，这种反应是欧洲政治家们控制

不住的，而且会引起苏联的恶感。在沒有起抵消作用的美国军事力量和决心的情况下，这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作法。对欧洲内部大国力量对比的这种已发生变化的看法，可能有助于说明西欧一些领导人在卡特总统发起针对苏联的人权运动时为什么感到神经紧张。

这些结构上的发展不管是单个的还是集体的，可能有助于说明西欧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壮大和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至于在这些发展发生的同时西欧共产主义也有了进展，则纯属巧合。但是，如果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政治环境延续到今天的话，那么，要说共产党在意大利接近于执政和在法国可以轻而易举地分享权力，那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除了东西方关系发生变化外，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发展，可能对“欧洲共产主义”的出现产生影响。这些变化对各民族国家来说可能是根本性的。显然，在葡萄牙和西班牙，要不是独裁制度碰巧垮了台的话，正式有组织的共产党的存在就根本是不可能的。伊比利亚共产党人利用了他们和苏联人在地下组织的某些部分的长期投资。结果是，在独裁制度结束以

后随即出现的环境里，他们便得以巩固他们对工会运动的主要部分的控制。由于他们组织有方，他们便很快发展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选举力量。在共产主义的壮大格外明显的意大利，可能有好几种因素在起作用。大概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选民对统治意大利达三十年之久的天民党当局失去了信心，特别在社会和经济迅速发生变化的时候是如此。阿雷教授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因素。在法国，法共多年来没有改善它在选举方面的地位；但是由于它与社会党的新关系，法共今天更接近政府权力了。要不是统一左翼的出现，法共本会仍然是一个大的、但是受压抑的力量。在英国，由于一代社会民主工会领导人的销声匿迹，由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越来越能够接受，还由于总的说来工会运动的力量得到了加强，英共获得了好处。对于各国的共产主义越来越能够被人们所接受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和社会的变化），还需要做许多研究工作。

但是，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出现了某些（与国际均势无关的）泛欧性的发展，这些发展至少与共产主义的壮大是一致的。一位学者曾写道：人们有“民主国家已变得无法治理的一种隐隐

约约但是持续存在的感觉”，这种感觉“在西欧有增无已”。^⑤七十年代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很高；石油提价造成的种种脱节；学生闹事；宣传机构的重要性增加；对社会的依从和对传统制度的尊重的减弱；教育部门的规模越来越大和许多知识分子与这个制度疏远；管理和生活本身越来越复杂；强大的地区性运动的出现；要求平等的呼声日高和新的权利的发现；与传统的民族主义、宗教甚至阶级的衰落有关的整个动荡不定的过程：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越来越无法治理了。而且，不应忘记，人们经常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变革正在导致越来越大的无法治理的局面，这些变革正发生于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稳定的民主传统可依靠的社会内部。除了英国、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总称——译者注）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外，这肯定是整个欧洲的情形。

在一个没有根深蒂固的自由民主政治文化的社会，即一个不能顺利地把这些变革吸收到民主过程中的社会里，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变革本身就可能造成独裁、甚至极权主义政治力量的发展。

至于“欧洲共产主义”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这种情况可能与越来越需要用极权主义的政治办法解决变革的难题没有什么关系；而只是希望采取新的政治办法、换上新的领导人，看看效果如何。在历来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和反对共产党的国家，这种反政权的情绪可能采取大量投票支持第三党（如英国的自由党或苏格兰民族党或者丹麦的吉爾斯特魯普“反賦稅”党）的形式。但是，在意大利，反天民党的情绪可能打通通向意共的渠道，这样做不是赞成意共的原则，甚至也不是赞成它的纲领，而是对政权的一种抗议。人们对战后共产党在东欧的所作所为的记忆越来越淡薄；在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西方所作的短命的反应；新的一代常常忽视过去并且蔑视冷战——所有这些，加上可以接受的、开明的“欧洲共产主义”就可能使对共产党的支持成为一种称心如意的抗议办法。

至于未来，可能使欧洲共产党的壮大进一步加强的另一个因素是美国对这些党采取的态度。参加本书撰写的几位欧洲人强调，美国的态度和对外政策虽然不是决定性的，却可能是举足轻重的。例如，由于暗示美国的舆论会发现欧洲共产党

是西方政府中可接受的伙伴，美国领导人就使得欧洲共产党受人尊敬了。看来欧洲共产党领导人是深知这一点的；这可能说明了为什么他们中的许多人渴望访美，即使这种访问意味着要甘心情愿遇到耶鲁大学罢工的工人设的纠察线也罢——如卡里略的情况。欧洲共产党领导人也同意为本书提供研究素材的人关于美国舆论对欧洲人的重要性的看法，这些领导人对美国批评他们参加政府的言论很敏感，这就着重说明了他们同意为本书提供素材的人的看法。卡特政府对共产党参加意大利政府（一九七八年一月）提出了警告，这种警告引起了苏联和西欧共产党圈子的惊恐不安。虽然共产党人有可能试图利用他们认为的美国策略上的错误，但是这种敏感可能也预示着，美国舆论对于决定意共的实力可能的确是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章

共产党和内部政治

“欧洲共产主义”一词现在为西方学者、记者和政界人士广泛使用。虽然苏联官方人士谴责使用“欧洲共产主义”一词，认为这是西方企图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西方一些共产党领导人最近接受了这一提法，认为它是确切的自我描绘。圣地亚哥·卡里略把它列入了政治语汇，他最近的一本书的书名是《“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其它一些党的领导人则比较勉强地接受了这一提法。比如，贝林格说：“很清楚，这一词并不是我们创造的，但它流传这么广，这一事实表明人们多么广泛深刻地渴望获得新的解决办法以便在西欧国家取得进展……。”^①这表明他接受了这一提法。法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以及其它几个小党也接受了这一提法。

那么，“欧洲共产主义”的含义是什么？虽

然它已成了形容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共产党内最新事态发展的流行的字眼，但它的使用引起了一些令人可疑的设想。第一，它表明出现了一个联系在一起、统一的共产党泛西欧政治运动，这个运动有共同的目标，是以一条新的独特的政治方针为基础的。然而，没有迹象表明，一个不折不扣的泛西欧共产主义已经出现。西欧主要的共产党彼此之间没有什么特殊联系。它们同东欧集团其它共产党也没有什么特殊联系。它们偶尔也发表联合声明，但它们过去没有召开、将来也不准备召开一次泛西欧会议，以便各党可以在会上一道研究确定一种独特的“欧洲共产主义”。实际上，在三个欧洲党（西班牙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一九七七年三月在马德里举行的一次很不寻常的会议上，三位总书记很担心，他们的会议可能被认为是同东方集团在索非亚举行的会议唱对台戏的“欧洲共产主义”最高级会议。所以公报里除了对苏联进行最温和的批评外，没有任何激烈的词句。

第二，据认为，“欧洲共产主义”意味着共产党要走一条不同于苏维埃道路的“民族道路”。然而，民族道路政策是自从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以来就一直有的。列宁本人在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②这本小册子中是赞成民族道路的策略的。英国共产党甚至在它的斯大林主义色彩最浓的时期(五十年代初)，在哈里·波立特领导下就提出了“英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论点。在“欧洲共产主义”一词出现之前很久，这条民族道路政策在各党内就已发展到相当程度了。这是国际共产主义发展初期阶段的一个典型特点。

第三，更确切地说，人们用“欧洲共产主义”一词来形容在西欧兴起的共产主义“新形式”。这种“新形式”据认为是同社会主义发展的苏联模式是大不相同的，也不同于昔日的斯大林主义。不仅如此，欧洲共产主义的含义有时候甚至更多。有人说，西方不必担心“欧洲共产主义”，因为它属于战后西欧民主制度的一部分，它将被迫在民主制度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共产党上台或者下台取决于欧洲议会制度。

确实，有一个重要的论据来支持上述论点：“欧洲共产主义”的存亡主要取决于欧洲各党是否长期忠于民主的惯例和原则。但是，这种新的承诺达到何种程度呢？英国工党政府外交大臣戴

维·欧文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欧洲的共产主义究竟是为专制和极权主义效劳的现代特洛伊木马呢，还是自从三十年代以来，它已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于这种变化，西欧主要共产党作出了真正的、长期的贡献来推动民主制在个人自由和多元价值观的范围内进一步发展。③

显然，这样的疑问仍然存在。在苏联四十年代末接管东欧之前，欧洲共产党曾经发表声明赞成东欧的民主制，对此人们是很难忘记的。而且，欧洲各国共产党仍然认为西欧的民主制度是“资产阶级民主”——从理论上讲，它们仍然注定要被取而代之，这种看法降低了西欧共产党新树立起来的民主形象的价值。意大利共产党的乔治·纳波利塔诺提出了一种令人感兴趣的说法，有助于了解意大利共产党对民主的看法。他说：“反对法西斯主义斗争的目标既不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为了纯粹简单地恢复资产阶级民主。而是要建立一种新型的民主政权。”④

西方共产党知识分子看来仍然把“资产阶级

民主”（议会政府、无记名投票、政治反对派这些做法在这种制度中是根深蒂固的）看作是一种过渡性制度，是实现“社会主义”、建立“一种新型的民主政权”这一过程的一部分。西方观察家很可能不知道这种“新”型的民主实际上将是怎么回事。

更为复杂的是西方当前关于民主本身的含义的辩论含糊不清。过去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看来已消失了。昔日那种完全集中于政治民主的概念已为包括民主的社会和经济概念的更广泛的定义所取代。人权将不仅仅从个人和政治的角度提出来，而且还将从集体和经济角度提出来。共产党强调集体和经济“权利”的结果将有助于它们在西方建立某种民主合法性。

在这种理解和政治混乱的情况下，共产党承诺忠于民主（象我们熟悉的西方民主）的问题可能会怎样得到解决呢？除非让共产党承担政府责任，进行考验，否则很难明确回答这个问题。真正的考验并不是只让共产党负责一两个不那么重要的部；而是要让共产党掌管内政、国防、经济 and 对外政策等几乎所有各部。然而，如果它们的确成功地垄断了政府权力，那可能就太晚了。

通过其它方式就能够得出一些初步结论，这比等待用当政的方式来考验要更好。共产党现在这样迁就民主程序，难道它们已经变成象任何其它党派一样的党派了吗？难道共产党的联盟政策是企图作为同其它民主党派永久和解——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融合——的一部分参加到西欧政治的主流中来吗？难道共产党现在的新的思想立场和政策立场将不再使它们处于西欧民主界之外吗？下面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作为政党的共产党

当代西欧共产党本质上不同于西欧其它政党吗？欧洲共产党从其目标、战略和组织性质的角度讲是有所不同吗？

同资产阶级党派不同，共产党人认为他们的目标是进行革命的、不可逆转的变革。他们要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他们要用一种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崭新的制度来代替与资本主义同时发展起来的、非常典型地被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的那种制度。简言之，它们要改变西方民主的基本政治结构，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社会。

虽然欧洲各国社会党也声称，它们要用社会

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而且有时很难把社会党和共产党分清，但欧洲共产党同包括社会党在内的所有其它党派之间有着重大的差别——这一点共产党常常是愿意承认的。

当被追问道，他们在为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而奋斗时，他们常常含糊其词，或支吾搪塞，或以一种不明确的未来模式——象纳波利塔诺的“新型民主”——敷衍一下。当然，他们宣称，他们最终的社会将是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可是，他们看来很难进一步阐述他们的目标。然而，这些民主和社会主义概念的真正含义的一个标志可能在于：在现存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政权中，它们认为哪些可以作为自己发展的模式，哪些不能作为它们发展的模式。

欧洲各国共产党一方面常常竭力表明，它们要建设自己类型的社会主义，它们完全拒绝把象瑞典或者以色列这样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模式。意味深长的是，它们反而更愿意表明同苏联和东欧政权是一致的。正如意大利共产党主席路易吉·隆哥最近说：

俄国革命是迄今为止所取得的（不仅仅

是书面上的)最伟大的成就,不管人们可能会怎么说,它不仅对苏维埃国家而且对世界形势来说是一支起推动作用的民主力量。假如这支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是的,也是军事——和意识形态力量不再存在的话,你能想象世界形势会是什么样子。⑤

过去几年来,欧洲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一直把社会主义同苏联及其盟国联系在一起。党的报纸和训练计划几年来帮助在它们的国家里形成了一种亚文化群,他们把苏联制度看得高于其它任何制度。正如将要提到的,欧洲各国共产党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干部和普通党员听关于苏联制度的优越性的报告,他们到苏联和东欧休假,或者接受教育。从各党对这些旅行所作的精心组织以及它们在党员中颇得人心来看,至少可以说,欧洲各国共产党并没有拒绝社会主义发展的苏联模式。确实,它们重视它,而且同现有其它制度比,它们更喜欢它。欧洲各国共产党对属于西方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并未给予同样的重视。相反,它们严厉抨击民主社会主义。

虽然欧洲各国共产党几年来一直坚持对苏联

保持独立，但它们很少批评苏联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或者民主性质。如果说它们考虑到了它们自己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最终概念同苏联现在的制度有什么基本差别的话，那么它们并未明确指出来。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尤其是如此。虽然他们常常宣称，他们不再打算把苏联和其它共产党政权作为建设他们社会的模式，但是，他们只是这么说说而已，并没有明确地说明“新”模式同苏联模式有什么不同，或者明确地说明苏联模式有什么不好。⑥

西班牙共产党的几位领导人，最突出的是卡里略和阿斯卡拉特，他们比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要走得远一点。他们说，苏联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然而，他们迄今为止仍未阐明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概念（即使谈到，也是极其含糊的和令人难以捉摸的），也没有说明它同苏联的概念有什么重要的不同。

或许最能说明他们观点的一个例子可能是，他们支持杜布切克以及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建设“具有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的努力。然而，应该指出，杜布切克政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比其前任要自由化，而且在苏联看来是比较危险的，但

是，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它显然不是一个民主政权。杜布切克从来没有说过，捷克党希望沿着社会民主的方向前进，并退出华约。比这更早十二年，匈牙利的情况则非常不同了。苏联入侵匈牙利过去和现在都得到欧洲各国共产党的普遍支持。

比较先进的和自由化的“欧洲共产主义者”常常断言：西欧国家的“社会主义过渡”将不采取苏联的严厉措施和专制作法，因为它们的历史经历大不相同。然而，迄今为止，这些“欧洲共产主义者”没有拿出什么重要的文件，详细说明这种过渡怎样实际贯彻。

只是口头说一下信仰民主，并无助于把欧洲共产党同苏联区别开来，因为泛泛的民主也是包括苏联共产党和东欧各党在内的每一个共产党公开声称的目标。诚然，欧洲各国共产党可能受到它们也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自由和多元文化的影响，这可能有助于形成它们的观点，但是，共产党领导人和知识分子没有说明这个过程是怎样进行的。有一点肯定是令人迷惑不解的，这就是不管它们最近怎样转而相信要在它们自己的社会内实行民主，这一点迄今为止并未使欧洲各国共产

党不再把苏联作为现在最能接受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欧洲各国共产党同欧洲其它主要党派显然是不同的，它们仍然恪守苏联国家的基本理论和作法。

而且，同欧洲社会党以及其它一些欧洲党派不同，共产党一般仍然认为，它们是工人阶级无可争辩的领袖。欧洲共产党把自己看作是这一最重要的阶级的决定性的领袖。别的任何党都不能承担这种领导和指导作用；在实现革命目标方面，任何别的阶级或者领袖集团都是不重要的。任何一个其它政党都不这样看待自己。这些全都是以一种高贵的领导哲学为基础的共产党概念。小小的英国共产党争辩说，只有它这个党“才能够提供在改造工人运动和加强工人阶级团结的斗争中所需要的领导”。^⑦较大的法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认为：“在法国建设社会主义取决于共产党是否有能力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担负起它的指导作用。”^⑧

在这一点上，西班牙共产党同其它欧洲共产党也有点不同。按照西班牙共产党的理论，现在可以对列宁实现社会主义的经典公式进行修改，以便对最近的社会改革加以利用。西班牙共产党理论家们认为，现在，推动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

力量联盟中，不仅有工人阶级，而且也包括其它“文化力量”——新的科学、技术、管理人员和知识阶层。西班牙共产党有意识地用这种西班牙和西欧革命发展的新的阶级理论来对抗列宁原先的理论，列宁主张只依靠工农联盟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最后过渡。穆哈尔指出，如果这个决定性的阶级联盟是如此广泛，那么，关心实现社会主义的力量不应该再被认为是少数先锋队的工作对象。相反，人们是在选举中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们可以逐步通过立法的形式来实现社会主义，而无需诉诸法律以外的手段。⑨

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也试图进行重大改革。它们认为，工人阶级支持它们的努力。它们之所以有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得到体力劳动者及其家庭的支持。它们的政策常常扎根于工人阶级的生活。虽然如此，它们对把工人阶级当作一个“历史阶级”、当作革命改革的动力这一看法常常持怀疑态度。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无疑认为自己既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不能成为其代言人。它们没有共产党对手的那种政治上和组织上高人一等的优越感。相反，它们认为自己仅仅是若干竞相代表工人和社会上其它集团利益的党

派之一。

共产党的战略同其它党派战略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它们对推动建立一个广泛阵线的重视程度不同。议会的目标对它们来说是重要的，但是，它们还集中力量控制社会全部非政府重要机构，这就是常常被称之为议会之外的群众斗争。“资产阶级”党派多半把注意力集中在通过选举的办法控制政府。相形之下，它们的重点几乎全部集中于选举。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议会的角度来衡量它们的力量。

共产党不仅要在选举和政府方面发挥影响；它们还试图控制社会所有重要的部门和机构。在意大利共产党党章中，党被认为要“在它们管辖范围内，在生产、文化和社交活动中心的群众政治活动各方面”发挥作用。^⑩英国共产党说：

“对于一个在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组织来说，极其重要的是积极参加各种斗争，积极参加各种工会和进步运动，并担负起领导作用……。”^⑪

西欧各国共产党希望，如果可能的话通过劝说的办法推动（不过是用民主的方式）社会达到更高级的水平，不再倒退。民主党派不持这样的

乐观看法，相反，它们认为，它们有限的目标将在一次继续的结构性竞争中遭受挫折。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卢乔·伦巴多·拉迪切最近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坦率：

记者：“但是，完全的个人自由必然意味着各种政纲都是合法的，包括拒绝社会主义。对不起，我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拉迪切：**“我认为，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人民中会有一部分人希望看到从社会主义向后倒退，从一个较高水平的社会倒退到一个较低水平的社会吗？你能够看到匈牙利或者罗马尼亚的一个农民党希望把土地退还给大地主吗？”

关于意大利的未来，拉迪切说：“我不是预言家；但是，一旦工人阶级取得了支配权，引导意大利社会摆脱了几乎是长期不断的危机后，那就难以设想有谁会希望从一个处于较好状态的社会倒退到处于较差状态的社会。”^⑫

正是共产党的这种论调使观察家们感到担忧，尽管它们表示忠于“多党制民主”，但甚至

自由化的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一旦取得控制权，也不会轻易放弃权力。如果认为保存反对党是不可能的，这就无异于无视或者镇压反对党，因为认为反对党是不现实的或者是没有价值的。如果变革被认为是不可逆转的，如果认为人民不可能反对一种较高水平的社会，如果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会消灭阶级社会（而党派被认为是代表阶级的），那么，西方共产党的社会和政治战略看来就排除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保存另外的反对党的必要性，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共产党的任务看来是要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其它党派既是不需要的，也是不可想象的。

共产党同“资产阶级党派”有一个很大不同之处：它们极其重视党的组织。确实，一位研究欧洲党的学者说：“关于党组织的管理问题渐渐被摆在‘意识形态’之上。”^⑬共产党理论家往往从组织的角度来解释他们同其它左翼党派的区别。法国共产党一位书记曾经说：“我们党的整个历史的特点是在组织方面坚决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遗产。”^⑭欧洲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情况还提供了某些重要的线索，可以看到当共产党执政的时候，它们大概将如何组织这个更广泛的社会。

实际上，意大利共产党的精神之父葛兰西就说过：“党是工人国家明天的模式。”^⑮

包括欧洲各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共产党的组织是以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的模式为基础的。本质上，这意味着，党的少数最高级领导人几乎能完全控制其党员。他们设立了一套机构，这使他们可以决定党的政策大纲，而不会遭到有组织的反对。他们挑选并控制了党的专职工作人员以及被选上去的党的干部。领导人还可以惩戒和开除党员。对党的方针必须服从，而且通常是强迫服从。实现这种服从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有一些是机械性的和强制性的，还有一些则是教育和文化的。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常常包括：在党的各级组织进行彻底的讨论和说服工作。大量的时间用于向党员解释党的领导的决定、召开自我批评会议和说服那些持怀疑态度的党员相信领导上的战略策略是英明的。实际上，民主集中制是通过命令和充分说服相结合的双重过程进行的。它的目的是为了确秩序、团结、中央领导和纪律。虽然其它党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等级制度，但任何一个党派（或许一些极右的次要党派除外）在组织原则和实践问题上同共产党都没有很多类似之

处。

在西欧各国共产党内，如同在所有共产党内一样，权力实际上是从上而下的。比如，意大利共产党党章中充满了集中化的独裁控制手法，这种手法通过组织系统确保一致性。^⑩第五条规定了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和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这条原则保证了行动的绝对统一。意大利共产党的组织制度还使上级机构能够通过多种手段控制下级机构：代表大会实际上只能由上面来召开。为了防止在党的地方组织形成不受欢迎的“倾向”并使之巩固下来，意大利共产党各级领导机构和中央委员会可以一起开会决定解散直属的下级机构（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可以决定解散区委员会，以下类推）。意大利共产党一九六四年党章第五条（d）说明了同样的意思：“上级的决定对下级具有约束力。”^⑪

在西欧各国共产党中，权力集中在党的最高层领导机构。各党最高层结构没有什么区别。各党都有一个代表大会（名义上是党的议会）和一个中央委员会（由代表大会选举）。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一百七十六名中央委员，象其它党的中央委员会一样，过于庞大臃肿，不可能经常

开会或者作出重要决定。大多数共产党通常都是由中央委员会选举政治局执行委员会和书记处。然而，意大利共产党在中央委员会和书记处中间插进一个三十六人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领导机构和书记处（八个书记）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如同党的议会、党的政府和党的内阁之间的关系一样。自然，因为书记处一周可以开几次会，它始终处于党的整个复杂机构的中心，不间断地掌管着党的各项日常事务。

选举共产党这些中央机构的办法是民主集中制的核心。由于党的所有下级机构严格地受中央控制，于是，组成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的办法就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上，党的各级领导人由直属下级选举。事实上，每个上级机构都是从各下级机构增选的，提名或者增选机构派代表参加选举机构的会议，以确保选中恰当的人选。因此，指派领导人的权限和权力是从最高级到最基层，总书记同书记处和政治局基本上控制了它们在理论上应对之负责的机构。阿雷教授说，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组成的确也有一定的比例和平衡，但这反映了党的最高领导层（实际上是书记处）的总的倾向，这同书记处关于它认为它应当代表

什么的观点以及它关于党的指导力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观点是相符的。

法国共产党的选举制度没有什么不同。党的领导实际上是由上面决定的，而不是由下面决定的。比如，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选举，理论上是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但实际上党代表大会只得到由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唯一**的一份名单，党代表大会只能批准这一名单，而不能增加或者选举它想要选的人。乔治·马歇在一九六四年党代表大会上说，这种程序体现了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精神。他攻击比较公开的选举方法，说那种方法只“符合依恋徒有其表的资产阶级民主……的那些人的精神”。^⑮

这种由领导人决定的方法既不利于涌现有主见的政治明星，也不利于独立表达政治思想和关心的问题。选举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成员不是根据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威望，也不是看他们独立表达思想和关心的问题的能力，而是看他们是否具有最适合于党的官僚的品质——不屈不挠、一贯勤勉和有秩序地履行职责。因此，那些爬上党的最高层的领导人对这些品质是恪守不渝的。在一个受到严格控制的政治机构里工作几年，使人们个

人的首创精神减少了，形成了一个管理党的领导人的半永久性核心。比如，克里热尔教授指出，虽然法国共产党党员有很大变动，但是，领导明显是长期不变的。虽然法国共产党党员差不多三分之二的人参加党还不到十年，但是，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委员中属于这种情况的只有百分之四。这些领导机构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是一九五八年前参加党的。

区、省和地方机构主要职责是贯彻党的最高领导的决定。意大利共产党章程第十三条很明确地说，区领导机构的任务是：“在该区实施党的方针并在这个范围内使党的政策适应于区的情况……，这是最高级领导者同地方组织联系和领导它们的主要渠道”。所以，在“欧洲共产主义”党的结构内，不存在独立的地方、区或者省的权力中心。这些“中间”一级的组织在地方小组或者支部同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之间起媒介作用，它们的工作是推行既定政策并进行宣传、筹集资金和进行组织工作。这些中间一级党组织（基本上是联合会）常常同参众两院议员的选区是一致的，但是，即使在这一方面，它们也不能管选举担任公职的共产党候选人事。这是中央委员会的

一个特权。西欧多数民主党派，不管其中央是如何组织的，仍然把选举担任公职的候选人的权力授予其地方选区。这一权力得到谨慎的保护，同共产党不同，这使得拥有自己权力基地的地方政治家可以出现在全国舞台上。

共产党活动的基本单位一向是党小组，党小组能够在工作地点（通常是一个工厂）或者在地方（街道或者村庄小组）进行活动。可是，最近一些欧洲党已废弃列宁组织原则的这一具体做法。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小组现在已经名存实亡；西班牙共产党甚至在必须秘密活动的佛朗哥时代，就认为小组是强制性的，宣布取消了，以图吸引新党员。而法国共产党则在工厂大大扩大了它的小组。在葡萄牙共产党内，小组仍然是整个党组织的基础。

在意大利共产党内，小组被作为基层组织基本单位的支部所取代。^⑩意大利共产党的支部比传统的小组要大得多，它是在居住地点和工作地点组织起来的。截至一九七六年年底，全国有一万一千八百七十五个支部（一百七十万党员）。支部的工作分为政治工作和管理职责，旨在加强党内团结，并进行扩大党的社会和政治联盟的活

动，象党的宣传、共产党节日、设纠察线和组织反法西斯委员会等等。象它们之上的中间性组织一样，这些支部也没有独立自主的政治生活。它们是传达中央决定的党的方针的机构。这些支部严格服从命令，往往类似于一支有纪律的军队。从组织的角度讲，它们同意大利政治生活通常非常无秩序和混乱的情况形成了有利的对照。

从最高层到最低层（从书记处到支部或者小组），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大概是它们本国的一支最有组织的和内部有纪律的政治力量。虽然在使列宁的组织原则适应于西方群众性党派方面情况是不平衡的（特别是由于小组衰落了），但是，其基本特征仍然未变；共产党内部是独裁主义，这种独裁主义通常使得党可以象一个人一样采取行动。党所处的环境是一个控制松散和多党制民主的社会，而它本身则是一种控制得很严格的政治武器，因而使党在组织上比其对手处于有利地位。

这种控制是怎样维持的呢？一个很大的因素常常被忽视了，这就是许多普通党员明显需要一种得到指导和控制的政治环境。他们对独裁主义的、家长式和中央指导的党的体制往往没有什么

抵制。朱塞佩·阿雷认为，意大利共产党严格的政治结构得到其多数党员的赞同，是同他们的内心看法和文化经历相一致的。他说，意大利共产党普通党员实际上并不希望进行自由讨论，因为对批评性辩论有一种孩子般天真的担心。只需要上面提出简单的绝对真理。事实上普通党员对民主集中制并不感到不安，他们反而以党的坚如磐石般的结构而自豪。

除了需要政治权威而外，还需要在财政和职业方面依赖党，这使得数以千计的党的支持者仍然忠于它。最近一次调查表明，意大利共产党全国性领导人的百分之八十和省一级领导人的百分之六十是靠党（党、工会和合作机构）所取得的职位过日子的。在选举方面，意大利共产党政治家取决于党是否批准，而不是靠以个人能力或者地方利益为基础的政治支持。因此，党成了获得财政支持、社会声望和政治擢升的手段。这种基本的依赖关系也是民主国家非共产党党派的一种力量源泉；然而，当把这种对党的机构的基本依赖同民主集中制结构联系起来的时候，对党的依赖就意味着对中央领导的依赖。共产党的职业政治活动家不能象党的派别之间那样进行讨价还价。而

在其他党派内保持政治独立性的传统源泉正是党的派别。

共产党内最可靠和最忠诚的集团是那些终生当干部的人。他们是共产党组织的命根子和神经系统。对西欧各国共产党的终生干部的确切数目很难作出估计。各党在这个问题上往往是含糊其词。可是，据库尼亚尔在葡萄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葡萄牙党有五百零七名专职干部。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的终生专职干部，在党的直接工资名单上大概起码数以千计。但是，除了这些官方“机关权势人物”外，还必须加上数千名在党控制的市政、企业和工会组织里工作的专职的或者兼职的数千名党的“好斗分子”。

共产党领导控制普通党员的另一个渠道是党内各级都有的纪律机构。典型的违犯纪律事例有：企图通过交流情报和散发单独的文件来煽动“少数派”意见；企图在党的机关（同级党的机关之间通常是禁止进行水平联系的）之间进行“水平”联系；在党的法定的机构之外进行联系、交流意见并举行会议；没有得到顶头上级的批准就准备召开党代会；一般的不忠，包括对民主集中

制提出挑战，或者拒绝接受多数派方针的约束。纪律是由惩罚机构贯彻执行的，直到把一个成员开除出党。

比如，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从公开和秘密渠道详细地了解其党员的情况，实际或者可能违犯规定的情况就是通过这种渠道向他们报告的。^⑳ 没有证据证明，意大利共产党有秘密监察机构，但是，对党员个人政治活动以及对党的基层组织的经常性监督是由意大利共产党结构本身保证的。意大利共产党所有的领导机构（在支部、省、联合会、区和中央各级）有同它们相并列的党的监察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任务是研究纪律问题，并在思想教育以及发展和使用党的干部方面同领导机构进行合作。监察委员会接受党员对其他党员提出的许多私人指控。被指控违犯纪律的党员要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审问，（他们是否仍然保留党籍，由他们所在组织的顶头上级决定）。比如，一个省的领导机构同省监察委员会联系，可以开除本省任何支部的党员。^㉑

党对共产党议员的控制是共产党生活中一个很重要而且很少为人知道的事实。且不说马列主义关于党的机构对议会党团控制的理论（所有共

产党人都坚持这一理论），议员对党的这种服从关系是有保证的，因为当选的政治家为了他或者她的生存要依赖于党。欧洲多数选民是选举一个党，而不是选举一个人；因此，党的批准是选举胜利的一个先决条件。西方非共产党党派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在这些党内，允许派别活动存在，因而使其议员有一定的回旋余地。比如，英国工党采用的是一个开放的——而不是民主集中制的——党的组织系统，因此，工党议会多数有效地对抗了党内的左翼多数。意大利共产党七十三名议员都在党的中央机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任职，其中多达六十五名在他们当选为议员之前长期是意共干部。不仅他们在议会的席位取决于党的机构，而且如果他们失去公职的话，未来的生计也要依靠党。共产党常常喜欢从其终生干部中挑选他们的议员；这保证了对党的忠诚和服从，并使议会党团进一步依附于党的核心小集团。

一个议员忠于他的党是西欧多数政党中政治生涯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非共产党党派同共产党的一个基本区别是，在共产党内缺乏对**当地**的忠诚。许多西方党派有选区选举制度（而不是由

党提出名单），让地方选区选举候选人（有时候经全国性机构批准，这通常只是个手续而已）。而共产党担任全国性公职（参议员和众议员）的候选人则是由全国性组织确定的。比如，意大利共产党议员候选人基本上是由党中央委员会确定的。因此，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议会议员实际上不仅对“党”（而不是对更广泛的选民）负责，而且要对党的领导负责。有一点并不是不重要的，这就是党为意大利共产党众议员和参议员而动员的选民比例要比天主教民主党多。^②

对党的干部的教育和训练在加强领导机构对党的控制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般是在小组和支部开展非正式的日常讨论和正式训练计划这两种方式进行的。民主党派也有政治讨论和对其成员进行训练的计划。即使如此，这些党内的教育总的说来是不那么系统和严格的。比如，领导并不总是控制着党的教育计划和组织；哲学教育是折衷主义的；必须考虑到党的派别；所谓训练常常只不过是帮助党员在选举时如何在公众面前表现自己。目的是为了使其党员在同公众交往时更有知识、善于辞令和有说服力，而不是为了建立一种有纪律的和中央控制的干部制度。

另一方面，共产党的特点是组织大量的讨论和分析。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领导的观点为党员接受。在党的各级组织，党的干部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说服党员，使他们相信领导的立场是英明的。他们呼吁党员对领导立场的每一个变化都要支持，理由是党的领导最了解每一个历史关头起作用的力量。还呼吁党员在面对资产阶级分裂活动的情况下保持党的团结。因此，每一个有活动力的党员都要受到他所在支部或者小组领导人的长期监督和注意。每一个党员都受到党报和地方党的同志的不断的宣传教育。这可以确保：除最难管束的人外，所有的人都团结在领导的周围。②③

正如马歇特就葡萄牙共产党的情况所说的那样，欧洲各国共产党往往要求苏联“教育”和训练其党员。然而，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有办法对其干部和新党员实行自己的训练计划。这两个党为党的信徒开设了大量业余的和住宿训练班。法国共产党在巴黎中央党校为党员开设八个月的住宿训练班，而且还在全国举办了大量的不那么严格的训练班。意大利共产党自从一九七二年以来大大加强了它的政治教育，一九七二年它只有一

所中央党校。从那以来，又建了六所新党校（四所区间党校，一所省间党校和一所省党校）。阿雷教授估计，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四年年底这一段期间，有一万四千八百八十五人经过党校学习，接受了长短不同的训练班教育。意大利共产党还在地方开设训练班，它估计，自从一九七〇年以来有十三万“学生”经过这个系统的教育。共产党教育政策的一个有趣的特点是，它的教育对象是党的各级组织，直到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也进党校学习（通常没有下级干部陪同）。意大利共产党最近在地方支部训练班和讨论会上努力吸收那些能够同地方积极分子一道进行坦率讨论的非党员参加。

对党员来说，“政治”教育的内容有三个目的：使其党员能够组织和指导特定的政治运动（比如，意大利一九七四年就离婚法案进行的公民投票）；提供关于选举和党的组织等等技术训练；确保全党思想上的一致和坚持党的路线。虽然南欧共产党（特别是意大利共产党）近来吸收了一些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入党，但是，演讲和讨论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党内思想家和组织者负责。这样做有助于保证理论的正统性和严格坚

持党当前的策略。

总之，“欧洲共产主义”同传统的非共产党党派是不同的，它们试图要对它们也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进行系统的和根本性的改革。要实现这一目标，作为先锋队的党必须能够在多党制的资本主义环境中活动，但仍然忠于它们的革命抱负。这需要在全党从党的最高领导层到基层进行一场复杂的政治调整。因此，要继续坚持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就党的组织来说，任何妥协都是不能允许的；在极大的程度上，西方共产党严格的、受中央控制的内部生活仍然是它们同西方民主党派之间性质上的基本的差别。

虽然各种政党都保持了等级制度的组织特点，但西欧民主党派通常本质上是“开放的”，或者说是“多元的”（反映了它们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和希望保持下来的社会的性质）。比如，民主党派允许公开的派别活动。这些有组织的派别可以经常利用宣传工具作为号召手段在党内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在列宁主义的党内，组织派别是极端困难的。如果出现了派别的话，党通过开除或者辞退

的办法通常能够避免党内长期的政治斗争。

确实，甚至试图在具体问题上把他们的同志争取过来的那些持不同政见者也常常是不能被容忍的。这些党争辩说，它们需要全党支持它们的政策，它们不能允许派别存在。在共产党内，少数是没有权利和能力成为多数的。而少数可以变成多数则是民主程序的一个标志。

法国和葡萄牙党看来是最不宽厚的，西班牙和英国党是最宽厚的，意大利人则介于两者之间。可是，一般说来，一旦党的最高决策机构作出决定，并向党员作出说明，据认为不同意见就停止了，事实上通常也是如此。那些继续持异议的人通常要受到纪律惩处，必要时开除出党。

法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经常对自己的领导人作出组织处理，最新事件是罗歇·加罗迪被开除出政治局，皮埃尔·戴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在葡萄牙，最近几年作出组织处理的最有名的人物是马丁斯·罗德里格斯，他在一九六四年曾是执委会委员。在意大利，宣言派——一个自由化的派别——一九六九年被清除出党，批评苏联的领导人象加卢齐被调离了重要岗位。

在西班牙，党对领导集团中的公开分歧一直

是比较宽厚的。一九六八年中央委员会投票批准了执委会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谴责，有五个人反对。从那以后，各种斯大林主义的不同政见派别（其中最有名的是以执委会委员恩里克·利斯特为首的一派）也受到宽容，它们后来才离开党。最近，穆哈尔指出，中央委员会里常常进行表决，在表决中，有些人弃权或者反对执委会。在一九七八年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有一个重要的人数很多的少数派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投票反对领导。不再总是全体一致了。英国共产党对一个斯大林主义的派别也宽容了一段时间。这一派别是以锡德·弗伦奇为首的，一九七七年离开了党。

一个有趣的历史特点是，没有一个共产党领导集团被一个反对派在沒有莫斯科的支持下推翻。

而民主党派则允许其各级组织进行公开的讨论，表决时持不同态度是家常便饭。这样的辩论常常很激烈，投票的结果也往往是无法预言的。在共产党内，最高领导事先决定党对每一个问题的立场。在党的会议上，这些决定几乎总是得到代表们一致赞同。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当法国共

产党决定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党的一个正式目标的时候，这一决定（它破除了在党的传统中奉若神圣的一个根本性条件）在党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沒有一票反对。

在民主党派内，负责人和领袖常常是通过某种真正的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这种民主程序涉及到党的基层组织。在议会制度内，往往有这样的情况，议会领袖有时也是党的领袖，他们只能由议会议员全体会议来选举。但是，全体会议的议员在他们选区的党派内常常受到来自持不同政治主张的党员的真正挑战。在共产党内，各级负责人完全由党的领导决定。民主党派对其在非党团体内工作的党员也不实行共产党的这种严格纪律。在党外团体内工作的共产党员要接受党领导关于他们在其团体内应该采取的政策立场的具体指示。不服从这些指示可能常常要被开除出党。比如，用英国工党和西德社会民主党党员的自由来平衡一下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在本国工会运动中对其党员实行的控制，那将是有益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况，非共产党党派的党员站在他们的工会立场上行事，他们反对和攻击他们的党的领导的正式政策。没有什么共产党人这样做的。

共产党及其联盟

虽然欧洲各国共产党同其它政党仍然是不同的，特别是从它们的最终目标和内部组织的角度来说是如此，但是，共产党很少不愿意结成联盟。西方社会的共产党避免陷于孤立。为了达到中期目标而同其它党派结成联盟，“工人阶级”和“进步的、非无产阶级”力量之间结成联盟，这是共产党自从列宁时代以来时断时续的一个特点。西方共产党早已放弃了这样的观点：欧洲各国共产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需要资产阶级党派的援助。共产党人看不到通过苏联式的暴动或者以得到红军支持的东欧方式执政的前景。他们也认为，他们无法在自由选举中获得多数选票，从而单独组阁。通过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不管它是意大利式的、法国式的、英国式的、西班牙式的，还是葡萄牙式的，都必须同其它党结成联盟，因为必须经过几个中途站，然后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

在历史上，欧洲各国共产党曾经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谋求建立三种不同的联盟。一种是“联合阵线”，它包括共产党和象社会党这样的其它

左翼党派（而且要努力联合整个无产阶级）。一种是“人民阵线”，它包括左派（但是，超出了这个范围），还包括进步的中产阶级集团和党派。一种是“民族阵线”（当国家受到除苏联以外的国家侵略时组成这样的阵线），它包括所有爱国人士，甚至军界人士。这些联盟实际上可能采取同其它党派达成正式选举协议（或者契约）的形式（在法国，一九七二年后就是这样做的）；在特定的政治问题上同其它党派合作（象在英国一九七五年关于共同市场的公民投票运动中或者意大利一九七四年关于离婚法案的公民投票期间所做的那样）；在议会采取支持或者弃权的立场，以使非共产党政府维持下去（象意大利一九七六年以来所做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一些欧洲国家里共产党参加了或者支持联合政府。

关于共产党方面同其它党派结成联盟的企图往往被认为是共产党要创造一种民主的、“新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另外，人们还认为，不管它们的目的是如何，现在的党派联盟是要共同结合到一种民主制度中，在这种民主制度中它们既不能改变它，也不能摆脱它，即使它们想这样做的话。

正如一位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所说：“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同本国社会生活日益融合到一起的群众性的（共产）党是否**可能**是革命的。”^{②4}因此，人们认为，欧洲各国共产党同现存制度利害攸关，它们对这种制度产生了兴趣，同其它党派完全一样。根据这种假设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参加政府从长期和短期来说都是一支起稳定作用的力量。最后一点，人们认为，持续不断地扩大同民主社会以及同其它政党的联系（这显然会削弱“社会中的社会”的“国中之国”）将会对这些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产生影响，并有助于它们真正的民主演变。

无疑，群众性的共产党有时也对民主的稳定做出了贡献。在意大利，自从出现**历史性妥协**运动以来，意大利共产党一直认真避免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好象它要使意大利社会向两极分化。它在谴责和反对恐怖行为的斗争中以及在减少通货膨胀方面进行了合作。西班牙共产党在佛朗哥之后的时代也帮助避免使西班牙社会两极化。

然而，虽然共产党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兴趣保卫和稳定民主制度，但这（它们自己的理论家和领导人承认）只是它们走向终点的途中的一个

补给站。

它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避免一次右翼的反击。乔治·纳波利塔诺曾经这样说过：

如果工人运动仅限于谴责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和老的统治阶级的责任，纯粹为了保卫工人的利益而采取行动的话，那么它就会使自己处于一种有限的和不灵活的地位。它使自己孤立起来，并在政治方面给右翼的活动提供了口实：即我们刚才提到的**反革命反攻**。^②

因此，必须保证民主制不受反动派的打击，但这仅仅是进行根本的社会改革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长期目标的一个序幕。联盟政策的提出和放弃就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因此，同其它党结成联盟不能看作是让共产党完全参加民主程序的长期办法；更确切地说，它们常常是基于利害关系而结合的，说散就散，说重聚就重聚。

当然，其它党派可以献殷勤，利用联盟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民主党派的联盟政策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是运用策略过程的一部分，目

的是为了在民主国家内执政。不能把这看作是权宜之计，旨在把国家改造成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民主党派同民主制度利害攸关，因为正是这种制度才使得它们得以生存，使得它们有意义，并让它们发挥作用。共产党同魏玛德国的国家社会党一样，它们之所以对民主制度感兴趣，只是因为这是向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演变的一部分。

欧洲各国共产党往往认为社会主义同苏联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共产党的联盟政策是在莫斯科决定的。一九三四年在法国、意大利和其它国家成立了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但是，当莫斯科一九三九年改变了方针时，欧洲党也转而支持纳粹—苏联条约，人民阵线也突然间破裂。德国一九四一年入侵俄国后，这些党再次改变方针，参加了民族阵线。战后，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都作为小伙伴参加了政府，直到一九四七年退出为止，因为苏联人当时再次改变了方针。在苏联的影响下，这两个党后来便开始成为反对派，它们甚至努力破坏战后欧洲经济恢复，强烈反对马歇尔计划。意大利共产党在莫斯科的驱使下，又转而采取一条对

抗政策，但是沒有法国共产党那么强烈。

意大利 意大利经历过法西斯主义统治，这是意共在企图保持某种形式的联盟政策时宗派主义态度不太严重的一个重要因素。共产党实际上打算在法西斯主义或集权主义的环境中或在这两种主义结束统治以后建立广泛的联盟，以便获得它们能够在其中自由活动的民主基地。

葛兰西在二十年代末期被囚期间研究了左翼在战略上所犯的错误，他认为这些错误促使社会主义走入歧途，为墨索里尼的最后获胜帮了忙。他得出下述结论：中心问题是宗派主义，在左翼的表现是每个左翼党（包括共产党）的分裂倾向。宗派主义还影响了左翼同范围更大的社会的关系，因为左翼政党和支持它们的城市工人脱离了农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意共的知识分子和战略家们现在普遍接受葛兰西在这一时期所作的分析：“渐渐找到了一条避免将来遭到新的失败的道路，尤其重要的是找到了通过建立尽可能广泛的反法西斯主义阵线来击败法西斯主义的道路。”^{②⑥}总之，广泛的联盟是维护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所必需的。

从这一意义看，必须确定联盟政策，以便先实现民主革命，继而能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倒退到反动统治。民主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阶段，它不是目的，它是一种手段。

正是出于联盟政策应有广度的需要，意共的历史性妥协战略才应运而生。历史性妥协存在于两方面。第一，从社会角度考虑，它打算把形形色色的社会集团——包括无产阶级和意共所谓的“天主教群众”——暂时统一起来。意共领导人看来如此迫不及待地想减轻天主教群众的担心，以致于他们降低了反教权主义（比社会党人更有过之无不及）和经济集体主义的调门。^{②7}第二，从党派角度考虑，企图由意共和天民党人在政府中建立一个政党联盟。

历史性妥协的社会内容对资产阶级政治家是一种很有诱惑力的宣传论调。使有可能发生冲突的集团团结起来以保持制度的稳定——意共含蓄地保证在红色地区和工会控制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抱上述宗旨是投合全国渴望秩序的心情的。意共领导人了解，呼吁人们维护秩序、团结和权威（这是公开宣布的历史性妥协的宗旨）就能争取得选票。虽然意共自一九四六年以来在历次全

国选举中所得的选票几乎每次都有所增加，但是从“历史性妥协”成为意共的官方政策以来，它才突破了得总选票百分之三十的大关。

意共的建立广泛联盟这一政策的目的在于使潜在敌对的组织和阶级放心，智利一九七三年事变进一步证明了意共这项政策的正确。意共发言人经常提起，阿连德的实验由于奉行过于狭隘的阵线政策而落得个可悲的结局，因为过于狭隘的阵线政策使社会两极分化，并使反动派得以发动反攻。因此，历史性妥协作为意共的中期战略的中心目标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它是西方共产党最有雄心、实际上是最大胆的夺权战略。

西班牙 伊比利亚半岛国家的共产党刚脱离流亡和秘密活动状态，它们也面临可能退向右翼极权主义的问题。实际上，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国的民主制度也许甚至比意大利还脆弱。西共，特别是自从卡里略在五十年代末期担任领导以来，在对它来说始终基本上怀有敌意的环境中显示了令人赞叹的灵活性和技巧。甚至早在一九五六年，西共在卡里略的鼓动下号召全国和解。它欢迎天主教徒中的民主人士、甚至长枪党人一起

致力于和平推翻佛朗哥主义，在当时，据信这个过程只要几年的时间。从此以后，西共就受两种对立的力量的影响：一种力量要求党避免同佛朗哥主义的机构（或佛朗哥以后的新机构中的佛朗哥主义接班人）发生牵连；另一种力量主张西共同佛朗哥的接班人实现某种妥协，这种和解被视为巩固民主制和西共在西班牙政治上起重要作用的先决条件。卡里略想采取介于这两种立场之间的中间路线。

当前，看来西共认为它近期的首要目标是同西班牙首相和国王合作以便确保巩固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这显然非常符合它自身的利益，因为西共规模还小，因而决定利用民主的环境来发展力量。然而，它的联盟政策既微妙又灵活。一方面，它已经同中右力量合作，卡里略常常会见苏亚雷斯首相。看来这种类型的联盟大大提高了西共的社会地位。按中右派的观点来看，共产党人社会地位的提高限制了社会党人的号召力。然而，另一方面，它过去曾提议同民主左翼结盟，它似乎将来可能选择同西班牙社会党人（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结盟。

正如穆哈尔指出的那样，这两个左翼党仿效

法国拟定一项共同纲领，这可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是几种不同思潮调和的产物。它的某些领导人自称是革命派，是马克思主义者。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方面原则上不反对统一战线的主张。即使如此，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目前对西共是有疑虑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费利佩·冈萨雷斯批评过卡里略和西共，因为共产党人在声称为建立民主社会而努力的同时却不在他们自己的党内实行民主。^{②⑧}冈萨雷斯认为，这使共产党人成了社会民主党人的不可靠的盟友。

如果西共的近期战略仍然是谋求稳定西班牙民主制度的战略——这正是卡里略著作的要点，那么，它可能避免同社会党人结成统一战线，因为它担心，统一战线可能使西班牙社会过快地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即使如此，它在一九七七年全国选举中得票比较少一事可能意味着它将被迫回到统一左翼的战略，因为它没有别的选择。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在一九七七年的选举中共得百分之三十六以上的选票。

葡萄牙 葡共虽然在极权主义垮台以后的虚弱的政治环境中活动，但是，它确保民主获胜以

作为社会主义改造的中转站的决心似乎不如它的伊比利亚邻国的决心大。在卡埃塔诺于一九七四年被推翻以后，葡共企图全面控制政府，甚至在一九七五年组织了一次赤裸裸的政变。看来葡共领导——特别是库尼亚尔——认为，葡萄牙的形势在某些方面同俄国一九一七年的形势相似。葡萄牙不如大多数西欧国家发达；葡萄牙既不同于意大利，也许甚至不同于西班牙，因此把巩固民主作为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阶段的作法不适合于可能是一种第三世界的革命形势。

虽然葡共企图在葡萄牙新建立民主制度的初期就迅速夺取政权，它似乎并不关心推进民主阶段的问题，但是它不是一个孤立主义政党。葡共联盟政策的历史表明，它那顽固的斯大林主义同狭隘的联盟概念没有联系。它思想上的僵化同它在联盟问题立场上的灵活性不相称。实际上，它拒绝在意识形态上让步作为谋求结盟的一个方面。它在萨拉查—卡埃塔诺统治期间就形成了同非共产党组织和政党合作的传统。在这一时期，葡共是被取缔的，但是在举行受严密监视的选举期间，又安排它“同其它反对党——民主党人、自由党人、共和党人和社会党人——一起竞选，共产党人

想拉他们参加共同阵线。”^{②⑨}此外，在推翻卡埃塔诺统治以后，葡共没有同文职人员结成联盟，而是同武装部队运动（武运）合作，并支持它。武运治理葡萄牙直到一九七六年举行选举。库尼亚尔本人在武运建立的临时联合政府中任职；社会党组成少数政府（它把葡共等排除在外）以后，葡共继续主张，应准许葡共入阁。

葡共的联盟政策将来的方向现在还不清楚。葡共不准备为谋求盟友而缓和它的强硬的意识形态和亲莫斯科的方针，这已经损害了它同社会党人的关系。葡共领导看来目前满足于巩固它对工会以及对里斯本附近的战略要地阿连特如区的控制，更笼统地说，它谋求利用农民和城市工人阶级由于葡萄牙经济制度继续处于危机状态而产生的不满情绪。

法国 法共的情况同它的伊比利亚和意大利邻国的情况不同，它在其中活动的国家有着比较稳定的民主制度，在它的记忆中国内没有什么法西斯主义。它同意共不一样，它不搞历史性妥协，似乎满足于推行“左翼团结”的方针。与社会党人一起商定的一九七二年共同纲领使人想起

三十年代的人民阵线，不过，有趣的是，它并没有被冠以这样的称呼。法共左翼团结的联盟政策的目的是显然并不是为了减轻右翼政治对手的担心，从而使全国团结起来（象意大利那样），而是要促使它自己同社会党人联合执政。然而，它在一九七七年九月找一个借口抛弃了共同纲领。

几乎所有的非共产党观察家都认为，法共甚至在两党谈判失败以前就作出了不同社会党人保持联盟关系的明确的决定。一份报告说，事情发生的先后经过如下：激进党左翼运动退出旨在使协议适应新形势的会谈，因为他们不能同意法共有化的要求。接着，法共拒绝了密特朗的折衷建议，认为他的建议甚至不值得作为讨论的基础。有人说，法共领导集团没有用充分的时间进行全面的研究就在九月二十二日晚上拒绝了密特朗的建议，第二天，《人道报》刊登了一篇攻击密特朗的文章，这篇文章在社会党还没有作出最后让步^⑩以前就已付印了。

法共为什么突然改变其联盟战略，其原因还不清楚。法共可能对共同纲领的政治影响作了错误的判断，因为在到一九七八年选举为止的这段时期内，看来社会党成了左翼中为首的政党，而

这一地位在战后大部分时期一直是属于法共的。此外，在左翼联合政府中充当低级伙伴可能也不足以酬谢法共对这个国家持续的经济问题所必须承担的责任。

不论怎么说，在一九七八年选举前夕抛弃共同纲领一事有助于说明法共联盟政策的不稳定性。法共五年来逐步趋向“欧洲共产主义”立场，其表现包括：它在一夜之间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它在一九七三年宣布，它愿意同所有“无产阶级和民主力量”及“代表天主教人民群众的势力”合作——显然这一趋向并不是以同社会党人结成牢不可破的联盟为条件的。看来它当前的政治目标是保持它在法国左翼中第一大党的历史地位。它显然希望，它居于这种地位便能够成为对政府不满的那些人的主要的投靠场所。

然而，法共从法国选民所得的选票仍停留在百分之二十上下。它如果不同社会党人结盟，看来它在中期将难以进入政府。但是，这可能不是它的当前的目标。法共处处显出，它相信法国的经济危机将加深，看来它不愿意还在它只是社会党政府的一个低级伙伴时就对经济危机承担责任。显然，法共的联盟政策不主张在不符合它自

己利益的时候去帮助稳定法国的民主制度和经济制度。同民主制度合为一体（不可分割）、民主制度的运转与它有利害关系的政党是不会采取这种战略的。

联合王国 同南欧的大党相比，欧洲北部小党的联盟战略的活动余地小得多，因为它们贡献小得多。英共多年来一直认为它掌握政权和扩大影响的主要途径不是通过同另一个政党公开结盟，^⑳而是通过在工会运动和工党里扩大影响。从这一意义讲，英共的联盟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渗透政策。英共并不企图隐瞒它当前的战略目标：

“左翼和右翼的斗争领域包括工会……和工党。……工党的政策变化同工人阶级的政策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㉑此外，英共在一九七七年代表大会上阐明了它将来同工党联合的明确的办法：

“共产党人希望工会重新拥有从政治上忠诚的人中、从它们自己选择的政治上忠于工党的那些人中选举代表的民主权利。”^㉒虽然参加工会领导机构的共产党员可以帮助决定工会代表团在工党会议上的投票方式，但是只有工党党员才能出席这些会议，英共的目标是使工党放弃这种规定，

以便共产党员能够假借工会代表的身份出席工党的制定政策(和组织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这样,英共就可以同工党建立间接的联系,从而避免因为建立直接的和正式宣布的联系而(使工党)在公众中引起反感。这一战略目标得到工党左翼某些人的支持,⑤ 虽然这一战略目标从大选方面来看不大可能实现。工党左翼的领导人看来希望同英国工党和欧洲大陆的“欧洲共产主义”党改善关系。工党左翼控制的全国执行委员会邀请了许多西欧共产党派观察员出席一九七七年十月在布赖斯顿举行的年会,这无疑是改善关系的一个方面。这是工党的一个根本性的新变化。英共对意共和法共的坚决支持将来可能在国内——在它同工党的内部关系方面——对它有好处。

共产党的联盟政策在它拥有的选民少但是又能在工会中站住脚跟的国家里陷于严重的进退两难的境地,英国的情况正反映了这些党的处境。英共没有发展成大政党的希望,也没有使足够的党员当选为议员在下院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希望。然而,它继续宣称它的目标是“结盟,而不是孤立”。

在社会民主党力量大、地位稳的国家中,规

模不大的共产党寄希望于影响这些党的内部发展的缓慢过程，它们的这个希望是长期的、然而常常是不可能实现的。至于英共，它必定希望工党将变成一个完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换一种手段——或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英共将从劳资斗争方面着手来改变社会。

共产党（不管是大党还是小党）过去的联盟政策的历史向我们表明，它们并不希望永远同民主程序结为一体。共产党联盟战略的最主要的对象是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而他们常常认为，共产党人建议组织统一阵线或人民阵线预示着共产党人愿意为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民主准则之间实现真正、持久的和解而努力。然而社会党人常常由于这种天真的乐观情绪而吃苦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联盟战略、西共（包括卡里略本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对非共产主义的共和党人的所作所为、东欧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起的作用（它们出卖非共产主义的左翼党，并向它们渗透）——所有这一切都促使左翼继续怀疑共产党的动机。五十年代工党左翼的非官方领导人安奈林·比万总结了二

十五年前的一种情绪：“共产党人并不把社会党人看作是从事共同事业的战友。共产党人把社会党人视为容易受骗的蠢人，是暂时利用的对象，一旦达到其目的，即无情地予以抛弃。”^⑤

从比万说这番话以后，共产党联盟政策的目标究竟有多少改变，是一点也不清楚的。联盟政策可能不再由莫斯科决定，但是它们仍具有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联盟政策的许多特点。

首先，联盟到目前为止看来没有影响共产党内部的发展。欧洲共产党小心翼翼地保证使联盟决不会破坏它们自己的特点和目标。凡是共产党内出现的变化都是它们本身独立地演变的结果，而不是参加联盟的其他政党的“影响”所致。例如，葡共的联盟政策一点也没有削弱它的斯大林主义思想体系。此外，同其他政党结盟（不论是以共同纲领的形式，还是以后谋求的历史性妥协的形式）都没有使共产党内部严密的纪律控制有所放松，西共是例外。实际上，保证干部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党纪对共产党在西方开展政治活动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对党内生活没有这种控制，党的领导人加入很容易在一夜之间发生变故的策略联盟的行动自由就比较少了。共产党联盟

政策的改变常常会使党内产生分歧。

第二，欧洲党、甚至连选举前景不佳的小党都不认为，联盟是共产党机构解体 and 它演变为另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的序幕。不能想象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管共产党多么小，不管联盟在表面上显得多么牢固，也不管思想体系的修正有多么深刻，共产党总是各国形势中一个长期存在的因素。它保持着它所谓的特殊作用，它认为只有它才适合发挥这种作用。特殊作用——包括对历史发展有比较深刻的理解这一见解——只能意味着共产党从联盟中几乎学不到任何东西，它们也不认为由于联盟的存在而必须适应形势，必须有所变化，除了在策略上有所变化以外。

第三，欧洲共产党的联盟政策仍然有可能迅速发生不可预料的变化。这也使人想起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往事，虽然它们也许不会是听命于莫斯科的。法国的共同纲领在法共与法国社会党的关系表面上发展和稳定了五年以后被抛弃就是最新的一个例子。甚至貌似意共坚定不移的目标的历史性妥协也不是不可侵犯的。仍很有权威的意共领导人路易吉·隆哥最近向党的信徒指出，不要把历史性妥协看作永久性安排，它只不过是

党认为在目前有益的一种策略联盟而已。他指出，列宁也主张建立这类策略联盟。实际上，一九七八年一月，意共在安德雷奥蒂政府垮台以后扬言要修改它的整个战略，企图组织三十多年来第一次不让天民党人参加的左翼联合政府。这些突如其来的改变不再是来自这个国家以外的指挥中心的决定，这并没有使共产党人作为盟友比过去更可靠一些。实际上，没有理由相信共产党人同民主制度建立了不可分割的联系。虽然一些非共产党的——或许还有一些共产党的——分析家可能认为，它们同资产阶级政党结盟以及它们支持资产阶级制度的做法集中体现了共产党的客观利益，但是共产党领导人本身并没有得出这一结论。建立联盟和表面上支持稳定，这对共产党来说是有用的手段。在它们认为这些手段成了障碍的时候，这些手段便可能、而且一定会被抛弃——即使在资产阶级看来这样做不符合共产党的利益也罢。

虽然共产党的联盟政策仍象以往一样不可逆料，也没有迹象表明将同民主制度长期和解，但是许多欧洲人看来现在对于同它们结成联盟已不象比万时期那样疑虑重重。疑虑还是有的，可是

英共近来在思想体系上和政策上的变化——整个现象被称为“欧洲共产主义”——已经使忧虑有所减轻。

政策、思想体系和民主协议

难道欧洲共产党最近在思想体系上、政策上的变化意味着出现了一种不再威胁民主制与多元论的新型的共产主义吗？欧洲共产党——且不管它们还是列宁主义的组织——现在是战后西欧民主协议的一个组成部分吗？或者说，如果它们还没有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是不是不再对它有威胁了呢？它们是否已经变成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个分支？

给这种民主协议加一个称呼是困难的。“新资本主义民主”或者甚至“社会民主主义”的说法用得越来越多。也许可以同意把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民主多元论”作为构成西欧民主协议的形形色色政治传统和政党一致同意的最起码的共同因素。构成民主协议的关键因素是：尊重传统的、思想的、政治的、民权的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尊重多党民主程序；保护（介于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的）混合经济；尊重自发性组

织(特别是工会)的自主权。西欧各个非共产主义的大党或政治思想流派都会毫不含糊地接受这四项主张,都会同意它们所谓的民主协议。西欧的一些政治力量会强调某几点而不强调另外几点(同时将就混合经济的合成比例展开激烈的争论),不过所有这些主张都会被接受。大多数观察家认为,英国的新法西斯主义的民族阵线、意大利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和西班牙的人民同盟的部分人不会支持民主协议。还有一个问题是:主要的共产党是否也不支持?正是对说明民主协议的四项主张的态度,才能衡量是否是“欧洲共产主义”党。

我们以这四条原则衡量这些党时,发现欧洲共产党对这些民主原则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此外,几乎没有人分析下述问题:这些民主原则将在它们最终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如何实施(和捍卫)。然而,共产党的实际表现常常令人不安。

欧洲共产主义和政治自由

西欧共产党关于自由说得最准确的言论是马歇和贝林格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两党会谈后

发表的联合宣言，宣言说：

所有这一切自由都是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工人阶级领导的本世纪的权力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果实，对此必须加以保障和发扬；只有这样，才有思想和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才有示威的权利，才能保障私人生活的不可侵犯性，才有宗教信仰自由，才有阐述各种思潮、各种哲学、文化和艺术观点的完全自由。

西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一九七二年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也提出了一系列它将尊重的自由，同时不再试图强制推行官方的国家哲学体系。英共也宣布它支持这些典型的自由，但是它的支持有一个条件：“在一个有秩序的、公正的社会中为保护公民不受他人干预和剥削以及为捍卫民主必须实行一些限制”，^③只有受这些限制制约的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才受到尊重。

虽然“欧洲共产主义”理论家认为政治自由的发展同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之间有着历史上的联系，但是他们没有从这一类说

法中得出结论。他们激烈反对让一弗朗索瓦·勒韦尔的下述看法：资本主义同民主仍然有关系。勒韦尔说，政治民主“仍是它（资本主义）的本色”，“没有别的经济形态产生过民主”。^⑳然而，欧洲共产主义者几乎没有涉及下列问题：政治自由是否**一定**同经济利益和所有制类型的多元化同时并存。由于没有这种分析，他们倒是倾向于认为，不管社会和经济安排如何，政治自由都将得到保障——好象只要政治家一宣布它们存在，它们就因而存在了。

对政治自由的渊源缺少分析，这同自由主义传统大相径庭。这对于在一个“欧洲共产主义”社会中继续保持自由是个岌岌可危的思想基础。如果一个“欧洲共产主义”社会的执政的政治家对自由是否可取改变了看法，那么以什么作为实现自由的社会—经济支柱，这就不清楚了。此外，“欧洲共产主义者”强调与自由传统的个人性质针锋相对的集体性、他们从经济和社会角度对待自由比从政治角度对待自由的时候多，他们因而就放弃了自由传统。例如，纳波利塔诺在谈他所谓的“新型”民主时谈到必须赋予它以“先进的经济和社会意义”，^㉑但是，他没有详细说明他

的这个说法是什么意思。在这位“欧洲共产主义者”看来，自由（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自由）由于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大大扩大。至于自由是怎么扩大的，这种自由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很少阐述。

“欧洲共产主义”关于自由的宣言还必须同“欧洲共产主义”的实践相对照。西欧共产党的文化几乎不鼓励将来可能会治理“欧洲共产主义”国家的干部开展自由讨论或发挥首创精神。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历来有改写他们自己历史的习惯，这也是一个不祥的预兆；^{③⑨}他们试图在他们控制的一切文化界和知识界的组织（出版公司、日报、周刊、大学的院系和其他舆论中心）建立意识形态霸权，这同样是不祥的预兆。特别是意共最近还会企图实行新闻检查。除其它活动以外，它还建议禁止某些敌视意共的外国电视广播。^{④⑩}苏联企图说服安德雷奥蒂政府取消每两年在威尼斯举行一次的艺术节，因为它要讨论“东欧文化界持不同政见者”问题，^{④⑪}贝林格及其助手支持苏联的这一要求。意共控制了印刷工人委员会和新闻工作者委员会，因为它们对报纸编辑和发行人的影响越来越大，它们保证登载有利于意共的社论

和新闻报道。^{④②}

“欧洲共产主义”和多党民主程序

西方民主国家的共产党早就放弃了暴力斗争是实现它们政治目标的必要手段这一列宁主义理论。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说明苏联批准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以和平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然而，“和平”不一定意味着“议会”或“立宪”；因为大多数西欧共产党仍坚持在议会外开展群众斗争的战略；它们越来越常说，它们在这个历史性时刻坚持立宪民主程序：

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人支持下列各点：多党制、反对党有存在与活动的权利、自由组织多数党与少数党以及它们通过民主程序轮流执政的可能性、国家的世俗特点和民主职能以及司法部门的独立性。^{④③}

特别是对法国共产党来说，这是某种倒退，因为就在五年前，乔治·马歇说过：

我们认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不应当因为轮流执政制而感到鼓舞，这种制度——如在英国——使保守党和工党得以轮流执政，从而使工人蒙受最严重的伤害。^④

西共、英共和大多数其他西欧共产党（葡共除外）现在都断然表示——至少在口头上是如此——坚决要通过民主道路掌权，坚决在它们选举获胜后的一段时期内保持多党制。

然而，疑虑并没有消除。原因之一是，共产党的多元论的概念同西方传统的多元论概念大不一样。自由主义的多元论具有自发性，它认为，新思想、新政治组织可以在任何时候、在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出现。共产党的多元论概念却不是自发的，而是有控制的。各种协会确实可以存在，甚至非共产党人也可以建立和领导协会；但是，如果它们对领导力量（党）规定的最高目标没有贡献，它们在社会上和道义上就没有真正的合法性。阿雷把这种多元论观点比作中世纪教会的多元论观点，教会不仅同意、而且鼓励建立大量形形色色的团体，但是只有接受下述条件才能建立，那就是：它们接受教会给它们规定的地点、

性质和作用。它们每一个团体都应承认只有教会才有权确定社会的主要目标和基本的行为准则。中世纪的教会是这样，执政的共产党——不管叫“欧洲共产主义”党或者叫别的什么名字——也是这样。很难想象一个强有力的“资产阶级反对派”能够在这种社会中适当地发挥作用。

在“欧洲共产主义”社会中，其它政党或力量可能在法律上受到保护，但是它们能够适当开展活动的条件是沒有的。据它们自己普遍接受的共产党的阶级分析认为，它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消灭阶级社会的痕迹，代表剥削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将随着阶级社会的痕迹的消灭而消灭。英共在一项很说明问题的声明中暗示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将实现这一点：

下述措施将进一步削弱保守党的地位：

“对它的主要支持者大垄断资本家采取的措施；为打破对报纸的垄断控制、使新闻机构向劳动人民开放而采取的步骤……”尤其不祥的是，“政府为解决危机而采取的符合人民利益的措施”。④

因此，如果这种社会改造的进程能够更有效地完成这项任务，那么，就没有必要使自由民主党人由于宣布取缔其他政党而害怕了。“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可能有不同政党存在的客观基础”，^{④6}但是建成社会主义以后怎么样，共产党理论家的态度就含糊了。当然，所有权利都将得到保证，但是，实际又将如何呢？据拉迪切说，纳波利塔诺的《一种新型的民主》一文中说，“认为他们（选民）希望倒拨时针，这既不符合历史，也不合情理”。^{④7}

共产党人很可能是在意见对立、紧张的政治气氛中进入政府的，这将进一步说明“欧洲共产主义”统治之下的多党制的脆弱性。在共产党接近掌权（或共同掌权）的拉丁语系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有着民主稳定地发展的历史；极右翼采取行动来反对共产党参加政府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在意共与西共的文学作品中，取材于法西斯和独裁统治时期的秘密阴谋活动的“政变”与“反政变”主题比比皆是。法共也曾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度日，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八年。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卡里略，他最明确地表示，“欧洲共产主义”

党不排除重新使用革命手段的可能性，他说：

“如果统治阶级堵上民主道路的话”。^④他争辩说，一旦共产党得胜，“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可能要进行颠覆……如果反动势力诉诸武力，那就不得不以武力回敬。”^⑤英共是这样说的：“如果敌视社会主义的政党转而使用武力……来破坏民主程序，那么，社会主义政府和劳动人民为了捍卫民主，须要动武，就要动武。”^⑥这种反对非民主势力对一个民主国家的挑战的战略似乎是无可指摘的。然而，由于这些话是随心所欲地使用诸如反动与民主这种字眼的那些人说的，因此，还是停下来想一想为好。

此外，所有的“欧洲共产主义”党都支持使用武力（包括苏联的军队）镇压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起义，虽然不支持镇压一九六八年的捷克斯洛伐克起义。共产党书报为这两次入侵所划的界限是很有趣的。据西共执行委员会委员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说，在布达佩斯，“社会主义的敌人……试图利用现存的自由”；^⑦布拉格却不是这种情况。拉迪切说，如果说“一九六八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是反革命的，那是不值一驳的胡说八道。在布拉格，人们甚至不记得以前的厂主

和地主的名字了。”^⑫如果他们真的记得他们的名字又怎么样呢？还有，如果他们希望资本主义复辟又怎么样呢？“欧洲共产主义者”想对下面两种情况划一条界限，即哪些是对共产党政权提出的合法的（即社会主义的）抗议，哪些是反革命。

“欧洲共产主义”政府将如何确定反革命的主要特征，这对它们新近获得的民主形象是至关重要的考验。罢工会被认为是反革命吗？会容忍（显然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群众抗议吗？如果意共和法共上台，将来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党政府大概就得在这种环境中行使职权。它们继续不相信人民中存在倒拨时针的基础，一旦它们上台，这种信念可能导致它们误把民主势力的反对意见当作“教权法西斯”反动势力。实际上，希望回到共产党执政以前的社会去的那些人将是反革命，而且可能以这种身份对待他们。

“欧洲共产主义”和混合经济

各个共产党视其本国的国情而对经济政策采取不同的立场。例如，意共的方针与法共的方针差别就很大。意共暂时放弃了过去的主张：扩大国营部门，“因为国营部门现在已经够大了”。^⑬

它打算通过笼统地为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定指标的国家计划来实现它的当前目标。它之所以采取这种有所限制的方针可能同意共的总的立场有些关系。意共总的立场是，作为一个谋求建立“救国政府”的党，意共愿意牺牲主义来帮助对付危机。此外，这也可能是意共认识到意大利的许多国营企业名声狼藉，贪污成风的结果，还可能是他们奉行树立一个正派党形象的政策的一个方面。同时，意共提议大大增加社会福利开支，在意大利当前财政拮据的情况下，其结果必然加剧通货膨胀，“削弱资产阶级的力量”。意共建议，如果通货膨胀失去控制，则实行物价控制——其结果是使私营企业破产。

看来意共压倒一切的战略目标是作为一个负责的全国性政党掌权。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它似乎愿意目前实际上牺牲它的全部社会主义经济目标。

法共的情况则不同。法国共产党最初（一九七二年）同社会党人商定一项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内容包括“把经济中的银行和财政部门——包括保险业——国有化；军火、核、制药、航空与航天工业国有化”，^⑤以及政府控制其它多种多样的

工业。一九七二年的国有化计划虽然值得注意，但却使密特朗可以宣称，他同共产党人达成的协议维护了“多种多样、极其广泛的”私营部门（上述属于国有化范围的各个公司的正式利润在一九七六年只有二亿五千万美元）。^⑤ 共同纲领由于法共坚持主张双方应一致同意大大扩大国有化范围而告失败。显然，自一九七二年法共同意一项有限的纲领以后，政治形势已经大变。

看来西欧的两大共产党把它们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国有化方案）看作权力角逐中的一个杠杆，视形势和战略思想的变化而后缩或前进。意共在接近掌权而且希望显得是一个体面、爱国的政党时，它就在公有制问题上持克制态度；法共则利用国有化问题来破坏共同纲领（它因为各别的政治原因须要破坏它）。两者不论是哪一种情况，都是政治战略高于经济纲领的完整性。

西共因为刚脱离过去的秘密活动状态，目前关心的是保证它在脆弱的民主制度中的地位，因此没有优先考虑国有化问题。西共现在还没有深思熟虑的经济政策，虽然它从长远来说是主张广泛国有化的原则的。

尽管各个共产党的近期经济目标不同，然而

事实仍然是，它们共同的最终目标——实际上这正是它们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是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对全世界共产党人来说，资本主义被取而代之意味着消灭私人资本积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可能还有交换和分配资料）将是公有的。所有“欧洲共产主义”党坚持这一共产主义最终目标，这同西欧继续保持混合经济是水火不相容的。在我们全力以赴注意当前的政策方案的时候，这一点常常被忽略，这大概正是我们西方的思想环境易变（以及思想简单、一厢情愿）的一个特点。

当然，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我们可以指望财产和生产的公有制与私有制共存。没有一个共产党曾表示过渡时期将会很快过去。卡里略说，在过渡阶段，将承认“私人企业的作用”。^{⑤⑥}不过，这种承认也只是过渡性的而已。

“欧洲共产主义”和自发性组织的自主权

在一个工业社会中，给予自发性组织——特别是工会——多大的自由，总的来说这是对社会自由的一种重要的考验。自发的工人协会讨价还价和开展宣传的能力常常是社会对其它影响较

小、自主权不大的组织的一般态度的标志。所有的西欧共产党都声称尊重有组织劳工的自主权；在独裁和法西斯政权统治之下，它们确实站在捍卫自由工会制度运动的最前列。

然而，对于它们的动机还有疑问。经典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会的战斗精神是提高阶级觉悟、推动社会向社会主义前进的一种手段；当建成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西方所理解的工会就没有必要再存在了。共产党控制的西欧各个工会要改变社会，而不是改良社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认为，工会将因而自行消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各国共产党对工会战斗精神的态度不一致。没有一种总的格局说明共产党长期希望工会始终保持战斗精神，实际上，法共在一九六八年那段紧张的日子里对阻止一次大罢工起了主要的作用。意共因为接近于掌权，它利用它对工会的影响来限制它们的要求。即使如此，如果法共或意共有朝一日与政府全面对抗，那么，它们就会把工会的战斗精神鼓动起来。换言之，工会被看作是政治行动的一个分支机构，实际上是建立一个真正的工会没有必要再

存在的社会的一种手段。

意味深长的是，“欧洲共产主义”党很少批评苏联和东方集团政权压制工人的权利和工会制度。实际上，苏联和东方集团的“工会”同西欧的共产党(或其它党)的工会建立了一系列关系。虽然莫斯科同西欧工会的某些同志有分歧，但他们通过双边计划和苏联控制的世界工会联合会共同在第三世界推行苏联的“工会制度”概念。

“欧洲共产主义”已经变成 “社会民主主义”了吗？

表面上，“欧洲共产主义”（从关于尊重政治自由、民主程序、混合经济和自发性组织的自主权的宣言形式来看）同西欧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分不清楚。西欧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官方接触增多，^⑤这可能预示着将出现某种形式的意识形态“一致”。

然而，坚决否认同社会民主主义在思想上有任何一致的正是共产党领导人本身。甚至最“冒进”、最“富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欧洲共产主义”理论家圣地亚哥·卡里略也坚决反对这种说法。他说：“我得先是毛派分子、托洛茨基分子，

恐怖分子然后才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⑤⑧} 每个西欧共产党都出来否认同社会民主党在思想上是一致的，虽然它们的否认不那么引人注目。^{⑤⑨}

西欧共产党坚决要划一条这样截然的理论界限，这是很有趣的事。尽管对多元论和自由的必要性的看法显然是一致的，但是社会民主主义被认为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它赤诚地为资产阶级社会效劳，并不想改造它。”^{⑥⑩} 现代“欧洲共产主义”理论家对苏共一九六一年党纲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典型谴责都没有提出异议，苏共党纲说：“社会民主党右翼彻底同马克思主义决裂，并用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来同科学社会主义对抗，它的拥护者否认资产阶级社会中对抗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⑥⑪}

争论的核心围绕这样一个问题：欧洲共产主义接受、而社会民主主义则拒绝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原则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为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规定的主要作用。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者不接受关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或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典型的或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他们一方面完全知道劳资双方在谈判桌上是敌对的关系，一方面又不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来看待阶

级冲突的现实。对欧洲思想影响很大的英国社会主义传统坚持阶级和谐的目标。

另一方面，“欧洲共产主义者”在全部基本论点中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的典型立场。即使如此，“欧洲共产主义”的阶级学说也经历了一个软化的过程，大多数西欧共产党——包括葡共——不再用“无产阶级专政”一词。“欧洲共产主义”党现在坚信葛兰西的“工人阶级支配权”的主张。这一新主张同“无产阶级专政”究竟有多少不同，还不清楚。古典的或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都没有对“专政”或“支配权”的国家权力下过恰当的定义。“欧洲共产主义”理论家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坚决主张对社会实行“工人阶级支配权”的程序，除了解释说老的主张可能给思想单纯的人留下了压迫的印象以外，没有赋予它以新的意义。尼尔·麦金尼斯说，不提“无产阶级专政”“有某种意义，能够产生明显的影响”，“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只有在它作为法律上的新事物出现时才有真正的意义。”^②任何一个“欧洲共产主义”党都不曾试图把关于工人阶级支配权的理论同一个新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法律程序有机地联系起来。支配权的

说法无助于说明一种新的革命程序，相反，倒有利于在资产阶级眼里树立比较有利的形象。即使如此，对“自由主义者”来说，“支配权”仍是一个令人担心的字眼，它同多元论是互不相容的。

“欧洲共产主义”关于阶级提法“软化”过程的另一个方面是修订了对工人阶级联盟的分析。今天西欧共产党的声明中处处有越过“工人阶级”向被认为对改造社会感兴趣的新阶级发出的呼吁。这些新阶级有代表性的称呼是“中间阶层”

（也就是介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他们包括：国家机构的中级管理人员和不受雇于人的专业人员，如建筑师、律师、作家、艺术家、医生和不雇用工人的家庭商店的男女业主。^③共产党的战略家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中间阶层”越来越不满意，因此，有可能争取他们支持激进的、甚至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动。然而，共产党新近对新中产阶级的关心（和讨好）是补充而不是取代比较陈腐的理论，原来的阶级分析的基本内容原封未动，认识这一点是重要的。

“工人阶级”仍然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力量，并没有出现几个阶级合成一个新的革命阶级的情况；“中间阶层”是争取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的

盟友，不是斗争的领导力量。没有重新估价社会的阶级性质的信念。“工人阶级”同“中间阶层”的联盟只不过是关于无产阶级同农民（即农村半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联盟这一列宁主义老概念^④在新情况下换一种说法而已。因为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其它西欧国家的社会在继续发展、继续工业化、官僚化和“资产阶级化”，共产党认为没有必要修改或放弃它们的阶级分析；它们只是把一个现代化的“小资产阶级”附加物列入典型分析的范畴。列宁大概是会同意的。

因此，以“支配权”和“中间阶层”来取代“专政”绝不是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念阶级分析。阶级分析是欧洲党的哲学思想的基础。简单一点说，阶级分析的实质（西欧的所有共产党都接受）是：资本主义是以阶级斗争为特点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工人阶级将在阶级盟友的援助下、共产党的领导下用这种手段或那种手段建立社会主义；这样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是无阶级的，资产阶级文化、经济组织和政治制度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学说同“欧洲共产主义”关于自由、多元

论和民主的主张是冲突的。因为，如果资产阶级社会要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资产阶级自由和政治程序也都要改造呢？十八、十九、二十世纪的资产阶级民主大发展的局面（共产党人承认这种发展）是不是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继续下去呢？还是只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保持一段时期呢？另外，是不是它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被抛弃，以后又以某种不明确的、大大发展了的方式在天堂里重新出现呢？波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教授（现旅居西方）竭力想解决这些问题。他说：

不管贝林格怎么解释说，代议制民主是一个“战略”原则，而不是“策略”原则……这可能意味着，民主的原则在共产党统治下能够在较长、而不是较短的时期内有效；或者这可能意味着，民主的原则将保持到时机成熟时必然会来到的下一个“历史阶段”。^⑥

本书设想，到某个时候，“民主原则”（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再有效了。

对“欧洲共产主义者”来说，问题在于，他们宣称支持的“民主原则”是用不变的字眼表达的，而他们信仰的哲学思想是变化的，他们阐明这样一个革命（或演变）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把对于非共产党人如此重要的资产阶级自由保持下来，也可能不保持下来。在“欧洲共产主义者”继续脚踩两只船的时候，关于“欧洲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自由问题的辩论决不可能有结果。

然而，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欧洲共产主义”党——西共又可能是例外——演变到了同它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去决裂的地步。它们的政策转变了，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的看法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只谴责斯大林主义是无关紧要的。使各种类型的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天民党人，甚至大部分民主社会主义传统区别开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党内的一些派别坚信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法国、意大利和伊比利亚的社会党的党员队伍中既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非马克思主义者。在欧洲北部，英国工党左翼在历史上主要是倾向于基督教社会主义，而不是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在西德，社会民主党在一九五九年的巴特戈德斯

贝格会议上正式决定不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它的官方的思想体系。

用戴维·欧文的话来问，欧洲共产党现在是不是能够对我们西方所了解的民主制度作出“真正的、持久的贡献”呢？可以肯定，欧洲共产党已经更靠近民主协议了。它们现在对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它们自己在社会中的先锋作用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它们当中有一个党——西共——已经多少比较能够容忍自己队伍中的持不同政见者。通过它们的联盟政策，有些党已经表明至少在短期内支持稳定民主制度。此外，它们的理论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然而，尽管有这些变动，但是欧洲共产党还是一心要实现革命目标，还是基本以苏联作为它们发展的榜样（西共例外）。它们还是为自己保持着区别于其它政党的特殊地位。它们的目标还是使社会制度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这些党仍然坚持民主集中制，保证党员的高度一致。它们的联盟政策是不稳定的，仍可能迅速发生变化；它们承认，联盟政策是一种策略。在理论方面，它们的整个思想结构本质上仍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

发生变化的那些方面，这些发展是怎么适应它们的支配一切的思想体系的，这一点还不清楚。它们还不能提出另一种首尾一贯的、令人信服的哲学思想体系。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得出结论说，处于目前状况的欧洲共产党现在能够对民主作出“真正的、持久的贡献”。

第三章

共产党和国际力量对比

近几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事态发展之一就是，苏联同西班牙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及其它一些小党之间的关系明显地、公开地日益紧张。这种明显的、日益发展的多中心主义是支撑“欧洲共产主义”这座大厦的主要支柱之一。这使人产生这种看法：欧洲这些党基本上是独立于苏联的，如果它们的力量加强或进入政府，那将完全不利于苏联集团。

但是，欧洲这些党和苏联之间关系紧张的性质和程度还不清楚。莫斯科同欧洲一些主要的党之间的辩论是复杂的，充满微妙、模糊和矛盾的东西。而且，在分析欧洲这些党对诸如参加西方防务、欧洲合作或第三世界的发展和阵容等重要问题的看法之后，也不能得出结论说，这些党对

苏联只有害而无利。的确，虽然欧洲这些党的力量和独立的加强也许对苏联不利，但它们无论在朝或在野，都是有助于苏联为使全球力量对比变得不利于西方而作的努力的。

共产党和苏联

虽然莫斯科和欧洲这些党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但它们之间争论的核心却围绕下列问题：莫斯科认为必须严格遵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大家公认的这个术语的意思是把苏联的利益放在首位、承认莫斯科是共产党权威的唯一中心。由于西欧共产党（以意大利和西班牙共产党为首）单独提出了本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概念，由于它们有意识地作出努力同苏联生活的某些方面保持距离，因此苏联坚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日益受到挑战。

这种挑战于一九七六年六月在柏林举行的、欧洲所有重要的共产党都出席的全欧共产党会议上达到了顶峰。会后发表了一项公报，引人注目地略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公报虽然没有特别拒绝这个概念，但它却提到了“在各国工人之间相互支持”。它坚持各个共产党的独立

性，任何一个党都不得干涉别党的内部事务。

法国共产党站在这场拒绝“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斗争的最前列。在柏林会议以前的若干时候，马歇一直在批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说这种主义把苏联国家政策的利益置于法国共产主义民族革命需要的利益之上。在柏林会议之前的各次预备会上，看得很清楚，如果议程上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议题，那么主要的共产党都将不参加会议。

在柏林会上十分明确地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原则，这使各国共产党批评苏联压制人权的做法有了某种理论上的合法性。西欧所有主要共产党都声称自己是民主的，并主张言论自由。因此，它们对于斯大林主义过去和苏联现在的某些方面表示遗憾。

欧洲这些党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支持受到广泛的宣传，不过这种支持是有选择的。总的来说，西欧这些共产党公开支持苏联和东欧中的“**社会主义反对派**”。例如，它们通过党的刊物广为宣传共产党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①和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章小组。有些欧洲党批评华约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因为他们认

为杜布切克政权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没有给予支持、没有作什么报道的是其它类型的持不同政见者：希望离境的苏联犹太人、索尔仁尼琴分子和布科夫斯基分子、萨哈罗夫派或同工人权利和工会权利有关的人。简言之，西欧共产党在维护民主和人权方面的表现，比它们给予努力在苏联和东欧促进民主和多元论的人的支持更为彻底、更为全面。正如夏皮罗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即使这样，尽管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支持也许是有限的、有选择的，但对苏联人来说也可能成为一个大问题。

而且，直到最近为止，西欧任何共产党在批评苏联没有人权之后并没有进而系统地分析苏联实行这种镇压的政治原因。欧洲这些党没有把共产主义和不给自由联系在一起。的确，卡里略曾说，苏联社会不是“社会主义”（他所谓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共产主义），因此，他认为，这一点可以说明为什么它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其他一些共产党声称，苏联尽管从根本上说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也有某些“堕落”的成分。因此，卡里略和其他共产党领袖都不可能使自己考虑这个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制度中的共产主义性质

同对知识界、少数民族中和工人中的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之间存在有机的因果关系。

欧洲这些党对苏联缺乏自由的现象偶尔提出批评，但必须看到它们对莫斯科是普遍支持的，这种支持是西欧这些党同苏联之间的一种政治移情作用，而这种作用在西欧这些党同美国或同任何其他西方国家之间是不存在的。这种**普遍**支持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共产党八人书记处书记兼书记处经济问题发言人乔治·纳波利塔诺。他说：

“我们不能无视同社会主义世界（共产主义世界——苏联和东方集团）的意识形态纽带和互相支持的感情……我们也不能接受下列做法：忽视或否认苏联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所起的国际作用。”②

可能除了卡里略和一些西班牙共产党员以外，西欧共产党都认为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他们追求的理想社会是苏联，而不是他们目前所处的那个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换句话说，苏联尽管有些缺点，但还是在向一个比西方社会更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前进。欧洲这些党和西欧所有的民主党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最基层组织的这种亲苏情绪。正如上面所引的纳波

利塔诺那段话所表达的，苏联还被认为是“和平的”国家。西欧这些共产党认为，具有“侵略性”的是美国，而不是苏联。

欧洲这些党的反帝论调也是符合苏联利益的。在这点上，包括西班牙共产党在内的西欧共产党都站在苏联一边反对西方。人们普遍认为，帝国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现象。西欧任何一个共产党都没有称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是“帝国主义”控制。卡里略说：“美国不仅使自己有权用暴力对付本国的被压迫阶级，而且使自己有权剥削所有国家的人民，就象每一个殖民帝国近来干的那样。”^③但对苏联从未作过这种谴责。压迫、剥削、暴力显然全是西方制度的独有产物。

这些西欧共产党（除卡里略的态度模棱两可之外）不仅认为苏联尽管有其不完善之处但仍是“社会主义的”、“爱好和平的”和“反帝的”国家，而且都抵制和反对他们称之为“反苏主义”的现象。反苏主义这个词是用来说明全面谴责苏联制度的做法的（这些欧洲共产党从未作过这种谴责）。事实上，柏林会议之后发表的公报特别拒绝了反苏主义。而这些欧洲共产党却没有拒绝“反美主义”。

这种自然而然的、在意识形态上对苏联的偏爱并没有受到人权问题的影响。虽然欧洲这些党有选择地批评了莫斯科的行为，但它们对人权的赞助并没有使自己倒入西方阵营。在这个对西方最有利的问题上，欧洲这些共产党人采取了介于东、西方之间的中立态度。他们对双方都进行了谴责，批评西方由于其独有的失业和对妇女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歧视而实行不了人权。这些社会经济权利被放在同政治权利一样高的优先地位。

由于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一支维护和平的力量以及由于它的反帝活动，因而对苏联给予普遍的支持，这也许能说明为什么这些西欧共产党人支持苏联的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的确，除了欧洲一些重要的、然而有分歧的问题（如欧洲一体化和参加北约问题、法国的威慑力量和美国在欧洲的基地等）之外，这些欧洲党一般都是同苏联全球政策一致的；它们经常一起努力促使西方帝国主义在欧洲以及世界其它地方垮台。正如意大利共产党主席隆哥在赞扬列宁主义和苏联时所说：“请设想一下，如果这支伟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是的，也是军事力量）和思想力量不

再存在的话，世界局势会变成什么样子！”④

共产党和欧洲

多数欧洲党对外政策的主要焦点当然是欧洲。如果它们没有雄心壮志希望对整个欧洲的政治演变发挥影响的话，那么它们就是微不足道的党了。诸如卡里略那样的一些人认为将来欧洲应为国际共产主义树立样板。正如这位西班牙领导人所说的：“不管人们喜欢与否……西欧的社会主义将成为整个工人阶级运动的一个标竿。”⑤

但目前这样的欧洲，它的“资本主义”色彩太浓了，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太大了。对欧洲一体化感兴趣的那些欧洲共产党的目的，是要通过欧洲共同体进行工作，以便不仅使西欧内部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变化，而且使欧洲的国际观点发生变化。

参与欧洲共同体的活动被认为是一种更普遍的泛欧战略的一部分。主要的共产党参与欧洲各级组织的工作，而不只是参与欧洲共同体的工作。贝林格在一九七六年柏林会议上概述了意大利共产党的这种泛欧战略：

我们将继续在下述各方面发挥我们欧洲的主动性：在全欧范围内发挥主动性，以便有助于缓和及合作；在西欧范围内发挥主动性，以便找到同其他左翼民主和进步力量的最广泛的共同点；在欧洲共同体范围内发挥主动性，以便在确保一体化进程是民主的并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方面作出我们的贡献。⑥

目前，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的泛欧战略的主要成分是在欧洲共同体内发挥作用。而过去的情况却并不总是如此的。所有这些党原来都是反对和谴责欧洲共同体的。苏联共产党和葡萄牙共产党现在仍然不断反对欧洲一体化。在英国一九七五年公民投票期间，英国共产党在鼓吹英国退出共同市场的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

虽然如此，南欧的主要共产党在过去这些年已改变主张。意大利党和西班牙党最坚决地表示支持欧洲共同体，而法国共产党的态度最冷淡。法国共产党接受共同市场是一个现实，但却又利用戴高乐派的强大推动力来保持法国的民族独立。虽然这些主要的党有许多理由支持欧洲共同体，

但欧洲所有大党都一致表示希望改变欧洲共同体的性质。意大利共产党的乔治·纳波利塔诺提出了他希望共同市场沿着什么方向前进，他用的措词可能是许多热心的欧洲一体化派会加以接受的：

共同体(欧洲共同体)可能充当西欧极其需要的经济独立的发言人；它可能促进**自主的**、协调一致的发展，并支持大家对下述可能发生的情况采取共同抵制的行动：现阶段这种世界危机将使美国重新获得和加强它对资本主义欧洲各国的霸权地位。这就是我们在欧洲共同体内为之奋斗争取的方针。⑦

“欧洲共产主义”党除了明显地想要削弱欧洲共同体和美国之间的联系外，它们发表的同欧洲共同体有关的言论还充满了呼吁欧洲共同体的“结构和方针民主化”的要求（这是一种攻击布鲁塞尔总部的官僚机构和共同体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委婉说法）。它们还要求欧洲共同体同东方集团之间改善关系。西欧共产党认为他们参加欧洲共同体的活动有助于促成一种有生气的现象——使整个西欧在世界上处于较为中立的地位。

虽然西欧共产党的战略目的是要削弱欧洲共同体同美国之间的关系，但是还没有一个欧洲共产党高级人物竟然要求欧洲共同体同经互会联合起来。相反，他们眼下的目的是要改善西欧同东欧的关系。欧洲共产党的这种中立立场常常使它们轻率地怀疑未来的共产党政府或受共产党影响的政府是否有能力建设一个真正独立的西欧。

这种怀疑是欧洲共产党人自己造成的，因为他们发表的有关欧洲的言论充满了社会主义“地区主义”的说法，而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却只字不提。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卡里略一直站在暗示要搞分裂活动的最前列，好象是东欧改革的带头人。他说：“多年来，莫斯科就是我们的罗马。我们谈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就好象它是我们的圣诞节一样。那是我们的幼年阶段。今天我们已成长起来了。”^⑧《经济学家》杂志在一篇论述“欧洲共产主义”的题为《等待路德同志》的文章中也提到了类似的“改革”。然而，它认为：“西班牙的卡里略先生和意大利的贝林格先生还没有完成信仰上的飞跃而领会新教原则。路德同志还没有到来。”^⑨它的看法是正确的。

然而仍然有一个问题：如果西欧渐渐处于“欧洲共产主义”的统治之下，那么将来建设一个独立的、一体化的西欧有多大的可能性呢？答案必定仍然是：根本是不可能的。首先，如果认为整个西欧在最近的将来会受到共产党政府或共产党影响的政府的威胁，那是错误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总称——译者注）和英国是不会参加任何新的区域性共产党西欧的。因此，如果共产党人在意大利、法国、甚至在西班牙获得相当大的权力的话，西欧就会分裂。它就不会作为一个整体向着统一的、中立的欧洲发展。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可能在南部组成一条带子，而西德同其北部和西部的邻国将在北部组成一条带子，后者很可能仍然同美国保持密切的联系。换句话说，如果认为西欧会普遍地不断转向中立主义，那是异想天开。一旦共产党参加南欧一些政府，最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支离破碎的西欧在经济政治方面将十分不稳。甚至经济合作都会受到破坏。比方说，一旦共产党参加南欧政府，那么当这些国家在国际收支和货币方面发生问题时，北欧国家会从经济上援助它们吗？在法国共

产党坚持把主要银行和工业部门收归国有并面临资本外流之后，能指望波恩的基民党政府或者甚至社民党政府会援助法国共产党吗？在条件最好的情况下，即使是姐妹党执政，要在欧洲民主政府之间实行跨越国界的合作都是困难的。如果共产党成为南欧一些国家政府的主要伙伴，那就会更不可能了。

另外，一个“欧洲共产主义”的南欧是否会继续保持中立，那是成问题的。特别是如果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不同情这个新集团的话，那么共产党希望欧洲保持中立所持的那些反帝和反美的论调就可能轻易地占上风。而且，（下面将论及这个问题）共产党声称对两个军事集团都反感，再加上它们对苏联扩张主义的做法满不在乎，这就可能导致南欧防务开支进一步削减，并最终取消美国的基地。除了卡里略曾暗示过欧洲保持一支“防务力量”有时也许是必要的之外，南欧这些共产党看来无兴趣建立或保持欧洲军事能力，以便增强他们同俄国人进行讨价还价的地位。一旦美国减少其军事卷入和对西欧承担的义务——共产党统治南欧后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那么，在西欧沒有一支一体化的、加强了防务力量的情

况下，苏联就将成为欧洲大陆无可争辩的、占统治地位的军事强国。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指望一个“欧洲共产主义的”南欧能保持其中立地位，即使它希望如此的话。往最好处说，它也会“芬兰化”。

另一种可能是，“欧洲共产主义的”南欧可能同其政治重心已大大向左转的北欧并肩发展。工党可能被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左派全面控制，而社民党也可能随着目前这一代年轻的社会党人掌权而较缓慢地转向极左派。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很难指望出现一个强大的、有防御能力的、一体化的、反苏的“社会主义”西欧。各共产党之间将仍存在重大政治分歧。如果没有苏联霸权的撮合，甚至这些共产党也无法协调其国际政策。比如，阿雷教授曾指出，意共一九七六年曾企图建立一个欧洲共产党协调中心，但是其他党不同意这个主张。此外，这些共产党在协调其对欧洲共同体的战略方面几乎也没有做什么事。

如果在这方面把北部的社会党也包括进来，那大概更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了。此外，各国党还必须对付各不相同的经济和文化问题，因而使得

无法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的”西欧。再者，很难设想，全欧洲的普遍向左转会导致保持强大的防务或加强防务一体化，以对付苏联。所有这些政治事态发展大概也不会同时一起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就能够利用这种不稳和不团结。

欧洲政治事态发展的另一种规模更大的设想（人们常常提出这种设想）是，“欧洲共产主义的”南欧和东欧国家政权之间“结合起来”。人们说，这种“结合”也许在这些“欧洲共产主义”党仍在野时就已出现了。人们指出，西欧这些共产党——卡里略把它们称为“整个工人阶级运动的标竿”——是鼓励东欧国家政权使其制度自由化的榜样；而如果这些西方共产党获得政权，那将将出现一种自然而然的联合，把东欧和西欧拉在一起。这就是“感染”理论的主要内容——即西欧共产党将用自己的“自由主义”和“民族共产主义”来“感染”东欧国家政权。人们列举了罗马尼亚的民族道路政策作为例证，表明这种历史进程已在进行。人们还列举了下列事实作为更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即波兰、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许多西欧共产党正式表示支持捷克斯洛伐

克的七七宪章运动)持不同政见的人数在增加。对东欧人来说,一个受“欧洲共产主义”影响的共同市场将是更能吸引人的力量。

然而,这样一种“结合”同东欧的政治和军事现实是大相径庭的。苏联是那里政治事态发展的重大决定性因素。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一九五六年)以及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六八年)事件仍使人记忆犹新地想起,这些事态发展是有限的,受到严格控制的。温和的自由主义(象在卡达尔政权统治下的匈牙利)受到容忍,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所实行的压制性的民族共产主义也受到容忍。即使这样,从东欧内部似乎不大可能向自由化或独立进一步发展。正如夏皮罗教授所指出,朝着自由的方向发展得太过分(象苏联人对一九六八年杜布切克政府的行动所解释的那种)或者试图与华约决裂的决心太大(象一九五六年纳吉政府做的那样),都肯定会遭到苏联坦克的镇压。

当然,西欧“欧洲共产主义”的存在引起了东欧的某些初步的、含糊的反应。罗马尼亚党一直是最坦率地为西方这些党提出的不受莫斯科支配的要求进行辩护的。^⑩波兰和匈牙利在其宣传中对“欧洲共产主义”表示了谨慎的同情。而捷克

人和保加利亚人则完全相反，他们带头谴责“欧洲共产主义”。保加利亚党的领袖日夫科夫在《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月刊上发表了一篇直言不讳的谴责文章：

所谓“欧洲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暴露了反革命分子的愿望：他们想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兄弟党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之间筑起一道墙……这（“欧洲共产主义”）是现在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进行意识形态颠覆活动的主要方面之一。^①

在东欧对“欧洲共产主义”所作的各种反应中，日夫科夫的反应大概要比齐奥塞斯库的反应更富有内容。总的来说，东欧这些政权是支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这种“感染”受到了严密的隔离。

造成这种顺从苏联愿望的原因，不仅是由于苏联军事存在和威胁这一特点，而且是由于东欧集团国家在经济上对莫斯科的依赖。这也是东欧执政的共产党本身的性质所造成的。由于它们在本国只拥有自己的小小的独立基地，因此至少从

一九六八年起，它们已成为苏联和东欧现有舆论渠道之间的媒介了。它们实际上是一种更为拙劣的、代表性更小的现代贝当主义。因此，据克里格尔教授说，苏联没有理由担心任何来自（东欧）共产党本身的要求变革的倡议，因为如果东欧社会（比如波兰）出现要求变革的压力的话，那么它是挡也挡不住的。当然，正如夏皮罗教授指出的那样，这些欧洲党的各种不同的论调可能影响东欧人，可能对人民抵制中心有帮助，不过无党派团体按照自己的主张行事的能力是有限的。此外，东欧的政权严格地限制（可以预计在将来也会继续这样做）新闻界报道罗马、马德里和巴黎的言论。

再者，关于民主价值和结构的“感染力”——从西欧传到东欧——即使在沒有苏联的控制之下是否会产生持久的影响，这也是大可辩论的。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外，沒有任何东欧国家有丰富、悠久的民主传统。共产党执政三十年左右，并没有使建立一个民主政治制度变得容易些。欧洲共产党领袖指出，只有尊重民主传统，他们自己的西方国家才有可能发生政治变革。乔治·纳波利塔诺在一篇典型的文章中提到了他自己国家

的政治传统。他说，意大利“是一个高度协调的文明社会，……有丰富的、独立存在的、各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的压力和主张”。^⑫这可能是指西方所理解的那种自由。这种概念的逻辑若应用于东欧就将减色。在东欧，它肯定会有效地控制“感染”——通过共产党人所说的“历史条件”来加以限制。不管东欧共产党政府或苏联的力量有多大，东欧和西欧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传统仍有相当大的区别。这对民主发展是有影响的。

共产党和西方防务

不能认为欧洲党是西方防务的坚决的或可靠的支持者。首先，他们几乎很少有迹象表明愿意接受这种看法：苏联谋求建立对欧洲大陆的霸权，并想使用或可能使用武力来达到这个目标。对他们来说，苏联和社会主义集团毕竟是争取“和平”的力量，只有美国和西方帝国主义才基本上是侵略性的。例如，意共、法共和西共领导人在多次接见记者时避免正式表示说苏联可能谋求控制这个大陆，他们也不对日益加强的苏联军事力量表示任何不安。

当记者问到一旦北约和华约发生冲突，一个受意共控制的政府将采取什么行动时，意共领导人一再拒绝表态。同意共国际关系局局长巴叶塔的一次谈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问：假如军事危机取代了缓和，该怎么办呢？

答：我们支持谈判。我们始终谋求防止发生冲突。

问：但如果战争爆发呢？

答：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不卷入。

问：如果它卷入呢？

答：我希望意大利有力量避免这种情况。

问：如果东方进攻西方呢？

答：但这不是真实的考虑、不是事实。

问：假如意大利是华约进攻的目标呢？

答：为什么它会遭到进攻？我不接受这种假设……^⑬

卡里略也同样含糊其词。他曾说：

北约是根据苏联可能进攻这一点来作为它存在的根据的……但是，二十多年来，苏

联并没有搞任何侵略，而且事实证实了华约的性质根本上是防御性的。北约正在变成一个官僚军事超级结构，以寻求达到证明自己合理存在的目标。归根结蒂，它仍首先是美国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控制欧洲的一个工具。⑭

因此，欧洲党对北约的态度一般来说要比他们对欧洲共同体的态度更加敌对一些。它们认为欧洲一体化对国内来说是有益的，并提供了建设区域性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而同北约（特别是在美国领导之下的北约）发生联系则几乎提供不了什么好处。

当然，从历史上来看，欧洲这些党一直是坚决地反对北约的。就在一九七二年，贝林格还支持他所说的“对大西洋条约的斗争”，并要求意大利摆脱“对北约的依附”。⑮法共也一贯反对这个联盟，（甚至在一九七六年）还要求法国退出联盟的政治机构——尽管措词谨慎：“法国必须表示它决心在一切情况下执行独立的政策，从而使自己脱离大西洋集团。”⑯法国共产党在推行其独立的战略时巧妙地利用了极端的戴高乐派民

族主义情绪和言论。英国共产党也附和了所有北约成员国共产党以及（偶尔也有）苏联共产党的传统政策，它说：“英国应该退出北约，努力争取通过协商一致解散北约和华约，代之以全欧洲安全体系。”^⑮

近来，南欧一些主要共产党似乎改变了主意。意大利共产党将“不提意大利退出大西洋条约的问题了”，并“反对任何其它国家单方面退出这个或那个集团的做法”。^⑯意共领导在一九七六年竞选运动期间甚至走得更远，讲了些引起大家兴趣的话，意思是说：北约是一个盾牌，意共在这个盾牌的掩护下可以确保其独立自主，而不受莫斯科控制。^⑰虽然法共在制定共同纲领的谈判期间建议法国退出北约，但它最后也接受在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词的提法。法共以后曾提出，它将准备参加一个不打算退出这个联盟的政府。一九七七年五月，法共还一致放弃其一贯反对法国建立核威慑力量的做法。卡里略说，他将同意美国在西班牙继续保持基地，^⑱而且暗示，一旦西班牙议会投票赞成加入北约，西共将不组织任何重大活动来反对它。正如马歇特所报道的，甚至库尼亚尔也不正式反对葡萄牙目前仍作联盟成

员国。

虽然如此，这些欧洲党对北约的政策仍是模棱两可，值得人们去研究。意共领导支持意大利在一个以莫斯科进行威胁的概念为基础的联盟中作北约成员国，但不能设想俄国人会入侵。共产党人说，华约完全是防御性的，苏联是一支维护和平的力量，但他们又在不同的程度上愿意支持一个持相反看法的联盟。他们认为美国是侵略性的帝国主义，但这些共产党领导人却可以设想参加在美国领导下的联盟；这些欧洲党抵制反苏主义，但却接受反苏的联盟。

这种模棱两可的做法可能适合于这些南欧共产党，因为它们处于困难的政治局势。这种态度使它们能够在国内舆论（仍支持北约）、它们自己的斯大林主义斗士（反对参加北约）和苏联领导集团三者之间维持下去。

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也是建立联合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七十年代初，由于这种态度，法共在试图同法国社会党达成一项一致的关于共同纲领的声明时采取了非常必要的灵活作法。法共说：“政府将明确表示决心使国家摆脱任何政治军事集团。将本着这种精神来解决由于参加大西

洋联盟而使法国承担义务所造成的问题。”这样，密特朗就可以说，他已劝说法共接受法国暂时作为北约成员国；而法共也可以根据政治局势的需要自由地确定其对北约的政策。无论如何，法共目前对北约的模棱两可的政策表明了他们在表面上已放弃以往的公开敌对态度。

为什么有这种变化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出于竞选和策略上的需要。退出北约的做法在欧洲选民中是不得人心的。当共产党接近执政时，这种反北约的形象就会成为竞选中的一个障碍，他们也许感到必须加以消除。事实上，一九七六年竞选运动期间第一次出现表明意共对北约采取和解态度的迹象，而过去它在这个问题上则持沉默态度，这并不是一种巧合。法共也正是在制定共同纲领阶段，当竞选的考虑放在首位时，才修改其对北约的立场的。但西共就没有必要修改其对北约立场，因为它支持维持现状并不引起选民的不满。而英共则可以采取拒绝立场，因为它对选票的利害关系不大。它的战略目的是要渗入劳工运动中去，而劳工运动对北约和对美国在英国的核基地是极为反感的。

另一部分原因也许是这些共产党在制定一种

战略：使他们自己参加现有的机构，以便从内部来改变它们——他们对欧洲一体化机构就是这样做的。贝林格坚持认为：应该以“动”的观点、不应以“静”的观点来看待北约问题，而在“冷战”期间这种“静”的观点决定了人们的态度。他在下面两段很能说明问题的引语中概述了意共的这种渐进方针，同时还暗示暂时在北约内工作比退出北约可能更有利于反美斗争。他说：“人们可以设想：我们退出北约要有一个过程，分若干阶段逐步脱离。”^{②①} 他还说：

摆脱使我们国家同北约联系在一起的从属地位这个决定性问题不能归结为只是简单地声明赞成或反对这个军事条约。反对大西洋条约的斗争越是同欧洲摆脱美国霸权这一总的解放运动协调一致，同逐渐胜对立的集团、并进而取消它们协调一致，那么这种斗争就越有效。^{②②}

因此，北约将被用来达到更普遍的全欧目的。

意共领导人透露的对北约的想法看来比其他欧洲共产党人要多。意共主动谈了它之所以改变

对联盟的政策的其他两个原因。第一，贝林格说，北约可以充当合适的盾牌，意共可以借此保护其自主权，不受莫斯科的侵犯，他说这番话也许是真诚的。的确，可以想象，如果意共要继续对莫斯科保持其独立性的话，那么参加北约也许更富有吸引力——特别是如果克里姆林宫对铁托死后的南斯拉夫施加压力的话。虽然如此，如果要把北约作为共产党之间争端中的一种武器，那么这对联盟来说是一个完全新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将根本改变其性质，联盟其他成员国很可能难于支持这种作用。

第二，意共领导人认为，^{②③}如果意大利退出北约，那就会打乱东西方之间在欧洲的军事平衡。意共对军事平衡的这种关注是件新鲜事，也是同意共经常表示的下述信念相矛盾的：不必害怕苏联的军事力量，因为苏联没有任何侵略意图。对军事平衡的这种兴趣并不能长期保证意大利继续作为北约成员国，因为对军事力量的判断和估计是可以改变的。在这方面使人感兴趣的含义也许是，如果北约充分地增强其军事力量，那么一个共产党执政的意大利将认为可以退出北约。反过来说，意共也可以改变其决定，用其他借口

留在联盟内。例如，可以根据这样的理由：它设法按照民主的方向来改变联盟，但联盟仍处于“德国和美国的领导”下，或者，意大利政府希望控制北约在意大利的设施，但遭到拒绝。

共产党关于北约的一些声明是自相矛盾的；共产党关于联盟的论调是极其站不住脚的。只要西欧共产党在一般的西方问题上继续声称持一种反帝（意思是反美和反德）思想体系，主张在集团之间奉行中立主义，并坚持以发展观点对联盟进行分析，那么它们对北约承担的长期和中期义务就仍值得怀疑。

从西方观点来看，仍存在一个问题：如果共产党在法国和意大利参政，这会削弱北约吗？如果意大利和法国在共产党的推动下退出北约，那么北约就将基本上成为一个北美—北欧防务条约，并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美国和西德的协议。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提出：“这个幽灵可能被其他西欧国家利用来破坏还残存的大西洋团结。”^②同样重要的将是心理上的打击。人们将认为北约受到严重削弱，反苏决心也将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北约中剩下的欧洲国家，包括西德在内，可能认为势在必行的是，谋求分别同苏联

订协议，以减小对它们安全的打击。

更加可能的是，这些共产党在当权以后，不会立即要求退出联盟。即使共产党政府（或者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宣布忠于北约，那它也同样会构成严重的安全问题，至少对北约核计划小组是如此。关于美国基地的前途也会出现令人讨厌的问号；可以很容易地把核基地问题同一般支持联盟的做法分开来，挪威和丹麦就是这样做的。“共产党北约国家”还有削减防务预算的倾向：那些不认为苏联有侵略意图的国家是不大可能把防务开支保持在那些持相反看法的国家的水平上的。美国可以对一个西欧共产党政府施加压力，要它保持原来的防务开支水平，但是这种压力将是微小的。

更深一层，北约将第一次在其各理事会内有这样一些成员国，它们公开宣布的目的是要解散北约和华约，撤除欧洲领土上的一切外国基地，并召开全欧安全会议来解决冲突。这也正是苏联对欧洲的政策。由于欧洲成员国之间在欧洲政策的这些根本问题上有分歧，因此，联盟的政治团结肯定要受到影响。此外，美国舆论界和上层社会将感到难以理解这种必要性：在一项防务条约

的范围内支持一些共产党国家反对另一些共产党国家。正如基辛格所说：这样一来，“联盟的性质将使美国人民感到迷惑不解。”^{②⑤}往好处说，这可能使美国的决心减少，往坏处说，这可能使美国由于对欧洲的政局失望而日益奉行孤立主义。美国舆论大概宁愿支持一个缩小了的北约，也不愿支持一个有共产党政府参加的北约。因此，共产党参加北约国家政府的结果很可能使联盟遭到也许是致命的双重分裂：首先是北欧和南欧成员国之间的分裂，其次是西欧和美国之间的分裂。

联盟内的这种分裂倾向将使这个国际体系不稳定，并使和平受到威胁。

如果美国越来越疏远欧洲，特别是如果这导致美国撤走它的军队或使它在其他方面减少其决心的话，那就会造成一个权力真空。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尽管一贯持谨慎态度，也可能卷进这个真空。另一种可能是，北约中剩下的非共产党成员国，其中包括法国，在绝望的情况下可能企图恢复五十年代流产的西欧防务条约（这一次将包括一个用核武器武装起来的西德）。苏联几乎肯定会认为这种行动是挑衅性的。

在欧洲以外的一些问题上，这些欧洲党明显地持反西方态度。其中大多数党采取的并非是中立立场，它们在非洲、中东和亚洲的冲突问题上的表态是同苏联政策相呼应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同中国的争端中它们站在苏联一边。它们甚至拒绝同中国人保持关系。它们认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的对外政策则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种政策反对苏联，分裂反帝阵线。中国支持象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这样一些组织的做法受到欧洲党的批评，中国的欧洲政策也受到它们的批评。卡里略和西共执委会其他四名委员于一九七一年同中国人恢复了关系，西共是在中苏分裂达到高潮时同中国人断绝关系的。不过，卡里略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给苏联一点颜色看，而不是接受毛主义政策”。

还有一件事表明莫斯科和这些欧洲党之间是一致的，即在苏联一九七七年秋天改变态度，不支持索马里之后，这些党也马上支持埃塞俄比亚。欧洲一些大党很快对苏联亦步亦趋。^{②⑥}再者，这些欧洲党一直是紧密地同苏联一起努力促使“西方帝国主义”瓦解，其中多数党仍在这样做，大搞宣传运动，帮助训练非西方世界的“反帝力

量”。②⑦

最后，西欧这些共产党通过有选择地批评苏联在国内的所做所为以及拒绝苏联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一概念，已为自己确立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和民族独立。但迄今为止，它们很少运用这种独立。它们对欧洲和对北约采取的一些不明确的政策是十分模棱两可的，因而不会使苏联感到不安。无论如何，这些政策应该结合下述情况来看：它们全面支持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苏联同中国的争执中它们支持苏联，在欧洲以外的东西方冲突中支持苏联。

鉴于这些欧洲党到目前为止的情况，很难认为它们是对苏联全球政策或利益的一个威胁——要么是一个萌芽中的“中国”（一个反苏的共产党政权），要么是一个潜在的真正“中立”的集团，要么是另一种可能，即是一支十分关心在全世界捍卫西方利益的新政治力量。

苏联的反应

这样看来，莫斯科对“欧洲共产主义”的反应比较克制，就不使人感到意外了。苏共对“欧洲共产主义”党对苏联在国内的所作所为的批评的反

应只限于口头反击——常常是泛泛的、不指名的，不具体批评任何一个党。苏联人不象对待中国人那样，到目前为止，苏联人没有宣布任何一个西欧共产党是反社会主义、反工人阶级的，也没有要把任何一个西欧共产党赶出共产党国际会议，从而把它革出教门。苏联人也没有试图用其它手段——中断提供资金或试图使它们分裂并另立新党——来直接削弱任何一个西欧共产党。相反，据认为，克里姆林宫还谋求在经济上加强这些党的力量。凡是发生分裂的党——如象西共和英共内部的分裂——看来都是当地心怀不满的集团（通常是顽固不化的斯大林主义分子）挑起的，而不是苏联直接干预和鼓动的结果。甚至在西共内部于六十年代末期出现利斯特尔派的时候，莫斯科没有完全支持它，该派同西共分裂以后也未能取得苏联无条件的全力支持。

当然，苏联人不得不小心从事。企图在领导人同好斗分子之间制造分裂——就象西班牙最近发生的情况——可能会产生反作用。此外，任何另立新党的企图只能使共产党的力量分裂，从根本上削弱亲苏的共产党。停止提供资金也将产生同样的后果。因此，苏联对“欧洲共产主义”的

反应仍停留在口头上。

然而，西欧的几个主要共产党受到了苏联的严厉批评。这种批评通常是针对苏联认为这些共产党毫无道理地干涉了它的内部事务。例如，一九七七年一月，苏联的《新时代》周刊登载一篇文章，专门点名批评法共研究中心副主任让—爱伦斯坦。爱伦斯坦写了一部四卷苏联历史著作，他严厉地批评了斯大林主义，他的批评走得很远，甚至暗示，斯大林主义的根子在列宁主义。他还说，在苏联，自由早在一九二二年就不存在了，他责备法共迟迟不批评苏联缺乏自由的现象。苏联谴责爱伦斯坦的行为“同一个自称是共产党人的身份完全不相称”。在圣地亚哥·卡里略的《“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书发表以后，苏联对他的抨击甚至更严厉，意义也更重大。卡里略的主要异端邪说不是他主张在西班牙实行民主与自由，而是他猛烈地抨击了苏联政权，特别是他认为，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尖锐的反驳是具体地针对卡里略个人的。苏联说他蓄意反苏：其目的在于使西欧共产党脱离苏联，为阶级敌人效劳。^②

意共对同苏联人的关系的态度比较巧妙，这

使它受到的反击少一些。同时，意共谨慎地从不表示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意共国际问题主要发言人姜卡路·巴叶塔甚至批评卡里略提出这种异端邪说。意共虽然不对苏联社会的社会主义基础表示怀疑，但它仍不同意苏联对待某些持不同政见者的态度，也不同意如象华约集团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类的具体行动。

伦纳德·夏皮罗指出，苏联人对于批评苏联的生活很敏感，相形之下，莫斯科对欧洲共产党主张在它们本国的社会里实行自由与多元论的态度倒比较随和。西欧共产党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不再以此为其目标，它们并普遍表示支持人权，莫斯科对此没有公开表示异议。一九七七年三月“马德里最高级会议”发表的公报对于“资产阶级自由”问题的态度是直率的。它公开拥护多元论、拥护思想和宗教信仰自由，这显然使莫斯科感到不安。即使如此，它也没有公开谴责公报中有关自由问题的段落。《真理报》在迟迟到三月七日刊登公报时删去了有关的段落。夏皮罗指出，苏联人可能并没有认真对待西欧共产党的这些言论，因为他们还记得，他们自己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前也表示过支持民主和多元论，东欧共产

党领导人在第二次大战以后、苏联控制东欧以前也说过同样的话。

“多中心论”和走向社会主义的“本国道路”在莫斯科仍然是一个敏感的问题，特别因为它们与常说的苏联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论是背道而驰的。尽管如此，欧洲共产党继续坚持它们独立于任何“指挥中心”。但是即使在这个问题上，苏联领导集团也显出某种克制的迹象。米哈伊尔·苏斯洛夫是苏联头号理论家、最高级的政治局的委员，他在六十年代初领导苏联对北京的民族主义倾向展开论战。他指责主张“本国”式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是“机会主义”。塔斯社在报道他的讲话时用了这些话，而第二天《真理报》却把它们删去了。^②这种变化可能反映苏联内部对于攻击本国道路这付灵丹妙药是否明智有某种形式的争论。但是，夏皮罗教授指出，人们很难认为一些西方学者的猜测是可信的，他们猜测，苏联领导人在“欧洲共产主义”问题上意见不合、甚至意见纷纭。虽然苏联的专家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稍有不同，但是苏共国际部却反映了政治局的统一的政策。

虽然莫斯科显然常常对“欧洲共产主义”党

感到不快，但它仍设法使这些党接受它的总战略。苏联领导人——至少从历史上看——不认为欧洲共产党向政权挺进始终是它当务之急的战略任务。苏联的政策毕竟是在国家对国家和党对党这两个方面贯彻的，莫斯科力求把这两方面的手段结合起来以取得最大的效果。

例如，莫斯科可能同一个由于共产党在国内进展神速而地位岌岌可危的政府建立值得欢迎的关系。又例如，苏联在法国就要举行选举的前夕支持戴高乐及其继承人，这常常使法共领导集团又气又恼。法共批评苏联把它认为苏联在缓和方面的利益置于法国共产党的利益之上。这一批评是马歇在一九七六年的柏林会议上提出来的，他在会上说：“然而，我们不能接受以和平共处名义采取的、违背我们正在开展的反对大企业权势、争取民主与社会主义斗争的利益的措施。”^③此外，当地共产党出于它们自己的原因可能要采取某些诸如罢工之类的政治策略，而这种策略可能不合苏联总政策的要求。

此外，使当地共产党力量壮大是否是使“力量对比”改变得不利于西方的最好手段，这一点并不清楚。这种改变可能是苏联直接对非共产主

义政党和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们作出（有利于苏联的）变革促成的——这是让一弗朗索瓦·勒韦尔所谓的“极权主义诱惑”的一个方面。实际上，一个驯服的、非正式的“共产党”政权比一个可能作梗的共产党政权更可取。

总之，从苏联的观点看，苏联对欧洲的影响不能完全以欧洲各国共产党的力量来衡量；苏联人由于在国家对国家与党对党两个方面开展活动，他们常常给欧洲共产党带来一些问题。例如，莫斯科不赞成法共与社会党人商定的一九七二年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被废除以后，它竭力为法共辩护（一九七七年十月二日《真理报》）。莫斯科最初对意大利的历史性妥协似乎不那么热情。它可能认为，共产党参加一个西方政府的时机当时还不成熟。莫斯科可能担心，一个北约国家中的变化过于突然可能破坏缓和。

然而，苏联有种种迹象表明，它认为，在共产主义运动的范围内由各国共产党出面最能促进它在欧洲的利益。苏联的理论家继续坚持这一点。实际情况是：欧洲共产党尽管同莫斯科有分歧，但是它们不可能象非共产主义政党那样拥有许多潜在的反对中心，来反对“芬兰化”或苏联

在欧洲的力量。莫斯科为什么对姐妹党的政策的细微差别显得如此感兴趣，其主要原因就在这里。苏联为什么不试图破坏或削弱西欧共产党，其原因也在这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现阶段，只要莫斯科大肆吹捧一通就可以做到这一点。^{③①}

苏联影响的来源

苏联对西欧共产党的挑战的反应是克制的，相形之下，莫斯科对于对中心的权威提出异议的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其他外国成员的反应则不那么克制了。当然，莫斯科在共产党之间的争端中可以威胁使用一系列制裁手段。它可以决定中止正式接触和互换兄弟代表团。它可以使欧洲共产党失去这个最强大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道义上和财政上的支持。它甚至可以试图在欧洲共产党内部制造分裂，建立为它的一切需要忠实效劳的新共产党。然而，它并没有在欧洲共产党中间采用这些做法。莫斯科显然认为，西欧的形势还没有严重到值得采取这样激烈的行动。苏联领导集团还有别的办法来影响不听摆布的伙伴的方向。

苏联可以左右欧洲共产党领导集团的方向的

一个影响的源泉是，欧洲共产党基层党员大多数继续亲苏。每个欧洲共产党都有一部分顽固不化的斯大林主义分子（通常是老党员）和现代亲俄分子。例如，法共有一大批亲俄的积极分子，意共也是如此。几个大党——特别是意大利党和法国党——每年组织人们到苏联和东方集团国家去休假和调查研究，这些访问的一部分费用是数以千计的党的积极分子和普通工人出的钱。

这些访问有助于加强党的普通工作人员同苏联的关系，实际上，组织此类访问的目的在于使党的信徒更加钦佩苏联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西欧共产党内的亲苏情绪不大可能随着老一代被取而代之而消失。苏联对欧洲共产党好斗分子的亲苏情绪能够利用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不清楚，也无法估量。它依然是苏联得以继续发挥影响的一个源泉，这是不成问题的。^③但是莫斯科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利用这种善意——实际上是忠诚——来对一个不愿俯首贴耳的党的领导集团在党内制造政治麻烦。

对大多数欧洲共产党来说，苏联及其东欧盟国也是资金的一个来源。虽然不能断定这种支持究竟有多大规模，也不能断定欧洲共产党在多大

程度上依赖这种支持，但是看来支持是很可观的。尽管大党现在得到国内的许多支持——包括它们政府的补贴，可是，一旦苏联人取消补贴，欧洲共产党将遇到严重的困难。然而，实际上，莫斯科看来不会干这种事。不过夏皮罗教授指出，在举行马德里最高级会议的时候，苏联人可能已经威胁要取消补助了。

看来，这些大党目前在经济上对苏联的依赖程度不象它们弱小的时候那样大了。现在它们看来从忠心耿耿、遵守纪律的党员、党拥有的许多“资本主义”企业以及它们控制的市政府等方面得到了大量的资金。它们似乎还从希望向苏联和东欧出售商品的西方公司之间的商业安排中捞到了好处。想出售商品的西方人士必须通过收取佣金的中间人才能成交，而中间人得到的佣金，后来转到了党的手里。^③

然而，欧洲共产党看来也直接得到苏联和东欧的大量支持，这些资金是通过什么途径提供的，数目有多少，这当然是严格保密的。然而，偶尔也露出一些颇为惊人的蛛丝马迹——例如，蒙塔尔多对葡共同巴黎一家苏联银行的关系及对该银行的依赖所作的分析以及哈罗德·威尔逊和

亨利·基辛格所说的话，他们说，苏联在一年內给了葡萄牙共产党五千万至一亿美元。莫斯科允许欧洲共产党从西方同苏联集团的贸易中收取佣金，从而使它对主要的欧洲共产党的支持增多了。

苏联人可以用来影响西欧共产党方向的另一个杠杆是：如果这些共产党上台，它们十之八九要依靠苏联。不管它们是单独执政还是联合执政，反对它们统治的力量必然会很大，特别是如果它们“改造”社会的行动太快的话。共产党政府因为担心在将来的选举中被赶下台而可能会加强它们对社会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它们面对怀有敌意的本国公众和西欧非共产党国家，唯一支持它们的主要力量将是苏联集团。如果它们要巩固政权，它们须要有财力、物力，甚至还可能需要苏联以军事干涉相威胁来支撑它们。正象已经指出的，如果它们在国际收支方面发生问题——货币疲软，资金外流的话，西方金融界不提出经济和政治附加条件（而这些条件是共产党人无法接受的），他们是不大会愿意提供援助和进行贸易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执政的共产党还是可能宁愿转向东方。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继

续采取友好的态度对当地共产党人极为重要。实际上，苏联将能够决定一个当地共产党能否保住政权，能否克服困难。

苏联对举足轻重的欧洲共产党人施加影响的另一个可能的手段是讹诈，特别是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上活跃的那些人。夏皮罗教授指出，苏共国际部在各个驻外使馆都派有代表，他们从事秘密活动和搜集情报的活动。他注意到，有人猜测，莫斯科掌握着他所谓的马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可疑纪录”的有损其声誉的证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苏联和共产党过去的做法表明，莫斯科不会有了证据而不使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国共产党人运用这种手法获得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声名狼藉的非共产党官员和商人的合作。他们是在法国解放时从没收的警察局档案中得到这种情报的。^⑭此外，美国专栏作家维克托·里塞尔曾认为，葡共利用在一九七四年政变中得到的警察局的档案材料来对当时的劳工部长科斯塔·马丁进行讹诈，因而在马丁任职期间，葡共加强了它对劳工运动的影响。^⑮

最后，莫斯科还可能已经在欧洲共产党内发

展了它自己直接控制的组织或“机构”。无须说，关于这类活动的情报是搞不到的。然而，苏联人过去确实曾在外国共产党中扶植过他们自己信任的人，成功地窜改了某些党的方向，甚至使它们的领导也更换了。毫无疑问，克格勃和苏共国际部的驻欧洲代表显出继续对这些问题很关切；但是，不幸的是，他们可以而且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这几种“影响渠道”来操纵西欧共产党，则不得而知。

国际有利条件对比

欧洲共产党**普遍**支持莫斯科，它们对北约和欧洲统一的公开态度很暧昧，苏联领导集团仍然掌握着可以对它们施加影响的手段，从这些方面看，苏联认为这些党的发展壮大对于它为促使世界力量对比进一步发生有利于它的变化而作的努力是完全有利的，这种看法不能说是言过其实的。实际上，苏联并不想同其西欧盟友决裂，实际上倒是常常赞扬它们对这种努力作出了全面的贡献。此外，如果说欧洲共产党对莫斯科的批评有助于它们在本国的社会中增强自己的感召力的话，那么，克里姆林宫倒真有可能从它们对莫斯

科构成的公开挑战中有所得益。

欧洲共产党力量增长能够对未来欧洲的力量对比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最引人注目的是，它能帮助做到苏联人在过去三十年中做不到的事情——那就是，不用发动战争就使西欧摆脱美国。而且执政的欧洲共产党能够帮助防止出现一个对苏联怀有敌意的、统一的欧洲。共产党人参加欧洲共同体实际上将使西欧分裂。意大利或法国、或两国政府中的共产党人能够为南北分裂作好准备。这将对北约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如果共产党人在政府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但北约的效率、而且它的团结也将受到威胁，美国将被迫不让共产党的北约国家得到各种敏感的情报——在葡共于一九七五年加入里斯本政府以后，葡萄牙再得不到这种情报，便是一例。此外，一旦东西方发生冲突，北约的共产党国家将被视为不那么可靠的盟友，尽管口头上不这么讲。这将进一步削弱北约的效率（和威慑价值）。正象已经说过的那样，北约的特性将遭到损害，美国和西欧非共产党国家的舆论将开始对于把在重要的政治主张上同苏联持一致看法的政府包括在内的反苏联盟的价值产生怀疑。坦率地说，很难想象，美国、英国或

西德的納稅人竟愿意为他们的孩子出钱来保护贝林格和卡里略不受苏联坦克的蹂躪！

欧洲大陆的政治均势将遭到破坏。西欧将出现共产党政府，但是在东欧却不会出现亲西方的政府。欧洲共同体将遭到破坏，但是经互会却不会。北约将遭到削弱，而华约则不会。更重要的是，苏联将必然以无可争议的大强国身份——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出现于欧洲大陆。

不管西欧共产党的愿望是什么，这种进程的结果可能是造成一种苏联力量势必增长的心理，这种心理可能导致西欧各国谋求分别同苏联解决问题，这将成为西欧大陆日益发展的“芬兰化”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对美国继续对西欧承担义务产生疑问，在美国本身也将产生疑问。

此外，共产党参加政府可能会增强苏联从西欧得到贷款和技术的能力，这还可能减轻欧洲人的反苏情绪，使苏联显得不那么令人望而生畏，而是比较可敬；这还会使欧洲共产党大大加强苏联集团在第三世界和国际讲坛上的影响。

最后，欧洲共产党力量壮大可能给莫斯科在西欧提供又一笔政治—军事财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大战结束以后的初期之间，苏联操纵

欧洲共产党及后者控制的主要的非政府组织的能力虽然有很大不同，但是欧洲共产党可能还是愿意支持苏联的政治—军事目标的。

虽然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无法断定这些党进行间谍、破坏和其它秘密活动的的能力，但是鲁伊·马歇特指出，至少葡萄牙共产党仍能在地下顺利地开展活动。此外，由于控制大量的财源和机构——如象市政机构和有组织的劳工的主要部分，这使欧洲共产党掌握重要的手段，可以在政局不稳定或发生战争情况下左右国际力量对比。

然而，欧洲共产党力量壮大或它们加入政府，对苏联人来说也有风险。首先，它们可能变为急需财政、或许还急需军事支持的“很棘手的附庸”。可是只要它们拒绝站在中国人一边，只要它们不自搞一套——就象南斯拉夫那样，莫斯科是不会不愿意支持各国这样的共产政权和共产党的。苏联大力支持古巴和越南就是先例。虽然提供支持常常可能要花不少钱，但是莫斯科愿意出这笔代价——特别是对那些据有重要战略地位的盟国。

第二，苏联领导人可能不想破坏缓和。毫无疑问，莫斯科不希望由于北约被**引人注目地**搅得

不得安宁而使美国与其它北约成员国惊慌失措，而一个欧洲大共产党过早掌权就会引起这种后果。因此，苏联人可能正试图使他们的欧洲盟友放慢进展的速度，特别在法国和意大利，以免危及缓和或导致西方国家作出反苏反应。法国重新回到北约组织或美国和西欧防务开支迅速增加可能构成这种反应的一部分。然而，就目前所知，莫斯科不反对葡共参加政府——虽然它在葡共于一九七五年发动堪称“政变”的行动时可能曾提醒葡共克制。意大利政府一九七八年一月发生危机时，莫斯科批评卡特政府公开反对意共进入政府，并通过苏联报纸的宣传主张意共参加政府。因此，在它认为合适的条件下，莫斯科不反对共产党力量壮大并控制政府。

“欧洲共产主义”党影响增长给苏联带来的第三个问题是它们的影响有“传染”给东欧与苏联的危险。正象已经指出的那样，看来莫斯科对欧洲共产党批评苏联的制度特别敏感。当然，欧洲共产党人批评苏联所产生的影响比西方的非共产主义政党批评苏联所产生的影响大，尤其是在这些批评传布到苏联集团的时候。然而，正象夏皮罗和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苏联和共产党政府

不是靠思想的作用来统治东欧的。有朝一日莫斯科断定欧洲共产党的批评所产生的不利影响超过了它们对促进苏联外交政策的目标所作的贡献，这就可能促成关系破裂。看来莫斯科现在还能够而且愿意冒这种风险。

欧洲共产党可能对苏联构成的最严重的威胁是：它们会共同设法动员西欧大陆的力量，并同欧洲其他国家、美国和中国结成同盟，或同美国和中国结盟。如果出现这种事态发展，那将对苏联构成无比严重的威胁，因为这将必然导致出现一个统一的西欧，它将比今天更反苏，更有能力在斗争中施加巨大的经济、甚至军事压力——这场斗争由于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反苏分子的思想力量而变得更加可怕。人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极其小的，但它大概说明了苏联为什么担心出现一个统一的欧洲——即使它可能是“社会主义的”。^{③④}使克里姆林宫感到不安的大概不是一个中立的、“社会主义的”欧洲（这将完全是它在国际上的一大胜利），而是一个能够真正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团结起来的、能够同如象美国或中国这样的巨大力量中心结盟的统一的、“社会主义的”（或者说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欧洲。

莫斯科肯定希望避免这样的危险：出现控制着欧洲大陆大部分熟练劳动力和财力物力的、能够同工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极左翼在政府中结为盟友的、吸引东欧共产党并同美国和中国人结盟的真正独立的共产党。然而，这种可能性也是极小的，从近期和中期来看，十之八九不可能实现。欧洲共产党除了都主张独立于莫斯科以外，在其它任何反苏问题上都远不是一致的。很难想象这些民族主义党能够把它们的力量团结起来、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做交易并得到美国的合作。大有可能的是，如果共产党统治南欧国家，那将使西欧极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即便不导致战争，也将使欧洲大陆“芬兰化”。

从美国（和非共产党的欧洲国家）的角度来看，欧洲共产党的变化是令人感兴趣的。如果它们继续向民主的方向演变，改变性质，接受民主协议，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全世界同苏联的对外政策脱离关系，那么，它们对西方来说当然是一笔重要的财富。它们以及它们所控制的重要的非政府机构将对解决欧洲及大西洋两岸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发挥作用。只要消除在政府中起主要作用的亲苏势力现在对大西洋联盟构成的威胁，它们

还可能加强西方的防务努力。西欧共产党多半不会这样演变，但是万一出现这种情况，它们可能会分裂。如果发生一系列这种分裂，那就可能为左翼造成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新政治天地，比较小的亲莫斯科派系将再一次处于欧洲政治舞台的边缘，党的主要机构的力量、组织和活力将被欧洲的民主左翼所掌握。

然而，正如本书所指出，欧洲共产党的演变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虽然它们的意识形态、对内政策的联盟格局有些变化，就西班牙共产党来说，它对于“民主集中制”的看法可能有所改变，但是这些情况并不能使人得出下述结论：欧洲共产党已经变为同欧洲“其它政党一样”的党，真正置身于民主秩序并谋求予以改善。此外，如果它们保持意识形态上的类似之处并照旧推行它们的对外政策的话，那么，它们仍然只是完全对苏联有利。虽然利用已经发生的变化并通过巧妙的外交活动使它们进一步同苏联分裂是有可能的，但它们的发展壮大对西方来说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不利因素。欧洲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从长远看对西方来说只能是一个重大的挫折。

注 解

序 言

① 戴·欧文博士，《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纪念休·安德森的讲话，1977年11月18日，伦敦，剑桥大学同学会，1977年。

②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乔治城大学的国际劳工计划协助工会和教育机构组织国际事务计划。为此目的，它同美国与国外的工会、劳工中心、大学和其它教育组织合作。

全国战略情报中心是为贯彻国际安全事务教育计划而组织的一个非党派的机构，它在纽约和华盛顿设有办事处，它鼓励了解战略和防务问题，其理由是，在民主国家中，通晓情况的舆论是保证西方防务体系富有生命力所必不可少的。

第一章 西欧共产党的实力

① 这些党包括西德的自由民主党、英国的自由党和法国“勒卡尼埃”中心所属的各支力量。

“社会党国际”是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国际组织。

② 《欧洲政党的大家庭》，1977年12月31日《经济学家》，第56页。

③ 这些估计以下述设想为根据，即：根据人口多少，西班牙将新分得五十三席，葡萄牙新分得二十席，而根据西共和葡共

在它们国内最近选举中所得选票的百分比来分配，西班牙的议席中有五席将为西共所得，葡萄牙的议席有三席为葡共所得。

④ 这些数字包括一九七八年三月法国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的结果。第一轮投票结果比第二轮更能说明一个政党得到的真正支持，因为在第二轮投票中，有些候选人退出竞选以支持他人。

⑤ 乔治·乌尔班：《与阿尔蒂埃罗·斯皮内利的一次谈话——又是欧洲共产主义》，1978年1月号《文汇》月刊，第8页。在这次谈话中，斯皮内利还解释说，他是一九七六年应意共要求在其支持下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加竞选后当选众议院议员的。

⑥ 即使如此，共产党不管规模多大都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⑦ 多年来，每年都有共产党党员人数的估计数字，直到美国政府一九七四年在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的题为《世界共产党组织的力量》的出版物（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局）中宣布决定中断发布估计数字。研究战争、革命与和平问题的胡佛研究所出版的《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鉴》（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胡佛研究所出版社）和《欧罗巴年鉴》（伦敦：欧罗巴出版有限公司。仍然是得到共产党统计数字的来源。

⑧ 朱塞佩·阿雷在为本书准备的材料中列举了意共从一九七二年（包括一九七二年）以来每年党员人数增长的数字（根据意共的《年历》）：一百五十一万三千九百五十六人；一百六十一万一千零七十三人；一百六十四万三千七百一十六人；一百七十一万一千四百零二人；一百七十九万四千零八人。他还说，意共党员人数在一九七一至一九七六年间增长的

速度比意大利人口增长的速度高百分之十八点七七。意共还在旅居国外的意大利公民（主要是“客籍工人”）中发展党员；据阿雷说，在一九七一至一九七六年间，意共旅居国外的公民的党员人数上升了百分之四十七点六。

⑨ 见法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手册》月刊，1978年2、3月号合刊，第147页。安妮·克里格尔在为本书所写的研究材料（以及在一些已经出版的著作）中对法共的党员人数的说法的可靠性提出了异议。然而，不管怎么说，她确实同意下述普遍的看法，即：从一九六一年至今，法共党员人数大增，而且目前还在增加。

⑩ 欧塞维奥·穆哈尔—莱昂在为本书提供的材料中说，西共一九七七年的党员人数比较接近二十万。美国国会的一份研究报告说，估计西共党员为十万人是“明智的”；见国会图书馆国会研究处外交和国防科保存的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一九七七年六月向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西欧共产党的报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局，1977年）（下文此报告称为《布鲁克研究报告》）第121页。

⑪ 选择一部分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列举如下：西德（德国的共产党）四万人；英国（英共）二万八千六百五十一人；奥地利（奥地利共产党）二万五千人；瑞典（瑞典左翼党共产党人）一万七千人；比利时（比利时共产党）一万至一万二千五百人；荷兰（荷兰共产党）一万至一万二千人；丹麦（丹麦共产党）七千至八千人；挪威（挪威共产党）二千五百人；希腊（希腊共产党）二万八千人。材料来源见上引述的《布鲁克研究报告》第4页，其中英共的人数除外，系英共中央组织部的一九七五至七六年的数字，载于《英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工人训练

从书》第3期（伦敦：社会主义工人印刷和发行有限公司，1977年），第23页。

⑫ 尼尔·麦金尼斯：《西欧共产党》（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37页。麦金尼斯有趣而详尽地分析了法共从当时至一九七四年期间党员人数“起落不定”的情况：第36—37页。

⑬ 出处同上，第37页。

⑭ 一九六六年调查报告，见安妮·克里格勒的《法国共产党人——一个民族的形象》（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70—71页，也列入上文引述的麦金尼斯的著作第63页。

⑮ 米歇尔·佩特罗与安妮·克里格勒合著《法国的社会主义与政权》（巴黎：研究与国际文件出版社，1966年）第207—208页，引自上文引述的麦金尼斯著作，第67页。

⑯ 出处同上，第67页。

⑰ 意共最近在领导层（特别是议员候选人）吸收了上层和中上层人士，一位前北约的将军在一九七六年大选中是作为意共的候选人参加竞选的。

⑱ 上文引述的《布鲁克研究报告》，第80页。一九七六年，当选法共各省省委代表的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年龄不到三十岁，一九六六年，这一数字为百分之十。

⑲ 英共在一九七七年的政策声明中说：“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妇女的地位能够得到重大的改善……但是，只有在建成社会主义的时候，才具备她们获得完全解放的条件……”同时，“继续压制妇女在个人关系方面的要求……将限制她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方面的潜在作用”。英国共产党《英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共产党纲领》（伦敦，1978年），第59—60页。

⑳ 一九七六年全国大选选举纲领。罗马《团结报》1976年5月16日转载；引自上文引述的《布鲁克研究报告》第59页。

㉑ 恩里科·贝林格：《争取民主转折的政府》，罗马，1972年，第73页，引自上文引述的尼尔·麦金尼斯著作第52页。

㉒ 引自上文引述的克里格尔所著《法国共产党人——一个民族的形象》第59页；巴黎《世界报》1973年2月23日与1974年3月10—11日，引自上文引述的麦金尼斯著作第50页。

㉓ 英共一九七五——六年的数字表明，按地区计算，各区党员所占比例如下：苏格兰，百分之二十五；伦敦，百分之十六；西北，百分之十二；威尔士，百分之六。所有这些比例数——特别是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数字——大大高于这些地区在全国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见上文引述的《社会主义工人训练丛书》第23页。

㉔ 葡共领导人库尼亚尔声称，到一九七六年九月，葡共的组成情况是：“蓝领”工人占百分之五十九；“白领”工人百分之二十，“农业”工人百分之十三。《葡共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第402页。马歇特在他为本书准备的材料中同意，葡共确实在农村地区没有土地的农业工人中发展了一部分力量。

㉕ 根据法共一九六六年的统计数字计算，法共的“农业”党员（农业劳动者和小农场主）占党员总数百分之九点七六。见上文引述的安妮·克里格尔所著《法国共产党人——一个民族的形象》，第70—71页。

㉖ 盖伊·赫梅特：《西班牙共产党人》（巴黎：“伊比利亚半岛斗牛场”出版社，1972年），第40页。

㉗ 见圣地亚哥·卡里略的《“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

(伦敦：劳伦斯—威沙特出版公司，1977年)，第27—33页。

②⑧ 上文引述的麦金尼斯著作，第57页。

②⑨ 英国小党的选票总数以及在全国选票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可根据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人数而有所增加。在总数可能是六百二十五名候选人中，英共提出的候选人难得超过一百人。甚至在英格兰的重要城市地区，英共的竞选成绩也不如民族阵线。

③⑩ 英共候选人吉米·里德是一位影响特别大的地方工会的领导人，自从他在一九七一年领导上克莱德造船厂工人静坐示威取得胜利以后，宣传工具对他大事报道，报道常常是同情他的。他后来加入了工党。

③⑪ 详见戴维·E·巴特勒和唐纳德·E·斯托克斯合著的《英国的政治变化》(纽约：圣马丁斯出版社，1974年)。

③⑫ 数字如下：西德百分之零点三，英国百分之零点零一，奥地利百分之一；瑞典百分之四点八；比利时百分之三点二；荷兰百分之四点五；丹麦百分之四点二；瑞士百分之二点二；挪威百分之十一点二；冰岛百分之十八点三；卢森堡百分之十点四以及爱尔兰百分之零点四。芬兰(百分之十九)未计在总数之内。据一九七六年《欧罗巴年鉴》的数字编录。

③⑬ 穆哈尔估计，西班牙的数字为一百七十万。

③⑭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社会党)的人数估计达六百万。上文引述的《布鲁克研究报告》第4页。

③⑮ 一九四八年的选举结果略去，因为当时共产党和社会党是联合竞选的，无法把两党的选票分开。

③⑯ 据阿雷教授为本书提供的材料说，从一九六八年典型调查得票比例百分之八十二点五降至一九七五年的百分之六十七点四。

⑳ 阿雷指的是一份一九七五年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说明了这一点。表明政治倾向的选民分类(社会职业)如下：(1) “房地产主、专业人员和政府官员”(百分之二十五——意共；百分之三十六点三——天民党)。(2) “小企业主、技术人员、教员”(百分之二十七点三——意共；百分之三十点五——天民党)。(3) “熟练产业工人”(百分之三十九点一——意共；百分之三十二点四——天民党)。(4) “不熟练工人”(百分之四十七点七——意共；百分之三十一一点四——天民党)。(5) “农业工人、劳动者以及不包括于(4)的其他不熟练工人”(百分之四十三点八——意共；百分之三十八点八——天民党)。

㉑ 据阿雷教授为本书提供的材料说，意共取得十分惊人进展的地区有：西北部工业区(皮埃蒙特、利古里亚、伦巴第)——选票增加百分之八点一七至百分之三十三点七三以及北部及拉齐奥——选票增加百分之八点三六至百分之三十六点八四。

㉒ 法共一九七三年大选的选票超过其全国平均选票数的大区有：利穆赞、朗格多克—鲁西荣、普罗旺斯—科特达祖尔、皮卡尔迪、巴黎大区、诺尔、上诺曼底、香巴尼—阿登和中部大区。

㉓ 据上文引述的克里格尔的《法国共产党人——一个民族的形象》第70—71页以及上文引述的麦金尼斯著作第71页的数字计算。

㉔ 据估计，在一九七三年大选中，法共得“工人”选票的百分之三十七，戴高乐派得百分之二十一。上文引述的麦金尼斯著作第72页。

㉕ 西共在二十二个省中得选票不到百分之五，在二十一

个省得选票 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之间， 只在八个省中得选票超过百分之十。

④③ “阵线” 这一词不应同共产党人用于表明同其它政党结盟的种种形式——如象“人民阵线”、“民族解放阵线”等等——的词混为一谈。

④④ 一九二〇年规定的正式接纳为共产国际成员的二十一项条件明确说明（第九项条件），党必须以这种方式在非共产党组织中进行工作。“核心”完全听从党的指挥。二十一项条件见赫尔穆特·格吕贝尔所著《列宁时代的国际共产主义——一部纪实史》（纽约州加登城：昂克图书公司，1972年），第241—246页。

④⑤ 上文引述的英共《英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共产党纲领》，第57页。

④⑥ 详细探讨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的例子，见上文引述的卡里略的著作《“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

④⑦ 极少数著作试图估计共产党对一些阵线组织的战略与力量，其中一本是法国的畅销书、琼·蒙塔尔多所著的《共产党的法国》（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78年）。

④⑧ 大多数观察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不久，法国和意大利的主要工会中心即被听命于莫斯科的共产党所控制。有些作者现在对共产党控制法国总工会和意大利总工会的程度的看法有分歧。见安德烈·巴若内的《法国总工会》（巴黎：瑟伊出版社，1968年），杰勒德·亚当的文章《法共与法国总工会的联系的的分析要论》，1968年6月《法国政治学杂志》双月刊，第524—539页；杰勒德·亚当与琼·兰杰之间的讨论《法共与法国总工会的联系——争论的因素》，1969年

2月《法国政治学杂志》双月刊，第182—187页；让—达尼埃尔·雷诺的《法国的工会与政党——近来的一些倾向》，1975年1月《劳资关系评论》，第208—226页；沃尔特·肯德尔在《欧洲的劳工运动》（伦敦：艾伦·莱恩出版社，1975年）一书中争辩说，法国总工会与意大利总工会仍被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所控制；法国杂志《社会与工会研究》和《东西方》提供的详细情况表明，法国总工会与意大利总工会仍为基本上忠于莫斯科的共产党所控制。认为意大利总工会不再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工具的评论家的一个例子，请见彼得·R·韦茨的《一个分裂的运动中的劳工与政治》，1975年1月《劳资关系评论》季刊，第226—243页。

④⑨ 琼·蒙塔尔多：《法共的财政》（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77年）。

⑤⑩ 迈克尔·A·利丁的《危机四伏的意大利》，《华盛顿文件》第五卷第四十三期（加利福尼亚州贝弗利希尔斯：塞奇出版公司，1977年）。还请见迈克尔·利丁与克莱尔·斯特林合写的《意大利的挥霍无度的俄国老色迷》，1976年2月12日《新共和》周刊。遗憾的是，这些文章没有提出明确的证据来证实这一论点。

⑤⑪ 共产党的工会领导人几乎从不公开谈论兄弟般的财政支援。但是，工人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奇普里亚纳·加恰感谢“欧洲和世界各国人民在我们历史的关键时刻声援我们，工人委员会感谢世界工联把国际支援方面所作的努力扩大为对我国人民争取合法权利与自由的斗争的支持”。佩特罗·罗维奥与文科·克莱切夫：《奇普里亚纳·加恰访问记》，1976年5月《世界工会运动》第21页。

⑤② 弗莱澈法律和外交学院教授、专栏作家约翰·罗奇有一份苏联对外贸易银行给一家里斯本银行的电报的影印件，电报要该银行把二万八千五百七十美元转交给葡萄牙总工会。见他的《葡萄牙的迷宫（II）》，金氏特稿，1975年8月26日。此外，一位东德劳工领导人有一次难得地承认了组织之间的援助。他说，他的组织给了葡萄牙工会一百万埃斯库多，并答应另外提供援助用以修建工会建筑物和复制机器等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声电台”，1974年8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SWB,EE/4669/A1/1）。

⑤③ 威尔逊认为，莫斯科汇到葡萄牙的钱为四千八百万英镑（当时约合每年一亿美元），《华盛顿邮报》1975年9月6日。基辛格估计，一年的费用只有五千万美元。《纽约时报》，1975年4月18日。

⑤④ 例如，尼尔·麦金尼斯争辩说，这些党试图控制阵线组织时，常常被同化，必然不能操纵法国总工会与意大利总工会。见上文引述的麦金尼斯著作，第8—17页。

⑤⑤ 第二次大战刚结束时，在政府和工会中任职的共产党官员设法使工人们重建分崩离析的欧洲经济，因此拒绝支持大幅度增加工资。然而，到一九四六年，许多工人开始参加反对这些“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式”手法的自发性罢工。

⑤⑥ 例如，葡萄牙共产党企图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十一月间发动政变时，总工会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葡共并没有要求工会予以全力支持，因为这将导致内战。

⑤⑦ 引自伦敦《泰晤士报》1977年10月15日，第4版。

⑤⑧ 引自斯蒂芬·哈斯勒的《英国民主之死亡》（伦敦，伊莱克图书公司，1976年），第125页。

⑤⑨ 然而，英共确实控制了一些工会的地区，例如南威尔士和苏格兰煤矿工人工会的地区。英共还控制了苏格兰的职工大会。

⑥⑩ 一些英国工会的领导人常常在国内和在经常访问东欧集团国家时发表令人惊异的亲苏言论，关于这些言论的详细总结请见伦敦《每日电讯报》1977年2月4日第1版；以及伦敦《泰晤士报》1977年2月4日第2版。

⑥⑪ 约翰·肯尼迪：《一九六一——一九六三年总统的公开文件》（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局，1962年、1963年、1964年）第334页及以后各页，引自理查德·沃尔顿的《冷战与反革命：约翰·肯尼迪的对外政策》（纽约：瓦伊金出版社，1972年），第55页。

⑥⑫ 上文引述的肯尼迪的报告，第304页及以后各页，引自上文引述的沃尔顿的著作第52页。

⑥⑬ 沃尔特·拉克：《芬兰化的幽灵》，纽约《评论》杂志，1977年12月。还见亚当·M·加芬克尔的《“芬兰化”：一幅比喻的地图》（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1978年）。

⑥⑭ 米歇尔·克罗泽，在米歇尔·J·克罗泽、塞缪尔·P·亨廷顿与乔吉·瓦塔努克合著的《民主的危机》一书（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11页。

第二章 共产党和内部政治

① 见1976年7月1日罗马《团结报》。

② 他说：“但是，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虽然都在经过本质上相同的预备学校，以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但是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完成这一发展过程。……又考虑到这种斗争由于

各国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成分(例如爱尔兰等)、所属殖民地以及宗教派别等等特征而具有的并且必然具有的具体特征……”，杰伊·洛夫斯通的《欧洲共产主义——渊源与现实》援引，劳联—产联出版的《自由工会新闻》(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77年6—7月号，第2页。

③ 戴维·欧文：《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伦敦：剑桥大学同学会，1977年11月18日)第5—6页。

④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意大利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意大利共产党乔治·纳波利塔诺访问记》(纽约：劳伦斯·希尔出版公司，1977年)第9页。

⑤ 1977年12月30日米兰《晚邮报》，路易吉·隆哥访问记。

⑥ 例如，见乔治·马歇的《民主的挑战》(巴黎：格拉塞出版社，1973年)，以及安内特·艾森贝格·施蒂夫博德在《过渡中的法国共产党》(纽约：普雷格出版公司1977年版特别研究报告)中的分析，第91—93页。关于意共，见唐·萨松编辑的《意大利共产党人为自己辩护》(诺丁汉：发言人出版社，1978年)。

⑦ 英国共产党：《英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共产党纲领》(伦敦，1978年)第25页。

⑧ 罗纳德·蒂尔斯基：《法国的共产主义，一九二〇——一九七二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44页。

⑨ 详见欧塞维奥·穆哈尔—莱昂的《西班牙共产党对内对外政策的演变》，收于鲁道夫·托克斯编辑的《欧洲共产主义与缓和的时代》(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⑩ 意共党章第12页。

⑪ 上文引述的英共《英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25页。

⑫ 乔治·乌尔班的《具有意大利面目的共产主义？同卢乔·伦巴多·拉迪切的一次谈话》，1977年5月《文汇》月刊第18页、第22页。拉迪切不是意共中央领导人。即使如此，作为意共授权的对西方的发言人之一，他的观点具有重要意义。关于法共的观点，见上文引述的斯蒂夫博德的著作第49—58页以及第68—70页。

⑬ 上文引述的麦金尼斯的著作第97页。

⑭ 马塞尔·塞尔万：《共产主义手册》月刊，1954年6—7月合刊，第731页。

⑮ 安东尼奥·葛兰西：《新秩序，1919——20年》（都灵：埃伊纳乌迪出版社，1955年）第99页。

⑯ 下文关于意共的机构部分几乎全部取材于阿雷教授为本书提供的分析材料。对法共所作的不太新、但是全面的分析见安妮·克里格儿的《法国共产党人：一个民族的形象》（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2年），特别是第187—307页。

⑰ 上文引述的麦金尼斯著作第111页。

⑱ 克里格儿在她为本书提供的分析材料中指出，马歇在同一次演讲中嘲笑了另一种“选举”制度。他说，采用这种制度（它将导致实际上取消候选资格委员会），运气将决定谁当选为干部，因为二、三票之差就足以取消一位才能出众的候选人的候选资格。

⑲ 阿雷教授为本书准备的材料详细地、逐区地调查了意共的各支部。鲁伊·马歇特在他的材料中列举了葡共基层组织的各种作用。他说：“党的领导人根本关心的问题是把党员组织到积极的基层组织中去”。

⑳ 关于法共的中央纪录保管机构的详情，见上文引述的克里格尔的著作第229—232页。

㉑ 意共党章第五十二条。

㉒ 例如，在上届意大利议会选举中落选的意共候选人有百分之八十七没有参加这次竞选（常常是奉党之命）。在天民党，这一数字只有百分之四十九。阿雷教授指出，前两次选举的情况也一样。

㉓ 关于共产主义经验中周而复始的现象的最近的例子，见阿兰·德塞杜伊和安德烈·哈里斯合著的《共产党内情一瞥》（巴黎：瑟伊出版社，1975年）和维维安·戈尼克的《美国共产主义传奇》（纽约：基础丛书公司，1977年）。

㉔ 欧文·豪的《阳光下的新事物》，《异议》杂志1978年冬季刊，第27页。另一位美国学者罗伯特·普特南说，意共的选举战略和政策是根据使他们归入民主主流这一合乎情理的利益制定的。见《意大利的对外政策：突发的民主一致意见》，收于霍华德·R·彭尼曼编辑的《意大利举行选举》（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企业研究所，1977年）。

㉕ 上文引述的霍布斯鲍姆的著作，第46—47页。

㉖ 引自上文引述的霍布斯鲍姆的著作，第8页。

㉗ 这里毫无保留地附和列宁的主张。他意识到无产阶级同疑虑重重的农民之间必须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盟，他修改了年青的布尔什维克国家的经济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

㉘ 1977年11月12日至18日《经济学家》周刊，第48页。

㉙ 阿诺德·亨廷顿：《葡萄牙共产党人的崛起》，1975年7—8月《共产主义问题》双月刊，第3页。

㉚ 鲍里斯·基德尔：《马歌对密特朗》，1977年10月14日

《新政治家》，第497页。

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共一直试图加入工党，但遭到拒绝。

㉑ 上文引述的英共的《英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第23、24页。

㉒ 出处同上，第28页。

㉓ 工党议员的“论坛派”主席（一九七六——一九七七年）西德尼·比德韦尔在1977年6月28日英共的《晨星报》第2版的一篇文章中赞成两党合并。

㉔ 丹尼斯·希利编辑的《幕布落下了：东欧社会党人的故事》（伦敦：林肯—普雷格出版公司，1951年），第6页。

㉕ 上文引述的英共的《英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第57页。

㉖ 让—弗朗索瓦·勒韦尔：《极权主义的诱惑》（纽约州加登城：道布尔戴公司，1977年），第265—266页。

㉗ 上文引述的霍布斯鲍姆的著作，第11页。

㉘ 例如，见罗伯特·莫斯的《欧洲共产主义的幽灵》，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政策评论》1977年夏季刊，第18页。

㉙ 这是指蒙特卡洛电视台。意共一心希望实施限制国外对意大利的素材广播的新法律第四十款，见迈克尔·A·利丁的《危机四伏的意大利》，《华盛顿文件》第5卷第43期（加利福尼亚州贝弗利希尔斯，塞奇出版公司，1977年），第50—53页；以及上文引述的勒韦尔的著作，特别是第6章。

㉚ 关于这一插曲比较详细的报道，见1977年11月12日伦敦《泰晤士报》刊载的约瑟夫·戈德森的文章《俄国人为什么因为两年一度的威尼斯艺术节大发雷霆》；上文引述的利丁的

著作，第50—53页；以及1977年3月26日《新共和》周刊上迈克尔·利丁的文章《揭露欧洲共产主义者》。

④② 见贾科莫·萨尼的《意共在门槛上》，1976年11—12月《共产主义问题》双月刊，第30页。

④③ 上文引述的1975年11月17日于萨松发表的意共与法共的联合声明，第67页。

④④ 1970年12月23日《人道报》。

④⑤ 英国共产党：《共产党纲领：英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讨论草案》（伦敦：英共，1977年），第1490款（这一段的后一部分在党纲的最后文本中删掉了）。

④⑥ 出处同上，第1770款。

④⑦ 上文引述的乌尔班的著作，第18页。

④⑧ 圣地亚哥·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伦敦：劳伦斯—威沙特出版公司，1977年），引自1977年11月5—11日《经济学家》周刊，第63页。

④⑨ 卡里略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跨国研究所的一次讨论会上的讲话全文，1977年12月21—27日的独立社会党的《现代》周刊（在芝加哥出版）转载。还见上文引述的卡里略的《“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第76页与第100页。

④⑩ 上文引述的英共的《英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第57页。

④⑪ 胡安·迪斯（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政治自由与社会主义》（巴黎：阿尔卡里尔出版公司）第2卷第2期，第13页。

④⑫ 上文引述的乌尔班的著作，第18页。

④⑬ 引自意共一九七六年议会选举纲领，1976年5月18日

罗马《团结报》。

⑤④ 引自刊载于《基辛氏时事文献，一九七一——一九七二年》（布里斯托尔：基辛出版有限公司，1972年）第55页，一九七二年《共同纲领》。

⑤⑤ 1977年9月20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⑤⑥ 引自休·托马斯的《卡里略的分裂》，1977年10月《文汇》月刊，第65页。

⑤⑦ 社会党国际内部也就同西欧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见哈罗德·威尔逊的《欧洲共产主义与西欧联盟》（伦敦：劳工和工会出版社，1977年11月）和上文引述的英国外交大臣欧文的讲话。还见斯蒂芬·哈斯勒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没落》，1977年12月《评论》杂志。

⑤⑧ 上文引述的卡里略在跨国研究所的讲话，第2页。

⑤⑨ 见上文引述的1977年12月30日米兰《晚邮报》刊登的隆哥访问记。

⑥① 上文引述的卡里略在跨国研究所的讲话，第2页。

⑥② 《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I》，1961年12月6日《苏联报刊文摘》，第14页。纳波利塔诺在他分析意共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在理论上的区别时，他不那么直接地附和了这种观点，这种方式是有代表性的。他说，共产党人希望“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上文引述的霍布斯鲍姆的著作，第29页。据纳波利塔诺说，这一点使意共的思想有别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

⑥③ 尼尔·麦金尼斯：《欧洲共产主义》，《华盛顿文件》第4卷，第37期（加利福尼亚州贝弗利希尔斯：塞奇出版公司，1976年），第12页。

⑥③ “中间阶层”组成的详尽、典型的分析见上文引述的英共《英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第21页。

⑥④ 关于这个问题，见弗·伊·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纽约：国际出版社，1935年与1963年），第70页、第71页、第73页；艾尔弗雷德·G·迈耶的《列宁主义》（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123—129页；R·N·卡鲁·亨特的《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巴尔的摩：企鵝图书有限公司，1963年），第174—177页，第181页，第235—236页。

⑥⑤ 莱塞克·科拉科夫斯基：《欧洲共产主义的分裂》，1977年8月《文汇》月刊，第16—17页。

第三章 共产党和国际力量对比

① 实际上，意共自己的出版社联合出版社出版了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著作《十月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吗？》。

②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意大利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意大利共产党乔治·纳波利塔诺访问记》（纽约：劳伦斯·希尔出版公司，1977年），第87页。

③ 1977年11月5—11日《经济学家》周刊，第64页。

④ 1977年12月30日米兰《晚邮报》刊登的访问记。

⑤ 1975年11月1日《年历》，第2页。

⑥ 唐·萨松编辑的《意大利共产党人为自己辩护》（诺丁汉：发言人出版社，1978年），第79页。

⑦ 上文引述的霍布斯鲍姆的著作，第57—58页。

⑧ 1976年7月3日马德里《胜利》周刊，第7页。

⑨ 1977年11月12—18日《经济学家》周刊，第14页。

⑩ 伦纳德·夏皮罗在他为本书准备的材料中指出，一九七七年七月底，就在勃列日涅夫召集苏欧集团国家的总书记到克里米亚与他一起开会的时候，卡里略对布加勒斯特进行了引人注目的访问，同齐奥塞斯库举行会谈。

⑪ 托多尔·日夫科夫：《和平年，斗争年》，1976年12月《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月刊，第11页。

⑫ 上文引述的霍布斯鲍姆的著作，第82—83页。

⑬ 1976年5月30日米兰《晚邮报》。还见乔治·乌尔班的《具有意大利面目的共产主义？同卢乔·伦巴多·拉迪切的一次谈话》，1977年5月《文汇》月刊，第10页，第13页，第16页。

⑭ 圣地亚哥·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伦敦：劳伦斯—威沙特出版公司，1977年），第60页。

⑮ 1972年3月14日罗马《团结报》，引自国会图书馆国会研究处外交和国防科保存的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一九七七年六月向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西欧共产党的报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局，1977年）（下文此报告称为《布鲁克研究报告》），第62页。

⑯ 1976年4月《共产主义手册》月刊，第88页。

⑰ 英国共产党：《英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共产党纲领》，伦敦，1978年，第43页。

⑱ 1975年3月19日罗马《团结报》，引自上文引述的《布鲁克研究报告》，第62页。

⑲ 这引起了哄动，共产党报纸没有报导贝林格的讲话，这位意共领导人为了避免给人一种意共需要北约来保护它自己的印象颇费了一番心思。见迈克尔·A·利丁的《危机四伏的意大利》，《华盛顿文件》第5卷第43册（加利福尼亚州贝弗利希

尔斯：塞奇出版公司，1977年），第46页。

⑳ 只要达不成拆除欧洲各地的美国和苏联基地的协议。卡里略对《纽约时报》记者谈话，1977年1月16日，第3版。

㉑ 恩里科·贝林格：《争取民主转折的政府》，罗马，1972年，第30页，引自尼尔·麦金尼斯的《西欧共产党》（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187页。

㉒ 阿里戈·利瓦伊，《贝林格的共产主义》，1972年夏季伦敦《考察》季刊，第9页。

㉓ 例如，见朱塞佩·阿雷的《意大利的共产党人：外交与防务政策》，1976年9—10月《生存》双月刊。

㉔ 亨利·基辛格，在美国企业研究所讨论意大利与“欧洲共产主义”问题会议上的讲话《西欧的共产党》，《文集》第70期（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77年），第15页。

㉕ 出处同上，第11页。

㉖ 亨利·基辛格，1978年1月13日在全国广播公司《今日节目》上讲话。

㉗ 最充分说明欧洲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合作的方面之一是在国际劳工运动方面，例如，法国共产党控制的法国总工会同苏联控制的世界工联联合主办一项训练计划。见罗伊·戈德森的《克里姆林宫与劳工》（纽约：克兰—拉萨克出版公司，1977年），特别是第31页。

㉘ 苏联《新时代》周刊对卡里略的攻击看来只是加强了他的领导地位，导致西共中央委员会举行了一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会议一致拒绝了苏联的批评。见《违背欧洲和平与社会主义的利益——关于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的〈“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书，《新时代》周刊，莫斯科，第26期，

1977年6月。还见《澄清是非（关于国外对《新时代》周刊有关圣地亚哥·卡里略著作书评的一些评论）》，《新时代》周刊，莫斯科，第28期，1977年7月。当一些法国共产党人由于批评了苏联（例如让-爱伦斯坦）而遭到点名抨击时，法国共产党提醒克里姆林宫：一九七五年柏林会议决定，不能认为批评苏联的政策就是反共。

②⑨ 1976年3月18日《真理报》。

③⑩ 夏皮罗引用。

③⑪ 莫斯科同欧洲共产党之间的某些分歧可能被特意用来提高欧洲共产党的信誉，人们对这种可能性不能置若罔闻。

③⑫ 朱塞佩·阿雷在他为本书提供的材料中强调了这一点。

③⑬ 介绍一个共产党财政情况的最佳作品是琼·蒙塔尔多的《法共的财政》（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公司，1977年）。

③⑭ 见罗伊·戈德森的《美国劳工与欧洲政治》（纽约：克兰-拉萨克出版公司，1976年），第82页。

③⑮ 一份详尽、但未经证实的报告，见维克托·里塞尔的专栏《赤色商船：莫斯科的特务是怎么搞到秘密档案来敲诈美国友人的》，菲尔德报纸辛迪加，1976年8月17日。

③⑯ 夏皮罗指出，莫斯科的下述指责是不正确的，即：它说，卡里略主张建立一个反对苏联的西欧。卡里略建议的是建立一个不与两个集团发生联系的、“中立的”社会主义的欧洲，他的建议得到意共与南斯拉夫的支持。